



【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帝国主义

Post-Imperialism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翻译和介绍“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著作。全书从浩瀚的国外文献中，精选了后帝国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作品，以及人们对这一理论的重要评论。后帝国主义理论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关系、阶级关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阶级结构的影响，作出了新的阐释。本书为国内学界深入研究后帝国主义理论，为有兴趣的读者全面了解这一理论，无疑提供了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作为经典作品的汇集，它无疑也是一部值得收藏的重要文本。

■曹义恒 主编
■曹荣湘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帝国主义 | Post-Imperialism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翻译和介绍“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著作。全书从浩瀚的国外文献中，精选了后帝国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作品，以及人们对这一理论的重要评论。后帝国主义理论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关系、阶级关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阶级结构的影响，作出了新的阐释。本书为国内学界深入研究后帝国主义理论，为有兴趣的读者全面了解这一理论，无疑提供了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作为经典作品的汇集，它无疑也是一部值得收藏的重要文本。

ISBN 978-7-80211-330-5



9 787802 113305 >

定价：30.00元



【后经典文丛】

丛书主编：李惠斌

后帝国主义

Post-Imperialism

■曹义恒 曹荣湘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帝国主义/曹义恒, 曹荣湘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1

(后经典文丛)

ISBN 978-7-80211-330-5

I. 后…

II. ①曹…②曹…

III. 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集

IV. D033. 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9070 号

后帝国主义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130345 (编辑部)

(010) 6656963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 - m a i 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8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3. 2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 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导 读

曹义恒 曹荣湘

随着历史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由于原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亚非拉一批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经济上走向独立且实力日渐增强、苏联的兴起以及冷战时代的开始，使得曾经被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学派广为接受并加以发展的帝国主义理论（如依附论），开始受到来自内外部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四股理论思潮，它们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斯蒂安·帕洛瓦的“国际资本理论”、全球化理论，以及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L. Sklar）和戴维·贝克尔（David G. Becker）的“后帝国主义理论”。^①

本书收集了关于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数篇重要文献，目的是想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影响。在此，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理论的基本轮廓，并就相关内容加以简短评析。

一、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

斯克拉和贝克尔等人 1987 年出版了《后帝国主义》一书^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他们声称，这一理论是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引发出来的：1) 列宁认为表示一国对另一国的统治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和战争

^① 可参看罗纳德·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21 页。

^② David G. Becker and Richard L. Sklar,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87).

将会葬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然而，现实并未如此。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却在不断发展，并适应了各种政治条件的变化。为什么会如此？难道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不再有效，甚或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2) 跨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和实力成长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一些分析家认为在跨国公司当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与资本主义是同时出现的，不过是资本积累的一种传统的、跨国的形式。另一些分析家却认为跨国公司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它们与早期制度形式的类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跨国公司把母公司利益置于当地利益之上的趋势加强了公司总部所在的发达国家的统治，因此跨国公司是一种新形式的、适应了后殖民时代需要的、变相的帝国主义。这两种分析到底哪种更加合理？

为回答上述问题，后帝国主义理论首先从分析跨国公司入手，认为跨国公司可以促进各国利益的一体化，可以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资本、市场、技术和其他服务；跨国公司的宗主国和东道国尽管在利益方面有差异，但它们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这从当代各国纷纷抛弃意识形态限制、试图与跨国公司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如合资企业）等方面可以得到说明。这种新的历史环境引发了组织变革，合资企业、国内私人企业、国营企业、半国营企业纷纷出现，并且利益相互交叉，员工随意流动。由此，造成了这些欠发达的东道国的社会精英走向多元化，传统的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见本书贝克尔和斯克拉：“为什么是后帝国主义”一文）。

在该书中，斯克拉和贝克尔首先就欠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构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传统的资产阶级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官僚和企业管理者这两个阶层已从原来的附属和代理人身份上升到了主导阶层。这种情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在这部分新的资产阶级与传统的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斯克拉和贝克尔认为，这种争论之所以产生，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

是十分模糊的，很难做出完全划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观念，以便把公司的管理者、博学的专业人才、一流的政治家以及上层官僚理解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成员。也许‘管理者资产阶级’（managerial bourgeoisie）这个术语可以使我们提出有价值的思想。由于这个术语明显涉及到私人企业精英、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因此它比‘官僚资产阶级’或‘国家资产阶级’的说法更加合适。而且，与‘企业家资产阶级’这个术语相比，它更清楚地反映了非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各个部分之间的职责安排”（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以这一概念为基础，斯克拉和贝克尔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国际资本进入欠发达国家，这部分管理者资产阶级日益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corporate bourgeoisie）^①通过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勾结在一起；在这种利益关系中，国际资本关心的是进入欠发这国家的市场并获取生产要素，而管理者资产阶级关心的则是国家的工业化和发展。

斯克拉和贝克尔强调，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目标，欠发达国家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在与各种形式的国外投资相结合的时候，并不一定接受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所设定的道跨和模式，而是多数情况下选择了一些混合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投资机构与跨国公司所结成的“伙伴关系”，使得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他们不断努力吸收那些外国商业伙伴中的资本家和管理者的思想，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渴望能在更加广泛的商业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普遍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个人生活方式，并拥有精英意识。一句话，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强化了欠发这国家的企业管理层、技术专家和官僚精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内在趋势。

^① 指工业国家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为跨国的管理者资产阶级。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为了与欠发达国家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相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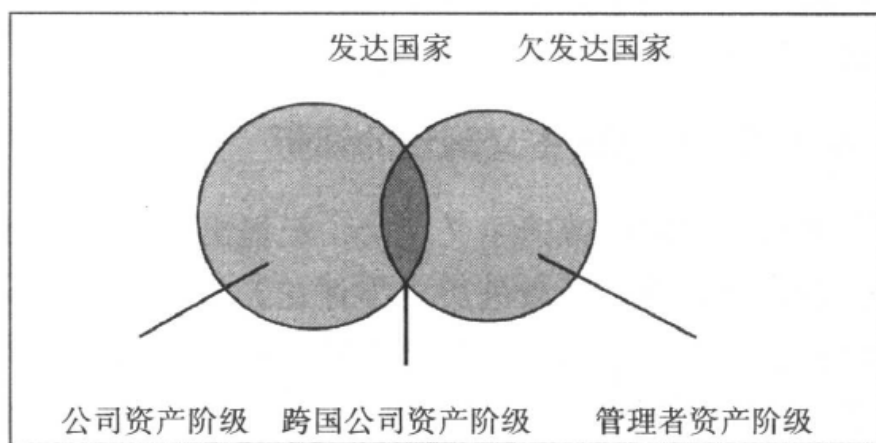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斯克拉和贝克尔并不认为这部分管理者资产阶级将完全变成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附庸，即变成“买办资产阶级”。他们认为，管理者资产阶级在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日益勾结的同时，并不会放弃其民族主义原则，而这正是它与传统的“买办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斯克拉和贝克尔宣称，“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与国际资本主义机构之间的伙伴策略有可能使人们放弃那些非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坚持的民族主义原则。……它的自主化的迫切愿望是不容我们质疑的。并且，其民族主义立场的坚定性也决不亚于任何其他阶级。”（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在谈到管理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原则时，斯克拉和贝克尔批评了在欠发达国家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他们指出，“很多‘激进派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这些国家的时候，都低估了其资产阶级阵营的力量及其历史重要性，也低估了这个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连贯性，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败笔。”这些学者没有看到民族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并且喜欢使用一个贬义的形容词“买办的”来描述国内的‘资产阶级’，而买办一词是“傀儡”的同义词，也就是完全地依靠并服从。由此这些学者认为：欠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代理人阶级”出现的，它服从于外国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学说就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斯克拉和贝克尔指出：“这些学说也与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失去了战斗力，因为它们所依据的阶级概念都是不恰当的”（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从跨国公司一边来看，跨国公司资产阶级也有与管理者资产阶级结盟的需要。斯克拉和贝克尔利用赞比亚矿业公司的实际证据表明，那些在赞比亚共和国设立的、由南非和美国控制的矿业公司，更能遵循赞比亚的国家经济政策。实际上，跨国公司并非一种反国家的力量，它们可以适应自己控制下的国家的需要，而且具有服从

当地法规管制的趋势。斯克拉和贝克尔把这种趋势称作“本地化原则”。他们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外国投资产生的政治影响并没有破坏这些国家的完整性。而且，外国投资的冲击也没有对它们的阶级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的存在促使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升，使它们成为了当地的统治阶级。因此，外国资本既没有使管理者资产阶级“去国家化”，也没有削弱它的实力，反而使得这个阶级变得越来越有能力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重新占据和提高它们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本地化原则的作用促进了跨国阶级的结合。”（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以这种对欠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分析为依据，斯克拉和贝克尔把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实体：公司资产阶级主要以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其中包括跨国公司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新近的发展中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管理者资产阶级，它也与跨国公司资产阶级重叠在一起。



斯克拉和贝克尔进一步认为，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以及跨国社会力量的出现，世界上的工人阶级将会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直面公司资产阶级，而在新近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则会直面管理者资产阶级。如果特定的发展中国家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舞台转变的趋势维持下去的话，那里就会出现公司资产阶级的本土组成部分。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继续维持下去，公司资产阶级也许有希望取代替理者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当然，“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作为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存在必定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国家会易于接受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则，那将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正如坦桑尼亚的情况表明的，人们也可能选择反资本主义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策略”（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过：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针对列宁的这一说法，斯克拉和贝克尔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战争“这种危险已被排除，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因此，斯克拉和贝克尔宣称，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二、学术界对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评析

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和批评。《激进历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曾经发了一期专刊（1993年秋季号，总第57期），来讨论后帝国主义理论。总体看来，对于后帝国主义理论，拥护者有之，批评者也大有人在，而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当数以下观点。

在赞同者这一边，塞尔·沙茨（Sayre P. Schatz）通过运用他所说的“社会化适应”理论进一步拓宽了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在面对各种问题时，曾经并将继续采取一些特殊的响应方式，以缓解危机并延长其本身的生命力，这一过程就叫做社会化适应过程（socializing adaptation）。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国家

内部发生变化的过程，但如今正在出现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沙茨的分析源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看法，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繁荣依旧。这导致一个问题：马克思预言的失致是简单归咎于其基本思想的错误？还是说存在其它的解释？沙茨认为是后者，而这个解释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适应过程。沙茨说：“资本主义一直保持其活力的原因是，它有一种能力……当遭遇严重功能失调时它通过减轻和弱化这个基本矛盾的方式来加以适应。由于延缓的缘故，资本主义已经间歇性地、不太完全地适应了它的决策体制。”（见本书塞尔·沙茨：“社会化适应”一文）

沙茨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适应过程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它使生产体系社会化或集中化，从而使得政府对经济决策、经济活动施加社会影响与控制成为必要；这种约束和限制阻止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机能障碍的恶性发展；第二，这些适应性的变化倾向于最小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调适努力往往见好就收。面对来自各方利益的压力，政府的政治反应倾向于稳健而适度，从而确保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不受到威胁；第三，社会化适应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更进一步的措施总是需要的，而资本主义恰恰注意并做到了这一点。

沙茨进一步把社会化适应过程扩大到全球水平。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性的不协调表现为在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的同时，“构成世界生产体系的无数单位却在相对狭隘的基础上，继续受着狭隘的目标的引导和治理”，由此造成了南北问题的复杂性。这一问题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生存。“为了回应这些生存威胁，整个西方致治经济体系正在全球规模上展现出一种社会化适应过程，其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扩张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社会化控制。”（见本书塞尔·沙茨：“社会化适应”一文）

这种社会化控制包括：全球治理日益加强，单边主义行为越来越不占优势；政府间合作协商加强，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援助在逐步提高。因此，沙茨总结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一些突变之外，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适应总体记录尽管有一些严重的不满和倒退，但它仍然有效地运行着，并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只有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表现出摇摆动荡，威胁到第三世界对此秩序的依附时，全球社会化适应才会有退步的威胁。”（见本书塞尔·沙茨：“社会化适应”一文）

另一位赞同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首先极力称赞了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他认为，后帝国主义理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国际资本主义以及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得阶级分析方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因此，“与绝大多数‘依附论’和主流方法不同，后帝国主义在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认真地分析了欠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形成动向。毫无疑问，他们这种方法使得后帝国主义理论面目一新，并更加令人信服。”（见本书杰夫·弗里登：“国际资本与国家发展：后帝国主义理论述评”一文）

然而，杰夫·弗里登也指出了后帝国主义理论需要弥补的几个不足。首先，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概念即管理者资产阶级，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尚待深入探讨。因为，“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其它阶层的力量相对有所下降，但是，即使是最发达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管理者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没有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和统治力（hegemony）必然会继续不断地增长”（见本书杰夫·弗里登：“国际资本与国家发展：后帝国主义理论述评”一文）。其次，后帝国主义理论对于阶级关系的界定，强调更多的是“权力关系”、“阶级意识”等因素，而不是生产关系。例如，贝克尔和斯克拉对管理者资产阶级的

定义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关系方面，他们也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因此，后帝国主义理论存在着“简单地用所谓的政治决定主义来代替经济决定主义”的倾向。最后，管理者资产阶级到底是倾向于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后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表述也前后不一致。

此外，杰夫·弗里登还给后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要求这一理论在案例研究中应该追求更大的部门样本。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看到的，斯克拉和贝克尔依据的案例研究仅仅涉及到了第三世界的采矿业这个特殊部门。二是要求这一理论在案例研究中应该顾及地理差异。在论证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斯克拉最深入地研究过的国家只是赞比亚，而贝克尔只研究过秘鲁。显然，这两个国家是否具有代表性，还是一个可以存疑的问题。

基思·海恩斯（Keith Haynes）用墨西哥单命的实例探讨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和后帝国主义趋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的分期问题，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等概念进行了认真分析。他认为，斯克拉的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方法，同时对两个现象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一是跨国资本主义通过建立和平解决列强冲突的机制，破坏了帝国主义的基础；二是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兴起，在调节和阻止宗主国与外围国冲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基思·海恩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把后帝国主义当成了帝国主义的一种类型。他认为，当地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在历史上决定了统治精英们的全球意识，并因此决定了国内社会关系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局限性和能动性，并产生出不同的帝国主义。一是殖民主义，这是最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刚刚形成时的帝国主义形式；二是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它的范围仅限于竞争性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三是投资帝国主义，即向非工业化国家投资，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公司资产阶级；四是超帝国主义，其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内满足公司资产阶级的需要；五

是后帝国主义，即在全球创造一个由管理者资产阶级掌控的“国际寡头政体”，其目的是捍卫跨国公司资本主义的利益（见本书基思·海恩斯：“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的阶段划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及后帝国主义”一文）。

亚历桑德罗·科拉斯（Alejandro Colás）在其“全球化的阶级统治”一文中进一步讨论了后帝国主义理论，尤其是该理论所涉及的跨国阶级的形成理论。科拉斯的态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

科拉斯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仍然在特定的国家之间以及它们的内部不断地制造着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这些分裂所采取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形式；并且，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与全球化相关的过程的起因，也可以看作这一过程的结果。换句话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对立的表现，阶级既是全球化的主体，也是其客体。

从这种立场出发，科拉斯指出，后帝国主义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它仅仅把阶级当成了全球化的主体，认为全球化是“管理者资产阶级”在共同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所采用的战略安排的产物。“它把全球化解释成一个由国际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发动的过程；这些统治阶级通过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利益集中……来发动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观作用，并因此低估了客观的生产关系在阶级对立的全球蔓延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见本书亚历桑德罗·科拉斯：“全球化的阶级统治”一文）

由于这一原因，科拉斯进一步指出，后帝国主义理论把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看作一个实质上独立的实体，它自由地决定着自身发展的历史条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后帝国主义学者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仅仅让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处于跨国公司最高层，就能够让他们获得满足。在他们看来，在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很少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从而在根本上否认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例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探讨了美国的帝国主义与欧洲、中东的关系，以及这种“集体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附带批评了后帝国主义理论（见本书萨米尔·阿明：“美国的帝国主义，欧洲与中东”一文）。琳达·卡蒂（Linda Carty）坚持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对后帝国主义提出了简要的批评（见本书琳达·卡蒂：“帝国主义：历史阶段还是当今现象？”一文）。保罗·凯伊瑟（Paul J. Kaiser）依据后帝国主义理论讨论了公民社会与多国公司之间的互动^①。卡尔·帕里尼（Carl Parrini）从为美国当代各种国际政策辩护着手，完全否定当代帝国主义的存在，并借用斯克拉和贝克尔的概念，认为现时代已经是“后帝国主义时代”（见本书卡尔·帕里尼：“超帝国主义时代”一文）。此外，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其合著的《帝国》（Imperial）一书所阐发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也与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请参看本书巴希尔·阿布曼那：“帝国的幻象”一文的分析）。

可以说，尽管杰夫·弗里登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学者们越来越欣然地接受了斯克拉和贝克尔提出的主张；他们已经厌恶了那些与‘依附性’有关的无休无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接受后帝国主义论者提出的关于跨国公司观点的人，比十年前我们所能着到的人要多出许多”（见本书杰夫·弗里登：“国际资本与国家发展：后帝国主义理论述评”一文）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不可否认，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确实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① Paul J. Kaiser: "Civil Society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essons Learned from Postimperialism." Mississippi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Jackson, Mississippi, 1995.

三、结语

应该承认，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启发意义。首先，他们的理论首次引起了人们对当代跨国公司与阶级关系这一问题的注意，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未未命运。其次，他们的理论关注的是阶级的对立，而不是国家的对立，这对于扭转长期以来因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导致人们过分关注南北国家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而忽视了南方国家国内阶级状况的倾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反驳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常见的说法，即认为全球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排除了国家水平上的政治活动存在的可能性，后帝国主义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斯克拉所说：“资产阶级的命运——公司的和管理的——有可能是由国内的斗争而不是由那些起来反抗的国家向外国势力发起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未决定的。”（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最后，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跨国公司与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正如斯克拉和贝克尔所证明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存在并不以民族主义的丧失为原则，其与跨国资产阶级的结盟所选择的策略也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大多数是混合的策略。因此，与跨国公司建立起经济关系是可能的，其条件是国家主权不能妥协，也不能破坏国家的发展目标。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活动是不是在向帝国主义“投降”，实际上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选择的政治经济战略和政策，以及国内的阶级动态，而很少取决于这个国家是接受还是排斥国外资本。

当然，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也存在不少理论上的失误，也有许多模棱两可之处，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一）后帝国主义理论对国际冲突的看法有待深入讨论。在解释

发展中国家国内社会主体与发达国家跨国主体之间的辩证互动的时候，后帝国主义理论首先关注的是管理者资产阶级的作用。管理者资产阶级通过调节国外的资产阶级与国内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以削弱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由于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壮大以及跨国公司更加严格地坚持本地化原则（这意味着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尊重），特定国家的发展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紧张局势将趋向缓和。可见，在方法论上，斯克拉和贝克尔的主张与考茨基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考茨基看来，随着生产过程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不断加速，各个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将会趋向缓和。这一观点遭到了列宁的激烈批评。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真正变成国际资本主义之前，其内部矛盾只能导致它自我毁灭。尽管列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历史状况的考察，以及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但仅仅凭着短短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断定列宁的观点完全错误，也有过于匆忙之嫌。反过来说，后帝国主义理论凭借其特殊行业（采矿业）、特殊国家（赞比亚和秘鲁）的考察，就得出“后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未临”的结论，似乎也嫌大早。

（二）后帝国主义理论的阶级概念值得商榷。正如杰夫·弗里登指出的，斯克拉和贝克尔等人认为“第三世界”的阶级结构更多地是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这种说法导致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线条变得模糊不清，存在着简单地用政治决定主义来代替经济决定主义的倾向。由于对阶级概念定义不准确，导致了后帝国主义理论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理论相提并论；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似乎也就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可信度了。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斯克拉和贝克尔所说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倒不如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为好。

（三）后帝国主义理论关于跨国资本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论述有模棱两可之处。斯克拉和贝克尔断言：“在后帝国主义的世界里，是

通过意识形态方式和政治手段的保障，资本才获准进入了‘外围’”，这样的说法容易让人误解。如果他们在这里表达的全部意思是指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在资本进入“外围”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客观事实。但是，如果他们指的是资本只有完全地依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作用才能进入“外围”，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中心国家的资本进入外围国家，首要的动机是经济利益，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外围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资本能够为外围国家带来某些经济的、技术的和管理的利益。因此，后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四）后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即跨国公司与管理者资产阶级的结合，到底是加强了威权政治的影响，还是推进了民主政治。对此，斯克拉和贝克尔同样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斯克拉的回答是，管理者资产阶级“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寻求各种形式的政治垄断的庇护，例如一党执政的政府和军政府”（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贝克尔则声称：“因为管理者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非狭隘地为自身服务，所以，它不需要依赖于强制性的力量；而且，它还能够与正式的民主政治共存。”^① 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说明了后帝国主义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

当然，尽管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存在以上这些不足，但它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特定时代，就已经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予以了高度重视。例如，恩格斯就曾经明确指出：“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

^① David G. Becker, “‘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Peru Under Military Rul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66 ~ 67

为的经济基础。”^①如何理解这些表述，特别是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辩证地阐发透过这些表述所表达出来的观点，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作者单位：曹义恒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后经典文丛》序言

中文中的“经典”指的是传统的和具有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比如：中国的医学工作者把《本草纲目》视作中医经典；儒学学者把孔子的《论语》（当然也包括一些后人的研究著作）视为儒学经典；《古兰经》和《圣经》分别被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人视为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则被马克思主义者或其研究者视为经典。经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过去一定时期内具有权威性，后来渐渐失去了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一种是始终都具有权威性的典籍或著作。这就出现了中文中“古典”与“经典”的区分。前者被称为经典中的古典。古典的不一定是古代的，同样的，经典的也不一定是现代的。意义全在今人的态度而确定。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它是古代的，而是因为它是过去了的经典。中国的《论语》出自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古代的，但是，它对于儒学研究者而言，则依然是经典。

不过，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经典的，在时间上都是指过去发生的，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因此，英文中对这两者不加区分也是有道理的。英文中的“classic”不仅有“古典”的含义，而且有“经典”的涵义。更重要地，这个词在英文解释中还有“有名的、著名的；传统的和典范的”等等涵义。经典的这一层涵义虽然在中文词典中尚没有来得及添加，但是，中文的日常语言中却已经非常普遍地流行起来了。比如人们常说的“经典歌曲”，“经典评语”，“经典手势”，“经典对白”，“经典语句”，“经典案例”，“经典笑话”，“经典短信”，“经典假唱”，等等。经典概念的这些用法，或许有的是在调侃的意义上，而有的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但是，它们取得都是“传统”和“典范”的含义。经典概念一旦突破了典籍和著作的范围，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对象的形容词，

其表达的空间便被无限地扩大了。

我们这里使用的经典概念显然不是指具有权威性的典籍和著作，而是特指某些经典理论和对于这些经典理论的经典理解。在这样的经典的意义上，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理论形态。将近 100 年来，尤其是近 50 多年来，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战以后，尤其是近 30 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使得这些一向被认为是具有绝对权威地位的经典理论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后经典理论。

本丛书就是在大量的此类文献中选取的一小部分，它们虽然不能与经典理论相提并论，但是毕竟涉及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变化，代表了一些新的思潮。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阅读经典之余，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许会增长一些知识；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阅读这些文献，则或许对于其研究工作会有所帮助。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自从成立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希望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能够有所贡献。

李惠斌

2006 年 9 月 26 日

目
录

导读..... 曹义恒 曹荣湘 (1)

第一部 理论缘起

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 理查德·斯科拉 (3)
 社会化适应：一项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考察 ... 塞尔·沙茨 (29)
 为什么是后帝国主义？ ... 戴维·贝克尔 理查德·斯科拉 (48)

第二部 批判争鸣

国际资本与国家发展：后帝国主义理论述评
 杰夫·弗里登 (73)
 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的阶段划分 基思·海恩斯 (90)
 全球化的阶级政治 亚历桑德罗·科拉斯 (98)

第三部 另类视野

美国的帝国主义，欧洲与中东·····	萨米尔·阿明 (129)
帝国主义：历史阶段还是当今现象？·····	琳达·卡蒂 (152)
帝国的幻象·····	巴希尔·阿布曼那 (160)
超帝国主义时代·····	卡尔·帕里尼 (180)
编后记·····	(188)

hou diguo
zhuyi

第一部 理论缘起

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

理查德·斯克拉

实证研究的新领域常常带来理论上的挑战。事实上，这些挑战往往是旧挑战的再生，或是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发现。政治学家们也许可以在多国商业企业（multinational business enterprise）的扩张现象中找到肥沃的研究土壤。但是，他们所遇到的挑战也许与某些国家的公司制企业（corporate enterprise）在过去的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并无实质的区别。事实上，政治学在理解现代企业方面的失误是众所周知的。正如格兰特·麦康奈尔（Grant McConnell）所说：“现代公司的存在并不符合长期以来的政治组织概念；并且运用现有的任何一种理论，也都无法与这一概念取得一致。”^① 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与政治发展及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关联为政治学家们应对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这一点。

在本文中，我将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讨论由公司权力（corporate power）问题引发的三个论题，它们与以前那些关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公司权力的著述是一致的。随后，这三个涉及到经济寡头、管理权威和阶级形成的论题被转换到了跨国层面的研究。近期关于跨国企业和非工业化社会问题的著述表明，与以前相比，现在我们可以

* 译自：Richard L. Sklar, 1976: *Postimperialism: A Class Analysi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Expans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9, 1 (1976): 75-92.

① Grant McConnell, *Private Power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1966), p. 129.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也许还可以从更深的理论理解层面上，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阿道夫·伯利（Adolf A. Berle）的观点比政治科学所面对的其他任何挑战都更能激发人们作出防御性的反应，他认为，公司“本质上是一种非国家的（nonstatist）政治组织”^①。在标准的政治科学中，为了分析的需要，人们广泛地接受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彼此无关的假定，而伯利的这种思想却使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②。伯利的思想还对以下这种主张施加了产格限制：在经济组织方面依赖于各种寡头形式的社会中，民主能够通过政治秩序得以实现。他的看法暗示我们：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学家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归结为不同的起源和活动，其中必定有着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但是，那些从事科学的政治分析的先驱们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回避这一挑战，即不敢把他们的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统一的权力领域。以这种富有鼓动性的前提为基础，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就曾宣称：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概念上具有一致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应该包含大部分的经济学科，后者也是查尔斯·海尼曼（Charles Hyneman）的看法^③。说伯利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共识，

^① Adolf A. Berle, Jr.,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4), p. 60; and *Power Without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pp. 17 ~ 24.

^② 尤其是系统理论家们（systems Theorists），他们为了分析的目的而把生活中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正式分裂开了。例如，可参看：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 60;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pp. 19 ~ 124. 至于“集团理论”（Group Theory）中的这一倾向，可参看：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 Process*, 2d ed. (New York: Knopf, 1971), pp. 257 ~ 260.

^③ George E. Gordon Catlin, *Systematic Polit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似乎并无不妥。

伯利和加德纳 C. 米恩斯 (Gardiner C. Means) 于 1932 年出版了分析当代公司权力的经典之作^①。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种现代公司内部的管理自主化理论, 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值得讨论的: 这两位作者发现, 公司组织形式的演变必然伴随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 而且, 具有决定性的权力落入了管理者的手中, 而没有落入所有者的手中。与伯利和米恩斯的结论相反, 其它一些权威研究却表明, 到 1940 年为止, 美国大型非金融类公司大都处于最主要的所有者控制之下^②。尽管如此, 伯利和米恩斯还是宣称: 管理权威的时代已经到来, 至于这种管理权威是与法定所有权不可分离, 还是与各种独立的基础同时存在, 他们则未加考虑。他们的说法距离宣告“管理者阶级” (managerial class) ——一个由公司本身的组织规则而造就的阶级——的产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因此, 最近与托派马克思主义渐渐疏远的詹姆斯·伯纳姆 (James Burnham) 1941 年宣称: 在公司的培育下, 美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正在出现一个管理者统治阶级 (managerial ruling class)^③。

一般来说, 那些认为社会阶级是财产所有权产物的人, 往往都不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个官僚的或管理者的“阶级”的说法^④。

1962), pp. 34 ~ 48; 45 ~ 47; Charles S. Hyneman, *The Study of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9), pp. 142 ~ 150.

① Adolf A. Berle, Jr., and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Rev.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② 莫里斯·蔡特林 (Maurice Zeitlin) 曾对这些研究作过评论。参见: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5 (1974): 1073 ~ 1119.

③ 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new ed. (Bloomington: Midland Book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④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A Marx for Managers”, *Ethics* 52, 3 (1942): 200 ~ 215.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弗兰茨·诺伊曼 (Franz L. Neumann) 曾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经济权力被转换成了“社会权力以及随后的政

然而，商业企业的管理者和那些以自己的专业技能替商业企业服务的人，以及其它职业部门里与他们相对对应的从业者，通常都被划分到了财产所有者的行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组成了资产阶级^①。官僚机构作为“中间管理层”的补充代理人，也推动了与财产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曾经说过，美国的公司中已经产生了一个由初级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新的中间阶级”。这个阶级是“庞大的、民族的（national），并且是没有财产的”。和威廉 S. 怀特（William S. White）一样，哈克也给这个阶级贴上了“美国人”（homo Americanus）或“大多数美国人”（Consensus American）的标签。这个阶级的社会思想模式是（局限于民族范围内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而不受地方性的狭隘限制；其政治类型是被动型的和无党派的，而不是积极参与型的和有党派的（过去的中间阶级就曾如此）^②。

除了哈克、威尔逊（H. H. Wilson）和其他少数几个政治学家之外，大部分学者在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时候，全然不提公司的政

治权力”。他对有关政治权力从社会集团转移到了官僚机构手中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还把官僚行为从阶级行动当中区分出来。参见：Newman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5, 2 (1950): 161 ~ 180.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中的“官僚问题”，可参看：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80 ~ 99.

① 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对“合成等级”（synthetic gradation）的揭示。参见：Ossowski,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trans. Sheila Patter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p. 44 ~ 57. 代表性的言论还包括：Leonard Reissman, *Class in American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pp. 217 ~ 218; Zeitl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pp. 1078 ~ 1079. 至于不同的观点，可参看：Gerhard Lenski, *Power and Prestig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p. 352 ~ 361.

② Andrew Hacker, “Politics and the Corporation,” in Hacker (ed.) *The Corporation Take-Ov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p. 239 - 262; William H. Whyte, Jr.,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6)).

治影响^①。我在上文曾经间接地提到过与伯利、米恩斯和伯纳姆的先驱之作有关的三个论题；这三个论题显然能够引起那些研究跨国公司的学者的注意。首先，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伯利的作为“一种非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公司概念，倾向于认为寡头政治（oligarchy）有可能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政治。这可能会遭到某些学者的反对，例如那些观察到公司权力正在管理者和雇员当中进行重新分配的学者^②，以及那些满足于将民主政治定义为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不完全竞争体系的学者^③。在伯利自己看来，公司权力合法地从国家权力当中分离出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分离可以使自由主义制度在现代工业的条件下变得完美无缺^④。从超国家（supranational）水平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抵消寡头垄断新公司的

① 我本人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对商业企业展开政治学研究，是由于受到威尔逊（H. H. Wilson）教授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精采讲课的启发。在对公司权力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中，有两个人及其著作有必要提起，他们是：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Earl Latham, “The Body Politics of the Corporation,” in Edward S. Mason (ed.), *The Corporation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18 ~ 236. 埃德温·爱泼斯坦（Edwin M. Epstein）曾对相关文献作过评论，参见：Epstein, *The Corpor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最近的重要研究包括：Richard J. Barber, *The American Corporation* (New York: Dutton, 1979)；Karen Orren, *Corporate Power and Social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② Peter Bachrach,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pp. 102 ~ 105.

③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7), pp. 269 ~ 273, 283.

④ 这显然是伯利偏爱美国公司体制甚过苏维埃体制的主要理由。参看：Berle, *Power Without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pp. 141 ~ 158. 同样的，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这位最主要的多国公司研究权威也曾宣称：“社会组织方面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我们的未来社会所立足的大的单位能够像一种起抵消作用的政治权力那样发挥作用，而不是起到一种相互强化的作用。”参看：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273.

权力的国际政府，那么，公司权力发展的结果就只能加强寡头政治的影响。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J. Barnet）和罗纳德·穆勒（Ronald E. Müller）将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中居领导地位的管理者称为“世界管理者”^①。那么，多国公司管理者所从事的活动能保证并维持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统治吗？换言之，谈论寡头政治必然会涉及到帝国主义问题。

第二，从超国家水平来看，一旦考虑到公司的政治能力在世界事务中的潜在影响，有关自主化管理权威的旧有争论就会变得更加尖锐。尤其是，这种争论还直接涉及到公司管理者的以下能力（通常是他们自吹自擂的）：他们除了能够实现其正常的经济目标以外，还能按照广泛的政治的、社会的价值观行事。约翰·K. 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曾经证明：“成熟的公司”所追求的原则上的非经济目标与它同时追求的、首要的经济目标和技术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坚持认为：事实上，公司需要这些社会目标来保持许多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而言）的忠诚和操守替公司服务^②。这个主题得到了许多研究多国企业的学者的进一步发挥。因此，霍华德·V. 珀尔姆特（Howard V. Perlmutter）认为：占领导地位的跨国公司中的高层管理人员是新时代里最为重要的“社会设计师”。他将这些“以地球为中心的人”假定为“以地球为中心的公司”——即跨国企业，其各国分支机构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运作——的理想的管理者^③。

^① Richard J. Barnet and Ronald E. Müller, *Global Reac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4) .

^② 他原来的相关用语是“技术队伍”（technostructure）。他认为，运营效率取决于公司是否与技术队伍中的大多数个体成员按照“一致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个人价值观以及社会目标相适应。参看：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pp. 169 - 188.

^③ Howard V. Perlmutter, "The Tortuous Evolu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Courtney C. Brown (ed.), *World Business: Promise and Problem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pp. 66 - 82.

第三，除了管理自主化的论题之外，我们也许还可以研究跨国阶级的形成问题，这个阶级的核心部分是由那些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所组成的。要证实这个论题，我们就必须表明：这个假定的阶级中的任何成员都是作为一个集体来思考和行动的。一个社会阶级的维持和巩固需要多方面的活力。而跨国统治阶级则特别难以颠覆，因为它占有许多国家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加强它的权力。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权力集团，其重要性也许超过了帝国主义概念。我们将把以上三个论题——帝国主义、管理自主化与跨国阶级的统治——放到跨国公司向非工业化国家渗透的背景下来讨论。

二

我们可以按照以下的标准来恰当地定义跨国公司（或企业、商行）：跨国公司由母公司和子公司所组成，这些子公司位于几个或多个国家，除了贸易之外还从事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跨国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子公司之间互相支援，并都服从子中心的管理。作为跨国企业的一个单元，每一个子公司的管理层所制定的策略都是为了提升跨国企业的整体利益^①。例如，为了提高企业的

^① 这些论述取自以下著作：Jack N. Behrma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 pp. 1~2; John H. Dunning,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The Background," in Dunning (e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Allen & Unwin, 1971), pp. 15~48;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p. 4; Isaiah A. Litvak and Christopher J. Maule, "The Multinational Firm: Some Perspectives," in Gills Paquet (ed.) *The Multinational Firm and the Nation State* (Don Mills, Ont.: Collier-Macmillan, 1972), p. 22. 萨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主张，“跨国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是一个更适合描述带有这些特征的商业组织的术语。他对于“跨国的”、“国际的” (international)、“多国的” (multinational) 组织的明确界定，可参看：Huntington,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25, 3 (1973): 333~368. 巴尼特与穆勒则更喜欢使用“全球公司” (global corporation)，参见：Barnet and Müller, *Global Reach*, pp. 17~18.

总体利益，它有可能将某些生产性的业务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或缴纳更低的税金；这样的做法似乎非常普遍。无法避免的是，企业的总体利益总是与它的核心机构的利益相一致。由于母公司确实都具有某个特定的国家身份，并且它通常都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特定国家的普理者所控制，因此，跨国企业的扩张显然会维护和加强工业资本主义强国的霸权统治。简言之，跨国企业管理人员对国家或组织的忠诚有可能会与帝国主义势力融合在一起。有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论证：

不属于任何政府的资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国家才能够设立政府：跨国政府这种东西并不存在……例如，假如资本所属的国家政府垮台的话，资本就会失去其必不可少的保护者。那么，这种资本要么并入其它国家的资本，要么不再成为资本——受到革命政权的管辖，这些政权致力于废除一切与资本有关的生产关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进程将走向这两种结局之一：世界帝国，或者世界革命。^①

史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曾经以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

^① 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 "Note o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onthly Review* 21, 5 (1969): 1~13 and 21, 6 (1969): 1~13. 对于那些善辩者来说，与一个时下流行的笨拙的术语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将它解释成一个符合既定目的的术语。“第三世界”（Third World）一词就属于这种情况。该词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解释成了“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差异重重的集体，它们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金字塔的基础”。参见：*Monthly Review* 21, 5 (1969): 2~3.

了跨国公司通过经济手段使帝国主义得以提升^①。他的论证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技术要素与组织要素将带来不同的后果。在他看来，单独的技术扩散并不会产生或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这种情形很明显是公司组织的结果。公司组织按照等级原则对计划、协调和日常业务等各种职责进行分工。结果就是子公司的增多，这些子公司的活动与比它们级别更高的、同样从属于母公司的子公司在地区水平上进行协调，而母公司本身则位于那些掌握着公司权力和制定公司计划的重要地理中心^②。

马克思主义看一般都认为，统治（即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统治）与剥削总是密不可分的——在跨国公司扩张的过程中也是如此，相对贫穷和弱小的国家为了保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而被迫付出多种多样的代价^③。现在，很少有人会自寻烦恼地通过复活那种早已消逝的、仁慈的、家长作风似的维多利亚帝国主义原则来向这种假定挑战^④。但是，有人对子帝国主义的影

① Stephen Hym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agdish N.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pp. 113-140.

② 尽管海默自认为自己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有关公司组织和子公司分布的论述却取自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并带有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决定论意味。另两篇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它们是：Norman Girv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xport Economies,"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19, 4 (1970): 490-526; Johan Galtu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8, 2 (1971): 81-117.

③ 参看米歇尔·巴勒特-布朗 (Michael Barratt-Brown) 对这种观点的精辟归纳：Barratt-Brow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74), pp. 201-255.

④ 参看伯纳德·齐美尔 (Bernard Semmel) 有关这种看法的分析：Semme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53-72；以及理查德·凯布勒 (Richard Koebner) 和赫尔穆特·丹-施密特 (Helmut Dan Schmidt) 的分析：Koebner and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ld, 184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66-220. 同样参看约翰·普拉蒙纳兹 (John Plamenatz) 对收益和成本的冷静考察：Plamenatz, *On*

响还抱着一种有点荒谬的看法，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只是损害了那些被压迫的人，而且损害了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约翰·A·霍布森 (John A. Hobson) 的与众不同的观点^①——反帝国主义学看曾经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再三地强调了这种看法。所以，巴尼特和穆勒坚持认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的方式或其它剥削性/控制性的手段系统地欺诈了贫穷国家，并因此阻碍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他们还赞同霍布森的观点，主张跨国公司应该对公司的“母国”尤其是美国出现的没落趋势直接负责；没落趋势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不发达国家的状况。他们说，把一些生产性和配送性的业务从美国特移到那些低工资的“东道国”，尤其容易使美国工人受到伤害^②。

这些现象表明，用来在严格的意义上解释帝国主义概念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应该与这种统治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混为一谈。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涉及的与其说是对权力的评价，不如说是对结果的评价。一直到20世纪中期，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一种假定：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剥削性经济关系是借助于帝国的统治而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的。随着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解放，以及共产主义政权与它的资本主义对手实力相当，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剥削的根源将更容易找到，也更容易被逐步消除。跨国企业的鼓吹者坚持认为，这实际上

Alien Rule and Self-Government (London: Longmans, 1960) .

①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rev.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38) . 同样参看伯纳德·齐美尔 (Bernard Semmel) 对“霍布森-熊彼特理论” (the Hobson-Schumpeter theory) 的敏锐归纳: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22-226.

② Barnet and Müller, *Global Reach*. 参看其中以他们的署名的两篇文章: “The Latin-Americ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bsolescence of American Labor.” 同时可参看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对美国用对外投资取代国内投资和对外贸易的趋势所作的尖锐批判，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概念的澄清: Gilpin,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

是历史在非共产主义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为了回应对他们的剥削行为的指责，他们说：跨国公司使技能、技术以及最为迫切需要的资本资源扩散到了非工业化国家，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并且还通过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保障。由于国际经济关系当中的所有各方都既存在收益，也存在成本，因此，相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对这种观点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与跨国企业的情况相反，如果能够证明特定的工业化国家相对于特定的非工业化国家或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的经济地位上升了的话（或者以损害后者为条件），人们就可以认为：这里所讨论的国际经济关系促进或维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事实上，有关这种由以跨国公司为中介的国际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相对收益和成本的争论曾经非常激烈；由于争论双方各自提出的论据都非常具有说服力，这种争论很可能是无休止的和没有结果的^①。

那些提倡剥削性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们除了要承担搜集关于成本的证据这一重担之外，他们还必须承担另一项理论上的任务。尽

① 下述言论更加突出了这些相反立场的分歧。巴勒特-布朗（Barratt - Brown）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剥削问题进行了探讨：Barratt - Brow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罗纳德·穆勒（Ronald E. Müller）则从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探讨：Müll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in Charles K. Wilbu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p. 124 ~ 151.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则提供了反对剥削的例子：“Multinational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Foreign Affairs* 53, 1 (1974): 121 ~ 134. 米拉·威尔金斯（Mira Wilkins）对美国流向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进行了简短总结：Wilkins, *The Maturing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98 ~ 401. 同时可参看以下著作的谨慎的、折衷的评论：Raymond F. Mikesell, "Conflict in Foreign Investor - Host Country Relation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in Mikesell et al.,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troleum and Mineral Industr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9 ~ 55. Paul Streeten, "Costs and Benefit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Dunning (e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fn. 19), pp. 240 ~ 258.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管殖民主义和其它一些明显的帝国主义政治控制形式消失了，他们仍必须解释剥削关系的持续性^①。显然，仅仅从论证（通常还是可以反驳的论证）剥削关系入手来谈论统治是不够的。在这些学者的头脑里，关于帝国主义统治（是否在持续和为何持续）的论据，与最近对相对收益和成本问题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明确性极不相称。由于未能令人满意地搞清楚与统治问题有关的争论所涉及的独特问题，他们并没有真正加入到关于多国企业时代的帝国主义的讨论中去。

三

对“经济上的”帝国主义^②的研究依赖于收益 - 成本的计算，但是，这与权力的基础和运用并无直接的关系；而管理权威的问题却与公司权力的研究有着直接的、明确的关联。权威是由管理者执行的。管理自主化的预言者误解了利益的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的演变，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分离的过程！巴尼特和穆勒近来对那些与美国大型“全球”公司有关的迹象作过如下的总结：“在美国公司的上层当中，并没有一支由那些在利益方面与所有者不同的管理者组成的‘技术队伍’。这些管理者越来越变成了所有者，在他们的收入中，越来越多的份额并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管理技能，而是来

^① 最近的依附论和新殖民主义学说尤其涉及到这一问题。后文将在更加合适的地方对这两种学说加以评述。

^② 我之所以给“经济”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我把“帝国主义”当成一个政治概念，意指某个人、民族或国家被另一个人、民族或国家所控制。我认为，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的定义太生硬。参看：Strachey, *The End of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pp. 7-8, 319-342. 我所定义的“帝国主义”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包括购买、出售、租让，以及强迫和感化。在我看来，参与这些实现过程的制度是“政治的”。同样可参看：Benjamin J. Cohen,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15-16.

自于他们在自己的公司中所拥有的股份。”^①然而有趣的是，对管理自主化的争论却有可能在讨论跨国企业扩张问题的时候再度流行起来，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讨论非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的结果，在这些国家，公司制企业是在外国资本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毫无疑问，对非工业化国家管理规则的考察并不标志着一开始就使这种观点脱离了它的原始背景。迄今为止，那些对“管理革命”进行研究的学者为了证实他们的论点，都曾提到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尤其是苏联^②。那些批评苏联的“官僚主义”威权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曾经重复并政进过托洛茨基在《背叛革命》一书^③当中所作的言辞激烈的论断；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将它视为一个由“政党-官僚分子”（party-bureaucratic）所组成的“新阶级”^④，但是，另一些批评家却并不这样认为^⑤。查尔斯·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使用“国家资产阶级”（state bourgeoisie）这一术语来描述并谴责苏联的统治阶层；他坚持认为：按照毛泽东主义者的逻辑，这个阶级的存在实际上只不过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复活^⑥。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样，那些非社会主义的、新兴的发展

① Barnet and Müller, *Global Reach*, pp. 246, 294, 458.

② Burnham, *Managerial Revolution*, p. vi.

③ Leon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trans. Max Eastm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37).

④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New York: Praeger, 1957).

⑤ Herbert Marcuse,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Praeger, 1957).

⑥ Paul M. Sweezy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 43. 同时可参看斯威齐（Sweezy）热情推荐比特海姆（Bettelheim）讨论苏联阶级斗争的新作的评论：“The Nature of Soviet Society,” *Monthly Review* 26, 11 (1974): 1~16; 27, 1 (1975) 1~15. 从官僚控制角度讨论阶级关系，这种推论最多也只是沾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传统的边而已。其理论基础正是拉弗·达伦多夫（Dalf Dahrendorf）的学说，即认为阶级关系本质上是权威关系，而不是财产关系。参看：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37, 165.

中国家中的官僚分子也已经逐渐走到了公共事务的前台。从其特征来看，除了他们当中少数相对贫穷的同僚之外，这些国家的官僚精英在收入方面和社会方面享有的特权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和预期。法国农业学家雷内·杜蒙（René Dumont）对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和贫困的经济状况的批评感人肺腑；他在批评当中指出：“非洲正在形成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一个公务员（civil service）资产阶级。”^① 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的“官僚资产阶级”（bureaucratic bourgeoisie）这个概念，已经被有效地用于非洲研究^②。然而，这个术语似乎并不符合诸如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中的社会现实，在这些国家中形成的是企业家资产阶级（entrepreneurial bourgeoisie）；而且，那些研究亚洲和拉丁美洲社会的学者也并没有广泛地采用这个术语，在这些国家，私人企业仍然是最主要的经济形式。

不管是在对工业社会的研究中，还是在非工业化社会的研究中，官僚阶级与企业家阶级的权力关系都变成了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在大多数新兴发展中国家里，由于私人企业部门依赖政府保护和支撑的大致程度普遍地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也使得理论上的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都会相信：这种依赖程度如果太大，或者太小的话，就会自动地产生一种理论保护机制，以化解我们在分析官僚的生活领域与企业家的生活领域之间的模糊界限之时所遇到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观念，以便把公司的管理者、博学的专业人才、一流的政治家以及上层官僚理解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成员。也许“管理者资产阶级”（managerial

^① René Dumont, *False Start in Africa*, 2d ed., rev., trans. Phyllis Nauts Ott (New York: Praeger, 1969);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 179.

^② 例如参看：Ian Clegg,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Algeri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同样重要的另一项研究是：Claude Meillassoux, "A Class Analysis of the Bureaucratic Process in Mali,"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6, 2 (1970): 97~110.

bourgeoisie) 这个术语可以使我们提出有价值的思想。由于这个术语明显涉及到私人企业精英、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因此它比“官僚资产阶级”或“国家资产阶级”的说法更加合适。而且,与“企业家资产阶级”这个术语相比,它清楚地反映了非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各个部分之间的职责安排^①,他们的职责是管理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建立新的创造财富的企业^②。

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曾经说过,在很多后殖民地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中,人们都是依据政府为发展所作的贡献来理解和评价政府的^③。发展本身是一个价值取向概念,它意味着实现预期的目标^④。与那些涉及到政治目标的价值前提不同的、政治方面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它表示某个国家控制变革的速度和方向的能力的提高。在这一定义中,控制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表示政府制定与执行用来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策略的能力。在新兴发展中国家,

① 我把一个国家界定为工业化国家所依据的标准是:如果该国大部分人口——半数以上——所从事的职业依靠的是非人力的、非动物的力量(其动力是机器技术),那么该国就是工业化国家。判断工业化的基本标准包括:人均标准能源消费量;非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机械制造业所拥有的机械生产能力。按照以上标准,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被归类为非工业化国家,尽管它们也拥有大量的工业部门。大多数印度人和巴西人都有生活并工作于他们国家的工业部门之内。在非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程度最低的部门和那些被认为正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部门之间的差别十分巨大。

② 本部分内容采自:Richard L. Sklar, *Corporate Power in an African Stat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199. 该书为讨论这些观点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同时可参看马丁·基尔森(Martin Kilson)对“非洲新资产阶级”的有趣看法:Kilson, “African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 4 (1963): 425~440 (esp. p. 439)。

③ C. 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④ 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 (New York: Pantheon, Random House, 1968), v. 1. pp. 49~69.

权力组织形式上发生的剧烈变化——组织革命^①——常常被政府用来提高其实行社会控制的效率。这些政治转变过程本身的效率，则取决于能否从受过专业培养的人们当中招募到新的成员，以便充实新的、再现活力的政府机构。所以，对于政府来说，某些民主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制度设计——例如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虽非必需，但却肯定有用。不过，即使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和社会关系，这些新的组织成员也只占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约为5%~10%。由物质利益驱动的这种组织革命，无非是阶级形成和阶级特权的温床而已。

在所有的社会中，这种“来自于上层的革命”都存在着产生保守趋势的倾向。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现代的保守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是有区别的，它通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防止组织革命向社会革命转化，或防止权力的阶级属性发生改变。一般而言，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的管理者资产阶级事实上是权力的产物，它会小心翼翼地防止激进主义的破坏，并保持它作为一个优势阶级的地位。由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不是很稳固，并且不能完全地依赖于自由主义的原则，因此它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寻求各种形式的政治垄断的庇护，例如一党制国家和“凯撒式的”（caesarist）的军政府。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词藻也许会“涌现出来”，以掩饰这种强加给别人的政治垄断。但是，这样的安排往往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②。

那么，经验性的论据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证实本文所定义的管理

① Harold 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272 ~ 273.

② 这种观点的经典表述可参见两本著作：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马克思并不喜欢19世纪的波拿巴主义和古典的凯撒主义之间的类似性；以及：Fanon, *Wretched of the Earth*, pp. 148 ~ 205. 还可以参看科林·利斯（Colin Leys）对马克思和法农（Fanon）在这方面的清晰比较：Leys, *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 207 ~ 212.

者资产阶级对非工业化国家的普遍的阶级统治这个论断呢？虽然莫里斯·蔡特林（Maurice Zeitlin）正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对不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行研究^①，但这种经验性的论据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区域研究尤其重要。在非洲研究中，许许多多的文献都支持了这个被人们质疑的论断^②；在亚洲研究中，有少量关于印度和伊朗的著述也具有确证的价值^③；在拉丁美洲研究中，那些与巴西有

① Zeitlin, *Corporation Ownership*, p. 1112.

② 关于尼日利亚政党政治、国家资产阶级和企业领导者之间的阶级关系的总结性论述，可参看：Richard L. Sklar and C. S. Whitaker, J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in Gwendolen M. Carter (ed.), *National Unity and Regionalism in Eight African Stat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7 ~ 150. ; 27 ~ 30; 65 ~ 67; 110 ~ 115. 同时可参看：Richard L. 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Sayre P. Schatz, *Nigerian Capit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关于埃塞俄比亚政治的深入阶级分析，可参看：John Markekis, *Ethiopia: Anatomy of a Traditional Po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其他非洲国家的比较研究包括：Leys, *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 Michael F. Lofchie,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Uganda Coup,"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 4 (1974): 464 ~ 496; Robert Molteno and William Tordoff, "Independent Zambia: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in William Tordoff (ed.), *Politics in Zamb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p. 363 ~ 401; Sklar, *Corporate Power*, pp. 192 ~ 216. 扎伊尔“凯撒式官僚主义”方面的重要论文有：Jean - Claude Williame, *Patrimoni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ong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Meillassoux, "A Class Analysis of the Bureaucratic Process in Mali"; Clegg, *Worker's Self-Management*; Gerard Chaliand and Juliette Minces, *L'Algérie indépendante* (Paris: Maspero, 1972); Manfred Halper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51 ~ 78; Anouar Abdel - 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trans. C. I. Mark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这些参考文献对于集中讨论我给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所下的定义来说，并不是全部。此外还有大量评论和考察非洲阶级斗争的文献，但它们对于本文的结论并不是特别重要。

③ 关于印度的资产阶级如何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可参看：Charles Bettelheim, *India Independent*, trans. W. A. Caswel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同样米歇尔·基德龙（Michael Kidron）认为，印度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政府部门、国外企业和国内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双向支持，参看：Kidron, *Foreign*

关的论据则更加明确^①。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作为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存在必定意味着某个特定的国家会易于接受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则，那将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正如坦桑尼亚的情况表明的，人们也可能选择反资本主义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策略^②。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国家在与各种形式的国外投资相结合的时候，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混合的经济策略。政府投资机构与多国公司之间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对组织革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还促使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当中的领导成员都在不断地

Investments in Ind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值得注意的还有詹姆斯·比尔斯 (James Bills) 对伊朗的阶级分析: *The Politics of Iran* (Columbus, OH: Merrill, 1972), 以及他的专题论文: Bills, "Class Analysis and the 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 4 (1972): 417~434. 与此有关的还有: Marvin Zonis, *The Political Elite of Ir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① 关于多国企业作为一种强大的工业力量在巴西经济中所起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可参看: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ssociated -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Alfred Steph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42~176. 在巴西最大的20家企业中，根据其资产价值排名，14家是政府控制的，5家是多国企业控制的，1家是巴西的私人投资者。弗农 (Vernon) 曾对美国控股的企业在巴西和其他地方大量招募的本地管理者进行过深入统计，参看他的: *Sovereignty at Bay*, p. 149.

② 坦桑尼亚非共产党领导人建立社会主义的持续努力，获得了广泛研究。米歇尔·罗夫切 (Michael F. Lofchie) 分析了从这些研究中引发出来的几个重大问题，参看: Lofchie, "Agrarian Soci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The Tanzanian Case," *Comparative Politics* 8, 4 (1976): 479~499. 同时可参看: Reginald Herbold Gree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An Essay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colonisation," in Christopher Allen and R. W. Johnson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73~324; John S. Saul, "African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Tanzania,"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 Saul (ed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p. 237~335; Issa G. Shivji et al.,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3).

努力接受那些外国商业伙伴中的资本家和管理者的态度。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也许还渴望能在更加广泛的商业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个社会精英阶层在接受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个人生活方式之后，也许还希望拥有精英意识。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将强化政府官僚精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内在趋势。

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与国际资本主义机构之间的伙伴策略有可能使人们放弃那些非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坚持的民族主义原则。很多“激进派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这些国家的时候，都低估了其资产阶级阵营的力量及其历史重要性，也低估了这个阶级的民族主义的一致性（integrity），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致笔。有时候，人们会使用一个贬义的形容词“买办的”，来描述这个“资产阶级”的一般特征。买办一词是“傀儡”的同义语——即完全地依附与服从^①。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委托人”阶级出现的，它服从于外国的资本主义权力，而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这个观念是与它有密切联系的“依附论”学说和“新殖民主义”学说的基础^②。这些学说的意图实际上是想提出

① 常被引证的著作是：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pp. 194 ~ 196. 安德列·弗兰克 (André Gunder Frank) 是这一学派的典型例子，参看：Frank, *Lumpenbourgeoisie: Lumpendevlopment: Dependence, Clas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trans. Marion Davis Berdecio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trans.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p. 20 ~ 25, 359 ~ 394.

② 对于新殖民主义的尖锐的、但也对这一概念本身抱有一定认同的批评，可参看：Barratt-Brown,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pp. 256 ~ 284. 对于依附论的比较研究，参看：Susanne Bodenheimer, “Dependency and Imperialism: The Roots of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 in K. T. Fann and Donald C. Hodges (eds.), *Readings in U. S. Imperialism*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71), pp. 155 ~ 181. 西奥多·莫兰 (Theodore H. Moran) 表明了这种学说起源于智利，以及“依附”这一概念的某些弱点：Mor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查尔斯·古德塞尔 (Charles T. Goodsell) 专门检验了

一种后殖民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是无法从传统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推演出来的。正如它们受惠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些学说也与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失去了战斗力，因为它们所依据的阶级概念都是不恰当的。正如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与阶级相关的决定性因素应该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强制方式之间的关系^①。在控制了消费方式和强制方式的情况下，本文所定义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依附论和新殖民主义所定义的、自主的社会力量——一个在构成了所谓的“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中的名符其实的统治阶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阶级的特征变得更加明确^②。它的自主化的迫切愿望是不容我们质疑的。并且，其民族主义立场的坚定性也决不亚于任何其他阶级。

管理者资产阶级强烈的民族主义给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提出

“依附”问题的各个方面：Goodsell, *American Corporations and Peruvi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关于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的现实赞美——也是对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标准的依附论所持的基本信条的驳斥，可参看：Bill Warren,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81 (1973): 3~44. 对依附论所作的尖锐的批判性评论，可参看：Cohen,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pp. 189~227.

① Ossowski, *Class Structure*, pp. 185~186.

② 在早期一项主要讨论尼日利亚阶级结构的政治意义的研究中，我使用过“新兴阶级”（new and rising class）这一描述性概念。判断这一阶级，依据的是四个客观标准——高级职业、高收入、高等教育和拥有商业企业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同时结合了这一现实，即通过阶级行动和初始的阶级意识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证据。参看：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pp. 474~505. 随后，我受盖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启发，采用了“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这一术语，来指代那些控制着社会的统治制度的人，参看：Sklar, “Contradictions in the Nigerian Pol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 2 (1965): 201~213; 203~204. 出于本文以及我另外一篇论文（Sklar, *Corporate Power*, pp. 198~209）中提出的理由，我现在认为“管理者资产阶级”这一术语更加适合于描绘非工业化的、新兴发展中的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现代统治阶级。

了历史性的挑战。他们有能力使自己的实践与新兴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政府所持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相协调吗？我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只会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才可能这样做。亚当·斯密告诉后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商人也会为大众谋利。在商业信条里，对这种观点的理解甚至更加貌似合理：为他人谋利者，自身亦受益。

多国企业集团的子公司在有关的东道国家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时候都会使自己的政策与不同的东道国政府的利益协调一致，这种期望是不是不符合逻辑呢？我在研究活动于几个中南非洲国家的多国矿业公司时，曾描述过恰恰具备这种性质的公司政策。尤其是我注意到：那些在赞比亚共和国设立的、由南非和美国控制的矿业公司，曾经忠实地执行了赞比亚在经济上隔绝于那些白人统治的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即使在赞比亚政府还没有取得这些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权的1970年以前也是如此。他们的这种做法使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尽管事实上赞比亚的政策与南非及美国的母公司管理层所推行的经济价值观和政策并不一致。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在执行与设立于其它国家（也包括那些白人统治的南部非洲国家）的子公司之间保持同样良好的公司内部关系的政策的时候，并没有明显地迁就于赞比亚人的观点^①。

上述研究提出了公司的所在地原则（doctrine of domicile），它表示国际企业集团的单子公司也许会遵循它们各自的东道国政府所推行的、与它们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的要求。当然，本地化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提升整个企业的利益。同时，良好的公司内部关系将会吸引那些新开拓出来的东道国的领导人，他们有可能愿意与国际企业组织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在实现利益双赢的情况下，所在地原则可以使跨国企业的扩张合法化，同时使它能够在东道国的眼皮底下合法地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此外，所在地原则还给本地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树立威信带来了好处。

^① Sklar, *Corporate Power*, pp. 144 ~ 148; 164 ~ 178; 182 ~ 188.

我对作为一种公司意识形态信条的所在地原则的描述，依据的是从一个动荡不安的、在许多方面不那么典型的地区收集到的政治和法律证据。在该地区，新近独立的、公然反资本主义的安哥拉政府和莫桑比克政府与大型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检验我的这种观点。在南部非洲以及其他地方，人们更难以找到在日常企业运作中损害公司集团利益而服从于东道国利益的证据。

巴尼特和穆勒在对跨国企业通过所依靠的“转移价格”做法、“交叉补贴”策略和各种形式的剥削手段进行研究之后，他们得出结论：有必要运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身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管制政策来约束和教化全球公司^①。其他一些更加同情跨国公司的评论者则发现：公司的政治才能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它们所寻求的策略绝对会同时满足跨国公司管理者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府的需要^②。合资企业正在推动所有权中的重要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向东道国政府机构转移，这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合资企业的这种策略既未能平息人们对剥削的愤怒，也未能解决控制问题，因为小部分所有权仍然有可能维持对某个企业的控制，同时，东道国自我管理的实现也要视许多情况而定，其中包括在各种领域获得技术能力。尽管如此，合资企业还是促进了“来自于上层的革命”，并因此有助于为提升资产阶级的权威，加速其成长创造制度条件和舆论氛围。

四

管理者资产阶级在其控制范围内——尤其是在新兴发展中国家、非工业化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内，往往超过了比它规模更

① Barnet and Müller, *Global Reach*, pp. 363 ~ 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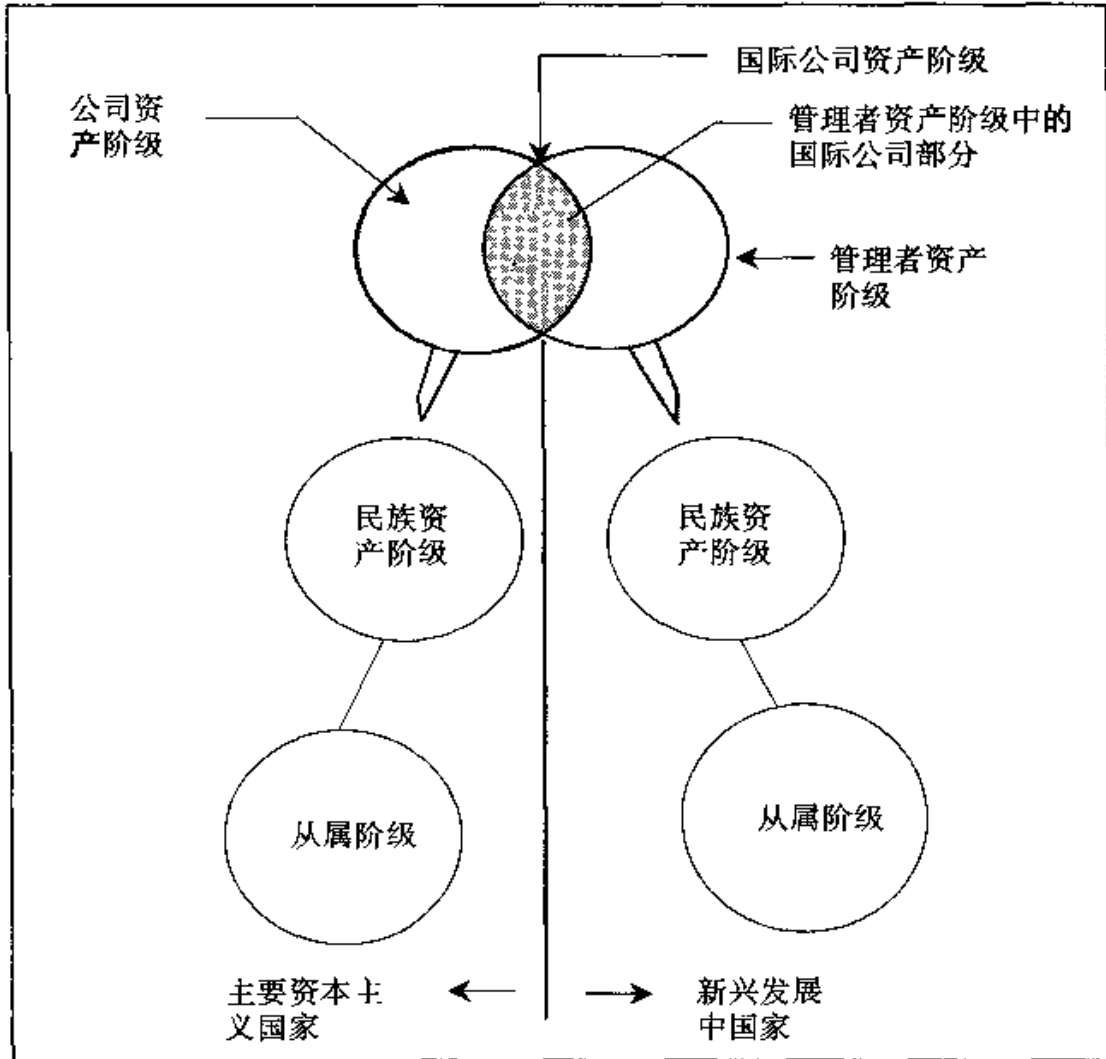
②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pp. 265 ~ 270; Mikesell, *Conflict in Foreign Investor - Host Country Relations*, pp. 48 ~ 51.

大的、通常大得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后者的规模与层次主要决定于国家的大小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实际上，管理者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①。它的集体行动及其成员的态度都表现了它作为一个亚阶级（subclass）的明显的行为特征。这种行动比其它任何行动都更能使这个亚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这个整体；它同时表现了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倾向，即与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进行联合，以使自己在外国具有同等水平的控制能力。所在地原则成为公司的行动准则，这种情况有利于把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坚定的民族主义与有着全球利益和全球视野的国外资产阶级领导者所持的世界主义价值观（cosmopolitanism values）协调起来。因此，所在地原则起到了提高跨国阶级凝聚力的作用。

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观点中得到启发：如图所示，世界范围内的公司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上的阶级，现在包含了三个相互交叠的实体：公司资产阶级，它主要以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其中包括一部分国际公司资产阶级。新兴发展中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它也与国际公司资产阶级重叠在一起。资产阶级各个相似部分之间的这些跨国扩张和相互联系，取决于跨国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多国公司也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组织。因此，我们应该按照跨国阶级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和理解多国公司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凭借其创世纪的传统，已经领先于其它阶级。

^① 这种概括应该被理解成与蔡特林（Zeitlin）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统治阶级的呼吁相一致。参见：Zeitlin, *Corporation Ownership*, p. 1112. 我对非工业化国家统治阶级发展的概况的描述，必须根据这一认识来解读，即每一个国家都混杂着自身特有的官僚要素、企业要素和传统的寡头政治要素。

全世界公司和管理者资产阶级的结构图



公司跨国主义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日益抬升的阶级利益。随着这一主要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世界上的工人阶级将会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直面公司资产阶级，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直面管理者资产阶级^①。如果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向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变的趋

^① 正如贝特海姆 (Bettelheim) 所主张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将面对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参见：Paul M. Sweezy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 43. 同样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也认为，如果不是从形式上看而是从实际看，世界上只有一个经济体系，直到在整体上被转变之前，它本质上仍然是资本

势继续下去的话，那里就会出现本地化的公司资产阶级。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继续发展下去，公司资产阶级也许有希望取代管理者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本文所做的是短期分析，其目的是希望使人们去关注两个统治阶级——管理者资产阶级和国际公司资产阶级——之间互相联合的关系。通过本文的分析，我希望跨国阶级形成的论断能够让人信服^①。

列宁曾明确地指出：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②，这些战争也许还会使资产阶级的跨国演变过程中断和夭折。但是，这种危险已被排除，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公司资产阶级的教条式

主义的经济体系。参看：Wallerstein, "Dependenc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17, 1 (1974): 1~26; "Trends in World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26, 5 (1974): 12~18;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4 (1974): 387~415.

① 同时可参看欧文·霍罗威茨 (Irving Louis Horowitz) 所作的发人深思的评论：Horowitz,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Multinationalism," in Abdul A. Said and Luiz R. Simmons (eds.), *The New Sovereig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World Power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5), pp. 120~138 (esp. pp. 123, 129~130).

② 参看列宁 (V. I. Lenin) 对卡尔·考茨基 (Karl Kautsky) 有关帝国间合作的论断的驳斥：*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p. 88~98. 考茨基1914年这篇富于鼓动性的论文，部分重版于：*New Left Review*, 59 (1970): 41~46. 有关这场争论的当前情况在以下著作中有所描述：Richard J. Barnett, *Roots of War* (New York: Atheneum, 1972), p. 229; Barratt-Brown,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pp. 323~325.

自由主义^①与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家长式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之间产生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资产阶级——公司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命运也许是由国内斗争，而不是由推动反叛国家对抗外来强权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所决定的。

（曹义恒 译）

^① 关于美国的公司自由主义思想，请参看：James Weinstein, *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 ~ 1918*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Martin J. Skla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United States Liberalism," in James Weinstein and David W. Eakins (eds.), *For a New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p. 46 ~ 100.

社会化适应： 一项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考察*

塞尔·沙茨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当前许多趋势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一种新的假设，即资本主义社会面对各种问题时显现出特别的响应方式，我把它叫做社会化适应 (socializing adaptation)，在本质上它应是一种国家内部发生变化的过程。然而，社会化适应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出现，虽然说也有一些重要的动向与之背道而驰。

国内的社会化适应

我的分析源于马克思的一个思想，即他着重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源进行的阐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的社会化或相互依赖的本质，与指导生产体系具体运作的决策体制之私人性或分裂性本质，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调和性（矛盾）^①。生产体系本身是社会性的，生产使一个国家内各种分散的经济事业间

* 译自：Sayre P. Schatz: *Socializing Adaptation: A Perspective on World Capitalism*, *World Development*, 11, 1 (1983): 1-10. 作者对 Eileen Applebaum, David Good, Robert Heilbroner, Gerald Helleiner, Jay Mandle, Richard L. Sklar, 以及 Milica Zarkovic 提供的有益评论表示衷心感谢。

^① 用马克思的话说，即是在“社会中生产的物质力量”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所有权关系”间的冲突。马克思在概括他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时提出了这个冲突，“一旦得出这个结论，它就成了我研究中的一条主线”。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4) pp. 11-12.

形成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它通过各种相关企业间的复杂网络来实现。企业不仅在供给与市场方面相互依赖，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既定企业来说，可获得的投入形成了其生产过程的特性，同时从反面来说，它的投入需求又形成了供给企业的生产过程。除此之外，每一个企业都深受宏观经济要素（如总需求水平）的影响，这些宏观经济要素决定了整个经济是否健康并具有活力。而且，生产网络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还呈现出另一种倾向，它会持续不断地为技术发展水平所提升。但另一方面，涉及生产的决策又是以一种不太协调的方式做出的，因为单个的公司是依赖于有限的信息与资源来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关乎利润的目标的。这些目标间常常相互冲突。

这个根本性的不可调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轻微的秩序紊乱到足以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严重过失。尽管考虑到了可资借用的信息与资源，并服务于一定的利益需求，单个分散做出的决策自身可能是理性的，但从社会总体上看又常常是非理性的。这些决策可能会对明显理性的决策者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实质损害。例如，整体上和储蓄决策不匹配的投资决策会引起经济活动水平的降低，使失业增加，贫困加剧，几乎所有人的收入水平都要下降。或者，当增加收入的决策最终对超过正当收入之外的收入也损出要求时，它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又如，基于利润标准的生产决策可能会损害环境；人们也常常强调，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外部性会被忽视^①。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指望资本主义会崩溃在这个基本矛盾的重压之下，然而，特别是在较发达的经济环境下，资本主义仍是繁荣依旧。这导致一个问题：马克思预言的失致是简单归咎于基本矛盾思

^① 根本性不协调的表现就在这里呈现出来，它无意去为这一思想的有效性树立坚固的基石。后者将是一个重要任务，但这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激发了我对根本性不协调思想的理解，但是读者可以接受这个思想，也可以摒弃这个假设，反之亦然（或者，很正常地是，对二者可以同时接受或摒弃）。

想的错误？还是说存在其它的解释？我想应该是后者。

资本主义一直保持其活力的原因是，它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已经显示出来，然而马克思却并没有预见到。那就是，当遭遇严重功能失调时它通过减轻和弱化这个基本矛盾的方式来加以适应。由于延缓的缘故，资本主义已经间歇性地、不太完全地适应了它的决策体制^①。

当然，面对不利情形，所有社会都会调适。我认为，资本主义的调适过程是一种特别的适应——社会化适应。它有三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它使生产体系社会化或集中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社会化的。随着生产相互依赖性的增加，决策尽管滞后一些，但它同这种相互依赖性相协调的程度也在增加。虽然在许多方面，经济决策的中心没有改变，然而在其它方面，决策的基础拓宽了。政府会采取行动对经济决策施加社会影响与控制^②。

举个例子来说，大萧条的经济问题就被各种社会化适应方式化解了。人们采取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自由金融政策，这构成了关于总需求水平的集中决策，因为正是关于总需求要素的单个决策引起了经济活动的萧条。社会化适应的其它形式还包括更广泛面有效的银行监管，通过诸如失业救济、社会安全、劳动法、农业法及其他方式提供最低福利等。这些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对相互依赖的社会生

^① 人们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性—私人性的矛盾看作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相反的一个原则，出于私人目的的个人行为方式引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而不是和谐（斯密），还有更多的并联可以来说明它。斯密期盼私人的利益追求或者说个人主义（在竞争的情况下）会仁慈地指引看不见的手，但是他的观点部分地被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个人间原子式的竞争受到垄断倾向的践踏。同样，马克思期盼经济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在私人控制生产方式的情形下）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垮台，但他的观点也被证明是不完善的，因为个人主义的生产控制方式受国家对生产体系的控制方式的排斥。

^② 不断加强的社会化决策变化在公私两个层面都在朝前发展，它反映在集中、合并、联合与跨国性等多方面。

产体系进行调控，就约束和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恶性的内部机能障碍。

社会化适应的第二个特性就是，这些适应性的变化倾向于最小化，也就是说，它们的努力刚好能够扭转对制度生存造成的威胁，本来扭转这些威胁有很大的力度范围可以选择，但它们只是见好就收。这种稳健的效果源于深层的政治过程因素。

正是通过政府对一系列冲突压力加以回应，社会化适应才得以进行下去。即使是高度成权体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冲突压力做出反应。而且，资本主义体系是民主的，它就更可能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做出调适，利益受损的群体也会发挥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反应倾向于稳健而适度。首先是，其它各方面压力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尚处于静止稳定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存在强大的维持现状的利益要求。现存经济体的所有人与控制者会采取有效行动抵制侵蚀其自治、权力与收益的政府措施。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如果体系功能的自然运行和（或者）偶然事件，导致一些领域的问题升级，政府会力求采取最小化的审慎行动。但是，若问题恶化，政府就要采取实质行动缓解不满。这不是一个仔细校准国家反应的问题，也不是由一群封闭的统治精英巧妙算计决策的问题。在任何建议性决策都具有的不确定性状态下，采取什么样的行为要考虑到许多利益的取舍。这样，对于国家来说，趋势就是比必须要做的多一点就行。结果，资本主义趋向于只是适度地来处理那些问题^①。

第三，社会化适应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更进一步的措施总是需要的。

资本主义的这种根本性不协调在不间歇地发展。生产的相互依赖性在持续不断地加深，并且依赖的方式也在变化。但是决策系统的有效调整，尽管也有临对突发的适应性，却总倾向于滞后一些。

^① 当然，有时所采纳的措施会起到我们不曾预料到的后果。

于是，资本主义总是会产生新的功能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的失序又以新的形式出现。甚至缓解问题的方式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人们认为，自20世纪初大萧条时期以来，成功地阻止严重的经济萎缩与大众失业问题的政策已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削弱了反通货膨胀的力量，因而也孕育了顽固的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倾向，并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害怕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后果，失业又日胜一日^①。

因此，资本主义常常会表现出社会化适应过程。甚至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由于勒德分子广泛攻击机器与工厂、犯罪猖獗以及其它穷困与愤怒的表现，而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时，政府就努力加强对极其恶劣的生产厂家的利润导向实施个体控制，例如限制工作时间，禁止童工从业。社会化适应过程自那时以来就持续进行了^②。在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绝对和相对开支的同步增长，就证明了存在着社会化适应^③。

全球的社会化适应

我认为，这种根本性的不协调如同在国家层面一样，也存在于全球层面，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南北问题的复杂性。它（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南方经济增长让人印象深刻）威胁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存，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化适应方式（尽管也有相反的潮流）也在发展起来。

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性的不协调正以一种日见增长的程度显现

① 如参考 Robert L. Heilbroner, : *Inflationary Capitalism*, The New Yorker, 8 October 1979, p. 121ff.

②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社会化适应代表了生产的社会化本质（立论）与控制的私人本质（反论）二者间的矛盾通过综合生成政府或社会对生产的控制而实现的局部变革。

③ 早先关于社会化适应的讨论并没有强调它在维系资本主义生存方面是否持续有效。这个重要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出来。现代生产使全球许多地方的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相互依赖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一直在不断地增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加剧了。世界贸易，相互依赖的一个很好的标志，已经以加剧增长的方式显示出来。特别是伴随着战后经贸迅速扩张，国家间合作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构成世界生产体系的无数单位却在相对狭隘的基础上，继续受着狭隘的目标的引导和治理。每一个单个的企业都根据它自己获得的信息与资源，自己做出决策来追求自身利润的增长。即使是政府政策（本意是要实施社会控制）也首先是作为国家政策出现的。比起世界生产体系来说，政府政策发挥影响的领域也比它们试图支配的领域要小得多。

这个根本性的不协调，就像一国之内妨碍发展的状况一样，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①。于是，当19世纪50年代的殖民时期，主要的贸易公司和航线鼓励宗主国生产的输入，从而压抑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时，它就是根本性不协调的表现之一。这种不协调的表现还有如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在欠发达国家（LDCs）采用不相称的技术^②，或者转移定价逃避东道国的税收^③，或者更谨慎地，他们提高税率波动与平衡支付的压力^④。发达国家（MDCs）还对欠发达国家（LDCs）的制造品设置比他们的初始产品更高的关税保护价格，以此阻碍欠发这国家的产业发展，这也是不协调表现之一。总而言之，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反，

① 本文并不关心“第三世界”国家内妨碍发展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由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引起这一问题。

② 资本集中型的技术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形成的，也适合于在发达经济体中应用。这种技术只是雇佣相对较少工人，因而在欠发达国家也就加剧了失业。

③ 在跨国公司各个国家子公司间贸易的商品，可以采用人为定价的方式来削减其中一个子公司的账面利润。

④ 由于跨国公司常常是持有许多国家大量的货币，因而对于它们来说卖出有可能会贬值的货币尤需谨慎。然而，价值让人忧虑的货币增加供应了，也会导致并加剧预期的贬值。

在任何时候，只要是对个别公司或国家有利的行为，就会损害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那就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协调。

20 世纪下半叶，一个主要的社会进程是“第三世界”的觉醒，在这种情形下，南北差距对“整个西方政治经济体系”构成了全面威胁^①。首先，“第三世界”的骚乱在许多方面直接威胁到了商业利益：外国投资可能受到实质损害，组织分崩离析，产权以较低的价格被强制剥夺或完全没收，合约被废除，对外生产的企业可能拿不到劳务与商品的报酬，存在外国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可能被冻结，或者只能以较高的不利汇率得到遣返。出于某些考虑，一些欠发达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如像欧佩克那样组成卡特尔联盟，或者内向型发展）扰乱世界贸易和损资。同样出于这些考虑，一些欠发达国家可能会背叛（或图谋背叛）资本主义，或者用“核讹诈”迫使大量财富转移到这些国家，甚至干脆加入到核武器“再分配的战斗”中去^②。

南方愤怒不满的效应通过南方联盟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南方国家领导人知道束缚发展的一些领域包括了国际贸易与投资，同时也乐于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问题转移开，因而对多边方式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兴趣日增，并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南方国家组织在一起的力量，尽管时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是在不断增加的^③。

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依赖性不断加强，“第三世界”对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挑战的力度也就大大增强了。经典的帝国主义经济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World According to Brzezinski” (James Reston interview of Zbigniew Brzezinski),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1 December 1978, p. 10ff.

② Robert Heilbroner,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 Norton, 1974), pp. 42 - 45.

③ 一个相反的观点，可以参考 Geoffrey Barraclough: “Waiting for the New ord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October 1978, pp. 45 - 48; 以及他的: “The Struggle for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9 November 1978, pp. 47 - 58.

理论，如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市场、原料来源、投资机会方面不可能自立，就像一个剧本，只不过以修正的方式，在现在比以前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在过去，对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标准有力的辩驳就是，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以及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相对不重要的。然而，情形已经变化了。欠发达国家相对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正显得越来越重要。用世界银行的话说：“也许人们还未能充分理解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下一个十年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① 世界银行的分析同经典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是并行不悖的，只不过它把主题浓缩在相互依赖的理论之中。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欠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不断增加的粮食与能源供应”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贫穷落后的国家“是世界资本市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已经富有成效地在储蓄供给上做出很大贡献”^②。北方对南方不断看涨的依赖，为南方国家的要价提供了物质基础，南方国家的要求更加强而有力^③。

由于一些其它的发展，如北方国家只懂得使用大棒政策、对顽抗的欠发达国家秘密干预的能力弱化，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对滥用大国权力的反对，也使南方的挑战成效得到增强。

为了回应这些生存威胁，整个西方政治经济体系正在全球规模上展现出一种社会化适应过程，其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扩张对世界经济秩序的社会化控制。更多的决策以某种集体方式做出，以单个国家或公司的特殊利益为基础的经济行为越来越不占优势。政府间或合作成协商。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3.

^② 同上, p. 68.

^③ 尽管“在南北谈判中北方确实占据优势”，然而，《经济学家》警告说，北方的“自利性将会提醒自己在南方发展中所冒的风险”，参见 *The Economist*, 17 February 1979, p. 85.

跨国公司勉为其难地同时维持着世界范围内子公司的发展潜力与利益。商业决策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它影响力稍逊一筹的组织，也帮助影响着世界经济事务。关系世界经济所有决策的加权平均值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摆来摆去。

而且，这些决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更多的全球利害关系的影响。较贫困国家的福利，以及由南北冲突造成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可能威胁，受到更多的注意。

在更具体地描述全球社会化适应（GSA）方式的假设之前，明白假设不等同于狂言是很重要的。要想成功，社会化适应不必慷慨地，或完全驯服地，抑或充分地去满足人类最低的生存需要。即使面对病人膏肓不能不顾的问题，这一过程也可以是勉强的、傲慢的、吝啬的。然而，要是这一过程足以平息危害体系生存的不满，那么它们就构成了成功的社会化适应。它们也许一点也不会改善欠发达国家的境遇，但总可以减缓某种恶化趋势（这种恶化可能归因于其它发达国家的某些政策）。这些变化有可能是自私自利的，“切实可行而又持久的优惠待遇安排必然要同时考虑到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利益与需要，这一点是越来越明确的”^①。只有在欠发达国家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时，让步才会出现。问题并不是这样一种调整“不会克服大众的贫困、退化的农业、扭曲的工业及经济结构——这些因素助长了畸形的城市化、文盲、不完善的教育医疗服务以及其它困扰社会的种种疾病”^②，核心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否足以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的存续。

全球社会化适应（GSA）过程可能（也许有点武断）要从第二

^① Bahram Nowzad, “Differential Trade Treatment for LDC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15, 1 (1978): 16-21.

^② 哈里·麦格多夫 (Harry Magdoff) 提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若奇迹般得到采纳可能倡导的某些变化”，参看：Harry Magdoff,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Reform”, *Monthly Review* 30, 1 (1978): 1-11.

次世界大战算起^①，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领导国际秩序的年代它已经有了雏形。那时，国际经济制度集中于大不列颠，由它来制定程序与方式。然而，由于欠发达地区的问题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也就不需要社会化适应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中心地位瓦解，在此之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建立起来了。由于技术因素（交通与通讯大大改善了）、政治因素（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相关安排）、组织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联合国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推动，组成不断扩大的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了。由于世界“经济倒退”领域里的一些问题^②，组成一个不断扩大的集体也是值得的。在大萧条以及战后大规模去殖民化背景下^③，经济发展援助被广泛认为是必要的。首先，发展项目中主要的合作努力出现在特定的发达国家与大量它们先前的殖民地国家或新出现的殖民地及其它附庸国之间，但是随后不久，更多的合作努力，或是直接合作，或是通过国际组织，就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了。随着美国经济、政治与军事优势地位的衰退，世界资本主义显现出一个更明显的多中心体系，这也在推动着发达国家间的合作。

世界秩序的社会化控制也有许多扩展手段是为了支持欠发达国家的，即全球社会化适应这一情形，常常也是对“第三世界”抱怨

① 早期的制度威胁问题源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也采取了早期的适应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是一种解决北北问题的方式。在二次大战期间相对于世界生产体系的依赖程度来说，决策体系显得有些狭隘，由此导致了北方国家间的问题。但本文只局限于南北问题。

② 二战后早期的一个专门术语。

③ 二战后去殖民化也许是最首要的全球社会化适应行动。从表面上看，去殖民化似乎涉及更多的是决策分散化而非社会化，因为原来正式掌握在帝国强权手中的经济决策是由许多新兴国家做出或参与做出的。然而，我认为，事实正相反。去殖民化表明社会控制的有限延伸，因为先前按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当然也受宗主国政府的修正——来运行的殖民地经济过程，现在由于新兴国家的出现变得更易受控制了。

放任性国际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回应。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由北方国家支配，但作为一个事务性、技术性团体，它主要关心的是维持一个平稳运行的世界金融体系。甚至在这里也有一些小的有利于欠发达国家的权力转移，决策体系的社会化程度也有了些许的提高。成立于1972年的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二十国委员会）包括了9个欠发达国家，这一安排也延续到它的继承者“临时委员会”。这远不是象征性的举措，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对这些委员的报告产生了影响。”^①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力量，也因欧佩克（OPEC）国家的投票权而得到轻微的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功能的部分转变也在进行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采纳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部分地把它自身变成一个协助金融清算的机构。”^②

世界银行就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一直是持援助倾向的。其最初意图是直接措向发这国家的，被要求按“健全的银行业惯例”行事。然而，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到现在，世界银行就只关心欠发达国家了。世界银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根据欠发达国家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融资政策，它能获得的主要来源于发这国家的资金也大大增加了。

世界银行本身在其贷款政策、给许多种事业——它们最初受原

① Nowzad, "Differential Trade", p. 17.

② Jyoti Shankar Singh,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ew York: Praeger, 1977), P. 4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欠发达国家的方式包括向他们分配畅销利润，对进口石油的欠发达国家提供高优惠的贷款，“补偿性融资”认可的扩展（提供贷款来补偿由于价格波动或其它原因导致进口收益暂时下降）。参见 William R. Clin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p. 5 - 7, 89 - 90; Singh,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p. 45, 145; Edward M. Bernste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Richard N. Gardner and Max F. Millikan (eds.), *The Global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 131 - 151 (esp. pp. 140 - 141).

先坚持的保守的银行原则所拘束——提供援助等方面变得越来越灵活了。它的还款期限也变得越来越可以延展了^①。而且，它在1960年成立了附属的国际发展协会，对较贫穷的欠发达国家采取更灵活的贷款政策和高让步性的还款期限^②。除此之外，世界银行的第三类业务（the Third Window）也组建起来，特别为那些人均收入稍高而不能加入国际发展协会，但满足世界银行普通条款又有困难的国家服务^③。

还有一些其它的全球社会化适应形式。官方的国际援助一直很重要^④。在提供援助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一直还有一些合作通过经济合作组织与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提议来进行，这样的合作在本质上是双边的，它们得以形成之目的就是为了协调援助政策。由许多代理机构提供的联合国开发援助，则对国际援助稍稍作了点补充^⑤。

在国际贸易中，对欠发达国家的差别待遇原则一直被明确接受，并渐渐得到延伸。这个原则在1957年正式引入关贸总协定（GATT），那时欠发达国家的“特殊要求”得到明确认可。紧紧追随1961年与1963年的协定，1965年关贸总协定的第四部分申明：“发达缔约方不要指望和欠发达缔约方在贸易谈判中得到互惠互利，或得到他们的承诺——降低或取消贸易关税及其它壁垒。”它又补充

① 1965年，单一利率向以支付能力为基础的利率转变了。贷款期限与自由还款宽限期也慢慢延长了，在目前这一般分别是20和25年。

② 50年的偿还期，10年的宽限期、全免利息，或者代之以每年0.75%的服务费。

③ 第三类业务是根据介于国际发展协会与规则的世界银行条件之间的条件来提供贷款的。

④ 南北援助的绝对数额在过去的15年一直保持稳定，在一年150亿美元左右徘徊（按1977年美国美元衡量）。当然，从占捐赠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说，它是持续下降的，从来没有达到过1%的目标水平，甚至离大大缩减了的0.7%的目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这一目标水平受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认可，却没有为美国接受。美国的援助额从1960年GNP的0.53%降到1977年的0.22%。

⑤ 这样一种援助数额还不足全部官方给欠发达国家援助数额的4%。此外，许多并不提供援助的联合国机构也承担着与援助欠发达国家特别相关的操作性活动。

说，“考虑到过去的贸易发展，欠发达缔约方不必做出与他们自身的发展、财政与贸易需要不匹配的贡献。”第四部分还要求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提供便利的市场准入与市场稳定性。普遍特惠制（GSP）在1970年被引入，它允许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商品给予单边的关税优惠，同时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维持正常的税率。

虽然动作缓慢，但贸易优惠原则实际上已经在贯彻了^①。有关它对欠发达国家的影晌的评价并不一致，不过看来至少有一个适中的影响^②。

我以为，这种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要求加以妥协的方式，就代表了全球社会化适应的早期阶段。面对欠发达国家账户平衡与债务问题不断攀升、许多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价格又不断下降的情形，

① 到1977年中，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欠发达国家的热带产品实行了非互惠型的贸易让步。1975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洛美会议对46个欠发达国家提供了有利的待遇。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参与到全球社会化进程中，对欠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实行优惠的方式，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特定的计划。欠发达国家一般会从发达国家间的互惠贸易中得益，因为这些互惠措施会自动地通过发达国家间贸易而延伸到按非互惠原则操作、不提供任何回报的欠发达国家身上。然而，1978年、1979年的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对欠发达国家来说是失望的。欠发达国家本指望能产生进一步的有利安排，但从总体上说没能实现。关于欠发达国家的期盼，可以参见：S. J. Anjaria, “The Tokyo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15, 1 (1978): 14 - 15; Isaiah Frank, “Reciprocity and Trade Polic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15, 1 (1978): 20 - 23; 以及 Nowzad, “Differential Trade”。关于欠发达国家的失望不满，可以参考以下评论（*The Economist*, 21 April 1979, p. 95）：从总体上说，和发达国家一样，欠发达国家是从本轮谈判中得利的，但是他们在会议刚开始就抱怨的“会谈没有取得新的对穷国有利的进展”则是真的。富国没有充分履行他们的承诺。

② 参见 Albert Fishlow,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What Kind?” in Fishlow et al., *Rich Nations And Poor Nat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8), pp. 11 - 86, esp. p. 63; Robert E. Baldwin and T. Murray, “MFN tariff Reduction and LDC Benefits under the GSP,” *Economic Journal* 87, 345 (1977): 30 - 46.

全球社会化过程如今还是谨慎的，当然，也表现出一些相反的趋势，如新保护主义、相对南北问题美国人更看重东西问题的做法。然而，人们有理由相信全球社会化适应已经成功地向前推进。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欠发达国家的整个经济增长与发展要比大多数人的预期好得多。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前 25 年里，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几乎递增 3%^①。这大大超过了目前发达经济体在其工业化时期所取得的增长率，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这些国家的人均增长率每年不足 2%。伴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欠发达国家的出口递常也得到增长。事实上在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增长得最为迅速，其中许多国家还生产技术上相当复杂的机器与设备。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在绝对值方面，在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例方面，都在不断增加。通常它们还值其出口多样化。在基础设施、技术、现代复杂制度的运行以及经济的其它方面，他们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欠发达国家也在生活质量的更多层面取得进展。1960 年至 1975 年间，对于欠发达国家中低收入者来说，小学生在校比例由 32% 上升到 52%，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这个比例由 79% 上升到 97%。其它的教育活动也显示出相似的改善。生活质量在其它许多方面上升了，数据资料显示，识字率在不断增加，婴儿死亡率在不断下降，预期寿命在增加，安全用水与排污系统覆盖超来趋广，营养水平也在提高^②。

^① 这个统计数据以及本文中其它所有把欠发达国家当作一个整体的资料都排除出中国、古巴以及其它中央计划型经济体。中央计划型经济在大多数国际资料中都没有包括进来。这一段以及下一段列举的数据都来自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8*, pp. 3 - 11, 76 - 79. 也有另外一些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80); *World Bank, World Tables*, 2d e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0), 它对世界经济及相关统计资料做了一个方便而有极有价值的收录。

^②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来展示这些相关的统计资料。

南方国家相对优异的表现，部分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的灵活运行导致的，部分是由欠发达国家的内部变迁导致的。我认为，它也得到了全球社会化适应的促进。拿外国援助来说，它是最容易计量的全球社会化适应形式。在1950年至1980年间，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援助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按1977年不变价格计算）^①。当然，援助计划也会受自身缺陷、计划失败或不能产生效益等缺陷的困扰。（然而，对这种援助计划的最彻底批评——这些计划造就了受按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并把〔更好的〕替代性社会主义选择排除出局——与这里讨论的问题不太相关。也就是说，即使在资本主义进程下，全球社会化适应也有助于加快发展。）但是，就算除去浪费、腐败和失误，人们也很难相信3500亿美元的边际效益为零或呈负数。考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断增加的援助有一部分（最近大多数年价里约为三分之一）要通过世界银行及其它多边代理机构过滤筛选，因此，认为这些援助有益于增长的观点就会得到强化。世界银行审慎地借出自己的钱，大部分钱是支持那些被认为可以自我清偿或银行可以接受的项目。这些项目以一个相当保守的期限来评估，也有积极的盈利作用。此外，大量的联合国开发援助计划、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优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它的国际组织以及其它的社会化适应形式，也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有所贡献。应该说，这种判断是合情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社会化适应在促进发展方面做得很好或干得很漂亮。它仅仅只是说，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事实上还存在着保护、垄断以及其它阻碍发展的政治经济倾向，但如果没有全球社会化适应的行动与制度安排，欠发达国家就不会取得比现在更好的发展。

^① 这只是作者的估计，建立在以下新材料之上：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8*, pp. 98 - 9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978 Review* (Paris: OECD, 1978) 以及更早期关于这个相同或类似标题的出版物。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改善的发展绩效对全球社会化适应来说还有另外一种含义。这些成就，不管其成因如何，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全球社会化适应没有更具活力地进行下去。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一些突变之外，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适应总体记录尽管有一些严重的不满和倒退，但它仍然有效地运行着，并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只有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表现出摇摆动荡，威胁到“第三世界”对此秩序的依附时，全球社会化适应才会有退步的威胁。

我到现在一直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社会化适应，即出于帮助欠发达国家的目的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对南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相对成功的贡献。而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改善了的绩效也限制了全球社会化适应的程度。我进而认为，走向全球社会化适应的趋势，除了一些小的波动之外，是不可逆转的。南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权力一直在上升。同时，北方国家帮助南方国家发展的承诺也在慢慢拓宽。调适的进程就像不可倒转的棘齿一样只能向前，对欠发达国家的让步与妥协，一旦做出就极难撤销。而且，要求更多让步的压力也会无情地增加。在收入差异太大的情形下，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决不可能太快。即使统治精英与有钱人会满意，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会不满足。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抵挡住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他们的诱惑。

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假如迄今为止提出的命题是有效的，全球社会化适应促进了东方的发展，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就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问题：是采用某种社会主义形态，还是采用某种受全球社会化适应过程控制的资本主义形态？

尽管本文不打算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比作一全方位的讨论，但是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主张的大效轮廓还是可以描述一下。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并不像人类理性期盼的那

样完美。虽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南方的发展相当不错，但是最贫穷的欠发达国家通常仍然是发展得最慢的。占“第三世界”人口半数的国家（除中国之外），在1950年至1975年间，人均收入每年增长不足2%。除开它们与发达国家巨大的差距来说，它们的增长率相比发达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同期的增长率要慢得多，收入的绝对增长也少得让人同情^①。最贫穷的欠发达国家与世界其它国家间的绝对与相对收入差距也正在不断扩大。世界上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集中于少数几个富裕国家。与此类似，在大多数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内，无论我们认为它们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还是低收入的国家，增长的绝大部分财富也流入到极少数的精英手中，收入不平等在不断加剧。

况且，好几亿人还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即“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教育和医疗保健极为缺乏”^②。世界银行估计，1975年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经济体中这样的人有7.7亿之多，占总人口的37%。这还不是在最贫穷的国家里。在中等收入的欠发达国家，这样的贫困人口有1.4亿人，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16%^③。虽然绝对贫困部分地说是一个收入积累不充分的程度问题，但它也是不同国家之间和一个国家之内的收入分配问题。

人们还可以列出更多的棘手问题，但这对本文的目的没有多大作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他们认为，按过去的标准，资本主义的表现应当是很充分的了，但若“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社会主义路线，那它们会更富裕。中国的发展记录让人们相信这种论点是真实的。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一成就——世界银行发

^① 另一方面，人们可能认为，与过去的停滞相比较，最贫穷的欠发达国家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增长率的加速发展。这个历史性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尽管对于正处于贫困折磨的国家，还有那些受人同情的国家来说，等待这一过程是让人痛苦不堪的。

^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8.

^③ 同上，pp. 33.

起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奇迹”——得到了广泛认可^①。

在1950年到1975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是非常突出的（尽管后来的增长看起来放慢了许多）。与其它欠发达国家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3%的水平相比，中国每年的平均收入与产出增长了4.2%^②。因此在25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高出了40%。由于与其它小国的发展问题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拿几个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记录来做比较，那么中国的发展记录就更让人称奇。中国4.2%的增长率是其它七个人口众多国家平均1.9%增长率的两倍多^③。

大量的研究指出，迅速的增长通常不仅会减少穷人的相对收入，而且会降低收入的绝对水平，即引起绝对穷困。这些研究也一直受到怀疑与批评。关于收入分配的资料是贫乏的、不可靠的，服务于各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很明显，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记录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人们似乎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在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可能还有墨西哥，在穷人中间没有大规模的绝对穷困。”在其它的一些大国，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25年里，除中国外，世界上其它较贫穷的地方绝对是变得更穷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它取决于如何理解各种争议中的具体情形^④。

^① David Morawetz, *Twenty - Five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50 to 197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9. 这项研究列出了八个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而且有较高增长率的国家和地区（利比亚、伊拉克、台湾、韩国、伊朗、香港、牙买加与以色列），但在1975年他们总共人口加在一起才1.06亿人，而中国一国就有8.2亿人（原文如此——译注）。这几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环境帮助解释其快速的经济增长（p. 15）。

^② 同上，pp. 12 - 13。

^③ 同上，p. 15。这些国家按人口数量排序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1.9%的数字是按人口来衡量的平均增长率。

^④ 同上，pp. 42 - 43。

衡量一种经济运行好坏的主要指标就是预期寿命^①。以它来计算，中国也做得很好。从1950到1955及从1960年到1965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从48岁增加到了60岁，然而对所有其它欠发达国家来说，它们的人均寿命只是从42岁增加到49岁。中国的人均寿命要远远高于其它欠发达国家里的人均寿命，而且它的增长幅度也要大得多^②。

总之，本文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重要而持久的全球社会化适应过程已经展开，它推动了南方国家的发展。在全球社会化适应的早期阶段，如果把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得到全球社会化适应帮助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让人满意。但是对于这个时期的欠发达国家而言，更中肯的比较就是，把他们当时的发展与有可能的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下取得的发展做一比较。在这里，东西问题与南北问题汇合在一起了。此时，结束我的关于全球社会化适应的假设陈述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包雅钧 译)

^① 寿命的增长“提供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增长指标”，因为“寿命的增长，比起紧密相关而又有限的医疗状况的改善来说，更多的是由生活条件综合性进步所带来的。”同前页注^①，pp. 48-49。

^② 同上，p. 48。

为什么是后帝国主义？*

戴维·贝克尔 理查德·斯克拉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受另一个人、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国家的统治 (domination)。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关系，但它仍然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力量来维持——特别是经济力量——这些力量与其说来自于国家的“合法的权力垄断”，倒不如说来自于公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关的各种理论都把这种统治的起因确定为商业企业的本性及其影响。这些理论当中都存在一个这样的假定：为了避免国内企业体系面临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崩溃威胁，各个企业必须把它们商业活动扩大到国外市场上去。列宁抓住了这些理论的精髓，并宣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的”或最后的阶段^①。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却在不断地发展，并适应了各种政治条件的变化。在当今的两极霸权互相竞争的时代中，殖民帝国的瓦解已经验证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同时，以个人和机构所持有的股份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也已经超越了国家范围。事实上，“在全世界的工业产值中，大型商业企业的产值超过了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而这些企业的生产设施分散在

* 译自：David G. Becker and Richard L. Sklar: "Why Postimperialism?"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18.

①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多个国家”；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按照实力或地位来为世界上的商业精英列出一张清单的话，占据榜首的将主要是那些多国企业的领导者”^①；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现代商业的这种跨国式跳跃的重要性。

一些分析家认为，在跨国公司当中并找不到任何性质上全新的东西。他们指出，在多个国家的领土上设立分支机构的公司是与资本主义的到来以及民族国家的产生同时出现的；私人投资者帮助推动了资本主义最初的向外扩张，并且他们还与殖民剥削的所有方商密切相关^②。然而，跨国企业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它们与早期制度形式的类似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跨国企业的常规定义涉及到以下几个标准：

1. 跨国企业由母公司（parent company）和子公司（daughter companies）或分公司（subsidiary companies）所组成，这些子公司或分公司位于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母公司往往与宗主国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但有时也可以位于其它国家，例如商岸避税港。

2. 子公司所挣得的利润大部分是来自于商品生产或服务，国际贸易则是子公司的辅助性业务。整个企业的生产性活动面向多个国家的市场^③。

3. 跨国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各种各样的子公司之间互相支援，并都服从于中心的管理。作为跨国企业的一个单元，每一个子公司的管理层所制定的策略部是为了援升跨国企业的整体利益。中心的管理范围的扩大，不只是局限于广泛地调整商业策略，还包括对常规

^① Raymond Vernon, *Storm over the Multinationals: The Real Issu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5.

^② 这显然是那些把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看作是起源于16世纪或之前的学者所持的立场，参看：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③ 例如，一家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它所设立的国家接受该国货币的存款，并从事该国货币的贷款业务。它还与当地的企业和个人发生其他商业来往，只要这种业务被该国所批准。跨国银行与旧形式的国际金融机构差别很大，后者的海外分支机构之所以存在，主要是替母国企业的海外贸易服务。

业务的协调和监督；并且，它们所依靠的是一些现代的组织方式、通讯技术以及信息管理技术。

4. 因为跨国公司依靠的是精细的管理技术，所以它们总体上比其他公司受到更加有效的管理控制^①。

跨国公司与以前那些旧形式的国际商业企业之间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跨国公司的集中化管理的程度和效率。这种集中化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力求防止在每一个子公司当中出现“部分最大化”（suboptimization）的趋势，因为这种趋势会损害整个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赢利能力。但是，也存在硬币的另一面——当地利益可能会遭到忽视。例如，如果通过把某项业务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能够提高企业集团的整体赢利能力，那么，这种故意转移的做法就有可能在管理圈内部流行起来，尤其是当管理者听到的反对理由“与政治有关”的时候——他们认为这种理由是基于经济效率之外的考虑。即使最终的结果更多地取决于在东道国和其它地方的利益之间所作的取舍，而更少地取决于管理者的批准，但把母公司利益置于当地利益之上的趋势似乎仍然会加强公司首脑所居住的、更加发达的国家的统治。因此，这就损出了一个问題——如果母公司为了让自己总是能够受益，它是否会逆跨国企业的这种趋势而动，即不断维护富有的、通常都是母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工业化国家对那些非工业化国家或半工业化国家以及相对贫穷的国家的统治？难道跨国

^① 关于管理控制的概念与局限性，可参看：Edward S. Herman, *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e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urice Zeitl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974): 1073 ~ 1119; Maurice Zeitlin and Samuel Norich, "Management Control, Exploitation, and Profit Maximization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 Empirical Confrontation of Managerialism and Class Theory," in Paul Zarembka (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79), pp. 33 ~ 62. 和其他学者一样，我们也不相信管理控制使得管理者区别于有财产的资产阶级而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一事实。然而，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确实在阶级形成、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控制结构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差别。

企业不是一种新形式的、适应了后殖民时代需要的、变相的帝国主义？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对此问题的三种不同反应。前两种反应代表了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观点的两个变种，第三种反应也许可以表述为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ism）。

根据其中一种新帝国主义的论断，国际资本都聚集在世界经济的宗主国“中心”，它们给那些欠发达的“外围”国家强加了一种等级式的、来自于外部的控制结构，使得这些国家更容易遭到剥削。这种剥削在于榨取那些“外围”国家的经济中的剩余，因而阻碍了当地人民所关注的发展。因此，欠发达国家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被迫引进资本、设备和技术；这使得他们更加依附于国外的供应商、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再者，它们所引进的技术当中，当地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资本积累，进一步使其“被过度剥削”（superexploited）的国人（co-nationals）陷入贫困；他们变成了享有特权的、“去民族化的”（denationalized）的精英，很少与全体人民分享什么利益。这种精英既无法确立他们在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也无法建立合法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当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成功是以政治上的失败为代价换来的。所以，“外围”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形式在政治上具有反民主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下，当地的“统治”阶级仍然掌握着政治权力^①。

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当中，上述论点仍然很受欢迎；

^① 关于新帝国主义问题的这种观点及其微小变化，请参看：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André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与他们同样的立场得到了斯蒂芬·海默 (Stephen Hymer)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参看：Hym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对于他们而言，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根源。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反民粹主义的、对“不发达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观点进行批判的理论，这在比尔·沃伦（Bill Warren）有关“外围”国家出现的、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后果的、相对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文献中得到了有力表述^①。尽管可以说沃伦重新发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扩张的进步特征”^②的现实主义思想，但是他对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权力分配的变化却论述不多——而这是帝国主义本身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现实主义派别欣喜地接受了沃伦那些打破传统的著述，这也可以用来测量“激进”学者和运动空想主义者从他们的革命幻想飞行中掉落下来的高度。

第二种新帝国主义的论断是由拉丁美洲学者阐述的。他们首先认识到，并不能把“不发达的发展”应用于拉丁美洲地区那些正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这种观点在以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为代表的“历史依附论”学派的著作中得到了概括^③。卡多索及其依附论追随者都赞同沃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给许多“外围”经济体带来了不新增加的工业产品、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但是，由于这些经济体差不多都不能生产它们

Uneven Development,” in Jagdish N.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pp. 113 ~ 140; Michael Barratt - Brow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76). 他们的思想同时影响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例如：Richard J. Barnett and Ronald E. Müller, *Global Reac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4)。

①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81 (1973): 3 ~ 44;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② Warren, *Imperialism*, p. 47.

③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74 (1972): 83 ~ 95;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自己的资本品或技术，因此它们是“结构上不完整的”（structurally incomplete），为了保证经济体的正常运行，它们只好与由跨国公司所统治的世界经济保持着“依附性的联系”（dependent articulation）。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跨国公司是生产过程中的“稀缺性”投入的惟一来源，并因此拥有了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垄断权力。跨国公司的这些决定导致了当地一种过度强调某些商品生产的工业化形式，这些商品尽管在宗主国获得了大量消费，但是在“外围”，它们都是奢侈品。所以，那些只注重收入的经济政策最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哪怕这些政策是以牺牲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①。

当地资产阶级的权威落入了权力集团^②的手中，权力集团由一些政府官员和商业主管所组成，而他们又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密切。权力集团通过控制当地政府，把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只注重收入的政策强加给当地政府。换言之，帝国主义的统治被“依附性”国家的阶级结构转变成了一种表面上属于当地的统治，这种统治主要依靠的是“试图增强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当地集团和阶级的社会实践，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不是因为外国投资者是外来的，而是因为这些外国投资者能够与被当地集团伪称是他们自己的价值和利益重合到一起”^③。因此而出现的政治态势也不像“不发达的发展”观点所暗示的那样：只是符精英与大众简单地一分为二。卡多索和法雷托（Faletto）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些经由选择的次级集

① 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pp. xx - xxii. 他们提到“汽车、电视机、冰箱”作为与此相关的商品例子。尽管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分公司确实主要制造这些耐用消费品，但它们多数也提供范围十分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其中许多商品和服务即使按照当地的标准也都是大众消费品。

②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尽管卡多索（Cardoso）和法雷托（Faletto）没有使用过“权力集团”这一术语，但它能很好地抓住他们的意思。

③ 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p. xvi.

团被纳入到了政治代表性的网络之中，而其他集团则被排斥在外。这个过程也充满了斗争，因为那些被排斥的对象有可能会与他们的命运相抗争。

卡多索和法雷托坚持认为，“依附性发展”当中的阶级态势在各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性特征，并且也不能从“依附性资本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当中推演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表明：卡多索和法雷托的理论总是在有关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两种概括性结论之间摇来摆去。一是经济上的结论。有人宣称：由于“结构不完整”（即没有能力生产资本品），以及对奢侈品生产的偏爱，才产生了那些阻碍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瓶颈和危机。由于国内市场狭窄，以及生产资本品的国内部门缺乏效率（“用金融、技术和组织等方面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确保经济体系的持续进步”^①），因此，只有当那些拥有宗主国资本的势力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介入到资本积累方式的重构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些困难才会得到克服^②。

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结论。不管其国内根基看起来有多深，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会最终取代当地国家人们的需要而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结果，当地的资产阶级被剥夺了工业领导者的形象，当地的政府也被剥夺了总体规划“国家”利益的能力。尽管当地政府并没有完全成为外国利益的傀儡，但它的主权也并不是完整的。这种状况彻底地排除了建立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可行的选择只有两种：或者是准威权的民粹主义（quasi-authoritarian populism），或者是日益严重的在军

① 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p. xxi.

② 按照卡多索（Cardoso）的逻辑，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必须这样做。其理由来自于列宁——“帝国主义经济体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必然要求对外扩张。”它们能够这样做，其理由是：它们在资本品生产方面的杰出表现，既是一种“保持控制的形式”，也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步骤”（Cardos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pp. 90~91）。

事首领和平民技术官僚庇护下的官僚威权主义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①。

许多认为“不发达的发展”理论既过于简单也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民粹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了卡多索对“依附性”的解释，称赞这种解释既可谓真正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主义的欣赏态度，也真正坚持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解释方式^②。这种称赞是不恰当的。卡多索和法雷托在对“依附性”进行论证的时领，严重低估了新兴工业化社会进行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能力和经经验；也严重高估了最发达工业经济体在技术上的自足能力。卡多索和法雷托对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多样性的考察，尽管对该地区的经济历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描述的却是“精英的循环”，而不是阶级的斗争^③。该地区阶级内部的冲突是因一部分以国内为取向的国内资产阶级与另一部分以国际为取向的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眼

① Guillermo A. O' 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Guillermo A. O' Donnell,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 - 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3, 1 (1978): 3 ~ 38. 奥唐奈 (O' Donnell) 认为，民粹主义的做法在拉丁美洲早期工业化阶段十分盛行，这种工业化以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为基础，并因此得益于大众对政治的可控参与。在接下来的“深入的” (deepening) 工业化阶段 (即从杂乱生产转变到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人们对收入集中的认可和积极推动，使得有必要在政治上排除大众的影响 (同时可参看: 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p. 163)。这是拉丁美洲工业领袖们着手实施官僚威权主义 (bureaucratic - authoritarianism) 的政治缘由。然而，正如最近发生在阿根廷和巴西的事件所表明的，官僚威权主义遭到了国内反对者的阻止，并被民主化的压力所制服。

②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依附论的关系，可参看: Gabriel Palma, "Dependency: A Formal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or a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Concrete Situations of Under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6, 7 - 8 (1978): 881 - 924.

③ 在《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这本书共计 215 页当中，只有短短 10 页稍微提到了中产阶级之外的从属集团。只有在这些集团出于模糊的要求而施加了同样不太清楚的“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内部差别的群众因素才被该书归结为主观因素。

前的、狭窄的利益差别造成的，但卡多索和法雷托却把它当作是国内利益与跨国公司利益之间发生的基本的、系统的矛盾的证据。卡多索和法雷托对资产阶级“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描述是武断的，这反映出他们明显地厌恶跨国企业所体现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他们衡量“外围”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成就的标准——完全自主，以及一个真正体现大众愿望的政府^①——是不现实的。

卡多索以及那些对他心怀崇敬之情的“依附论者”都已经超越了“不发这的发展”这一理论的纯朴性，但是他们的理论大厦却建立在一个有裂痕的基础上：其错误的前提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是帝国主义。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论断即后帝国主义理论，抛弃了上述前提。后帝国主义的观察是从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的作用开始的，它认为全球公司在新的跨国基础上，可以促进各国利益的一体化。尤其是，跨国企业给“第三世界”国家^②提供了获得资本资源、可靠市场、关键技术以及其它服务的机会。后帝国主义观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拥有政治主权的国家互相之间在效益的分配方面通常都存在着差异，但是，在此之下，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利益上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从最深的层面来看，它们的利益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且，较为发达的国家也不是自动地就给欠发达

^① Cardoso and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pp. 162, 202. 他们带着一种偏好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统制主义的心态，来看待这是否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保护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

^② 通过权衡各种看法，我们把“第三世界”（third world）确定为描述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或中间阶段的国家的形容词。该词避免了与“发展中”（developing）和“欠发达”（less developed）相关的不必要的隐含意义，我们也希望该词能在到底意味着哪些国家问题上不留下非确定性。我们之所以把该词用引号括起来，而不把首字母用大写，意思是表示我们不同意任何把全球按照政治标准或经济标准分成单个“世界”（World）的做法。在我们的使用中，“第三世界”包括中国以及其他欠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强加了牢固控制^①。

当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定位如何，行动起来几乎毫无例外地就像这种观点确实是他们对当前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不管在哪里，他们都表达了与跨国公司建立稳定关系的愿望。能够使这种可靠关系实际普遍存在的条件是：劳动力与管理层两者的当地化（localization），或本国化（indigenization）。跨国公司政策也出于自我经济利益的考虑，走向了全面接受本国化条件。哪里的跨国公司没有这样做，当地政府就必定会制定、也确实制定了某种有效的强制推行本国化的政策^②。第二个被广泛认同的条件是当地也分享企业所有权。结果，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合资企业的形式，其中的当地合伙人往往是国家机器的延伸，并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③。

① 这并不是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经验都对某个国家有帮助。这也很少表示所有的社会阶级和团体总是会从中受益。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对一个国家有害的情况今日之所以成了现实，是因为暂对的环境不好，而不是因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本性如此。尽管把资本主义发展对从属性的社会团体的眼前的、短期的损害揭露出来既有价值又有必要，但一种发展理论不应该忽略长期的辩证法：即发展本身也有可能最终在政治上把从属阶级武装起来，使得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能够获得一定的补救，以弥补早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② 跨国公司已经认识到，被接纳进入分公司并得到信任的本地居民不久就认同了公司目标，这种认同的程度与他们身为母国企业员工对是一样的。即使本地居民挣得了和那些被派往该国的员工同样多的薪本，但前者并不需要后者所拿到的“在外”津贴、住房补贴以及其他特殊待遇。因此，雇用和养活本地居民更加便宜。跨国企业分公司不愿意雇用本地居民，主要是考虑到他们的技能水平低，以及为弥补此不足而在培训方面所花的费用。正是对于这种成本的计算，使得分公司的本地化政策有着不同的效果。

③ 不管是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还是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企业的合资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其标志就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使当地一方掏最少的钱来参与这种合作的制度安排。例如，建立“隐性”的供应渠道、为使当地一方账户自然增值而自动进行利润再投资，等等。另一个标志就是常常让政府官员在推动企业合资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以便把政府、跨国企业，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把当地私人资本，都揉合进合资企业。可参看：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上述两个条件引发了组织变革，这种变革在“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反过来，组织变革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制度和全新的社会结构。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高水平的就业，其中主要的就业岗位均来源于其经济体系中的半国营部门（parastatal sector）。高度官僚化的半国营实体雇用了许多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也被这样招录进去，并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倾向于接受精英意识，其中包括他们有可能与之发生联系的跨国商业集团的价值观体系；他们还希望促进当地私营企业的成长。半国营部门中的精英们甚至会出于一些工具性的考虑而促进当地私人企业的成长，譬如对效率和国内资源不足的认识。一旦这些精英在私营企业里发现了补充收入的机会，他们往往会要求给自己的私人腰包来点献金。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现代阶级的形成过程仍然与以前没什么区别，但其结果如何我们却不得而知。刚刚成长起来的工业技术官僚精英（technocratic - industrial elites）由于全盘接受了全套现代管理方法的教育，由于与跨国公司交往密切，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并最终取代了昔日“寡头式的”（oligarchic）、“土地 - 金融 - 商业”三位一体的统治^①。

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大的私营企业部门的共同呵护和培育之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了。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L. Sklar）曾将其命名为“管理者资产阶级”（managerial bourgeoisie）^②。让我们不要误解它所表示的含义。这个术语的言外之意并不是指管理者的一个“阶层”或一群政府精英；管理者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个职业性的或功能性的概念。它是一个外延很广的社会范畴，包括商业精英、

^① 拉丁美洲的“寡头”（oligarchic）秩序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半封建的”（semi-feudal）。该地区的转变提醒我们，新一轮的组织革命有可能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事情，标志着从早期的、重商的资本主义阶段转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阶段，后者的特征包括工业主义、寡头政治和社团主义。

^② Richard L. Sklar, *Corporate Power in an African Stat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198 ~ 199.

企业管理者、高级政府官员、政治领导人、某些研究行业的成员，以及所有社会领域中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我们之所以称之为阶级，是因为尽管其成员在各自的狭隘利益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特权地位相同，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政治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关系方面，他们也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①。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这个阶级特别能使我们联想到企业家的传统；同时，该术语也反映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管理那些已经被国有化、或者是在国外投资者的协助下才创建起来的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主要阶级构成^②。

在接受外国投资的东道国（host country）内部，管理者资产阶级由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所组成。“本地派”（local wing）由东道国当中那些享有特权的公民所构成，他们扮演本文前面所列举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享有特权的个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往往来源于政治的、教育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国际公司派”（corporate international wing）由一些外国公民组成，他们管理着商业事务，或者其它跨国机构的事务。管理者资产阶级当中的本地派又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上流阶层；民族资产阶级比管理者资产阶级更大、更复杂，它由各种各样的当地显赫人物所组成，其利益的局限性更大，他们只关注于本国的利益。在一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国内私人的公司制企业已经取得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并且，其经济力量的大小也接近于或等同于政府管理部门的经济力量。当地资产阶级中的上流阶层演变成了阶级领导层

^① 一种生产方式由“支配关系、合作方式以及控制物质生产的技术”所组成。参看：Richard W. Miller, *Analyzing Marx: Morality, Power an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9. 米勒（Miller）继续说：“确实，从某种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支配体系及其带来的冲突是政治方面的，也是经济方面的。”

^② Richard L. Sklar, “The Nature of Class Domin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7, 4 (1979): 531~552; 546~547.

的骨干，他们依靠的是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而且，其利益观和世界观已经非常接近于那些与国际资本有关联的派别。戴维·贝克尔（David G. Becker）曾引用“公司民族资产阶级”（corporate national bourgeoisie）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当地统治阶级^①。许多激进的评论家喜欢贬低管理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坚定性；但他们的批评既让人误解，也不公正。管理者资产阶级中的本地派都是热忱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尽管这种热忱与狭隘性多多少少要视接受跨国世界主义的程度而定。

“第三世界”国家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民粹主义，其国内领导人则往往高举全民政治统一的大旗，并在防范外国统治威胁的名义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在这种今日看来普普通通的环境下，管理者资产阶级当中的本地派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似乎与国际公司派截然不同。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跨国企业主管的政治价值观既不是反自由主义的（illiberal），也不是中央统制主义的（statist）；但是，我们绝不能天真地轻视这些人物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也绝不能幼稚地低估他们为了私利而撇开意识形态的本领。

^① David G. Becker, *The New Bourgeoisie and the Limits of Dependen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30 ~ 335. 严格说起来，管理者资产阶级（managerial bourgeoisie）是这样的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在其中，国家资本在生产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其起作用的方式则有助于促进私人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贝克尔（Becker）把公司民族资产阶级（corporate national bourgeoisie）看作是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变种。尽管国有企业管理者（state management）和公司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私人企业成员（private elements）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后者相对来说更独立于国家权力并有着自身的历史根基。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其他类型和变种可以按照一个社会的关键的制度的变迁来界定。例如，国家资产阶级（state bourgeoisie）一词描绘了国家资本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统治阶级。企业家资产阶级（entrepreneurial bourgeoisie）则是市场经济中的统治阶级，在这种经济中，国家资本在生产方面的作用明显小于私人资本的作用。

戴维·贝克尔认为^①：在公司民族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地方，源自不和谐的政治价值观的冲突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作为一种公司的而不是传统的自由形式的民主治理，服务的是公司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其服务的方式，以及服务的理由，和它服务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大体相同。此外，发展的辩证法产生了组织得更好的从属阶级，这些阶级的成员强烈要求拥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以此作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安排加以默许的回报。跨国企业主管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没有理由拒绝当地的民主治理，只要这种治理与公司规划所需要的稳定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现实情况也确实越来越如此。另一方面，对于任何资产阶级团体来说都是地方特有的、普普通通的眼前利益冲突，也能够导致在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上产生摩擦：受到发展性民族主义的激发的公司民族资产阶级，往往比跨国管理者更喜欢一个在经济上较为积极的当地政府，以及一种在产业保护和产业补贴上较为“重商的”致策。

简言之，不管跨国企业的关系是否被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所打断，这些关系都属于当地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公司资产阶级所抱有的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之间的周期性冲突。跨国企业的管理者有一种倾向：使当地的利益服从于企业或整个公司集团的利益，而这种倾向也有可能导致上述冲突。后帝国主义理论假定：管理者资产阶级当中的本地派和国际公司派之间的冲突经常会有所缓和，或者会通过后者在意识形态倾向和行为倾向方面的调解作用而得以解决，这种倾向是由“所在地原则”（doctrine of domicile）^②的观念引申出来的。根据这个原则，跨国公司集团在当地的子公司应该采取、

① David G. Becker,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 A Postimperialism View,"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41 ~ 62.

② Sklar, *Corporate Power*, pp. 182 ~ 188.

且确实采取了适应所在地政府的政策，并照此运作。当然，这种适应的主要目的和意图都是为了提升整个企业或集团的利益。

我们不能将所在地原则错误地理解为公司的高度的国民责任感 (citizenship) 的保证^①。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是意识形态信仰的原则，是那些规划和实现公司制企业跨国扩张的人经营公司的基本准则。这种商业意识原则很重要，其主要原因是：它能够使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司资产阶级，与那些最近发展起来的、但至今工业化范围仍然很小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更加平稳。它也是跨国企业管理者形成自我概念的基本方向。由于所在地原则与跨国公司的思想和行为态度有关，它也引起人们去关注各种社会团体的行为，这些社会团体对于其团体目标的认可和感情也是由思想决定的。对于分析家来说，此处意指的不是整个体系的或某个机构的参照框架，而是社会的参照框架：一种偏爱“跳出”具体的体系和抽象的“运动规律”，但也“回溯”至公司与政府，来看待这些机构行为的团体和阶级基础。戴维·贝克尔曾以秘鲁的自然资源发展状况为例，向我们展示了所在地原则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方式^②。

① 不管它们在哪里活动，包括在宗主国，如果公司管理层的结论是逃避管制节省下的收益大于被发现的风险及其惩罚，商业公司都会尽力逃避代价高昂的、由政治威权所施加的管制。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管理者比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同仁在监管公司活动方面更加无能和低效率，相应地，他们也面临着更大的逃避管制的可能性。然而，他们起来迎接挑战的速度也十分惊人，这部分是得益于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这类国际组织的帮助，部分得益于跨国公司自身给他们带来的管理技术。此外，许多证据表明，跨国企业由于数目较小、透明度大得多，总体上比当地所有的私人企业更加遵守法律。

② David G. Becker, “‘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Peru Under Military Rul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63 ~ 106; 所在地原则其作用的另一个有趣的、自然资源开发方面的例子，发生在赞比亚，参看：Sklar, *Corporate Power*.

因此，后帝国主义理论显然是一种阶级分析的理论。它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跨国阶级是统治阶级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跨越国家边界进行联合的产物。在那些由文化特征大致相似的国家所组成的地区，这种观点似乎更加合理。但是，跨文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联合也变成了甚至更加合理的预期。跨国企业的活动强有力地推动了跨国的和跨文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联合^①。在这方面，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产生的伙伴关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公司对强调所在地原则——即确保跨国公司子公司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需要而进行经营的能力和意图——的高度的国民责任感的坚持，使得这种伙伴关系或曰“联姻”愈加受到推崇。这种坚持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他们希望能与国际商业组织打造一种稳固的关系。它就像坚持真正的婚姻一样：在私欲的召唤下，它偶尔也会破裂；关键的一点是，尽管婚姻伴侣双方并非总是忠实于对方，但却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离婚。

不管是文化方面的障碍，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都没能阻止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跨国的基础之上结成商业伙伴关系。在与跨国公司协作的过程中，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越来越被搁置在一旁，以适应经济策略的现实需要。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某些资本和技术，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形成的大部分都来源于当地。“原始积累”——不管是依据苏联模式的，还是按照狄更斯英国方式的——必然

^① 尚待研究者们加以关注的，是总部设在“第三世界”国家且主要投资于周边国家的新的跨国企业。总部设在当地的跨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这些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得到了地区经济组织的鼓励（在政治层面上，支撑这些组织的，既有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愿望，即获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政治影响力响的手段，也有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一种区域性的政策比单个国家的政策能够带来更好的前景）。在亚洲，韩国以及一两个东盟国家也开始孵化出它们自己的跨国企业。

要求人们付出社会的或政治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却是今日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能或不愿付出的。因此，资本必然需要引进，而其最可靠的（虽然不是惟一的）来源则是通过跨国商业企业或跨国银行所进行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国外的私人直接投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银行贷款和间接投资达到高潮的 20 世纪 70 年代发达国家向“外围”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主要方式——使“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感到进退两难：他们一方面想要引进资本和技术，但同时又害怕失去对他们国家的内部事务实施主权控制的能力。正如塞尔·沙茨（sayre p. schatz）所说的^①：一些人款吹张开双臂接受国外直接投资，而另一些人则极力反对（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这两部分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国外直接投资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政策都有一种明显的趋势：他们都选择了一条令他们感到满意的、投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肯定的实用主义”（assertive pragmatism）的中间跨线。有些领导人还得出结论：摆脱进退两难局面的方法就是相对侧重于依靠间接投资。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曾通过对四国案例进行研究，检验了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②。

弗里登发现，向“第三世界”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投放发展贷款的潮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推动的：一是发达国家银行体系的跨国化，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进入这些银行体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① Sayre P. Schatz, "Assertive Pragmatism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07 ~ 130.

^② Jeff Frieden, "Third World Indebted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Mexico, Brazil, Algeria, and South Korea,"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31 ~ 160.

(OPEC)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存款的剧增。但是,这些“推动”因素得到了“拉动”因素的补充:一是借款者的民族主义式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二是他们推进由当地企业家所控制的、基础广泛的工业发展的决心。弗里登对四个案例进行的研究表明,每一个案例的政治结果都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稳步发展,但这种方式也壮大了私人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①。在这些案例中,每一个案例的经济结果都表现为工业主义的巨大发展——总产出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制成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增大。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结果都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无关;例如,在“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在“过度资本主义的”(ultra-capitalist)韩国,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结果。

如果有人认为与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达成的合作协议,即使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和工具性的理由,这些协议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也是中性的,那就大天真了,也太富有想象力了。这种合作关系通过极力拉拢管理者资产阶级中的本地派,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传播到了东道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合作关系也促进了组织上的变革,而组织变革又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的联合^②。即使如此,在统治阶级联合的单行道上,合作各方之间的思想和态度的通行并不顺畅。国际公司资产阶级中的成员很可能会觉得东道国伙伴的发展价值观与他们的价值观并不一致。设想人类能重拾避免严重的民族主义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信心,这种预期是否有点过于乐观?

除了工业国家和非工业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的转变之外,

^① 阿尔及利亚是个例外,因为在该国并不存在私人工业资产阶级。然而,私人企业家同样通过国家发展银行所提供的借贷资本分享到了繁荣。当地企业家们并不把经济上十分活跃的政府的急速扩张看成是一种威胁,而是把政府看成合作伙伴,把政府资本的增长看成一种有助于应对跨国公司竞争的额外的力量。

^②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直接投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组织变革来说是必需的。

还有一个问题，即跨国企业对特定地区内部的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由于坚持所在地原则，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以在很多地方存在和发展，除了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气候最严酷的地方。那么，这些子公司又是如何能够在那些骚乱地区中的敌对国家（如东南亚、南部非洲和中东地区，在这些地方，民族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和平的曙光，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存在的呢？这种存在能否帮助我们开创一种新的视野和看法，从而抛弃旧有的争论？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马克思以来，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调节的私人性和无序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会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他们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矛盾就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危机中体现出来。自列宁以来，社会主义者曾表示，在民族主义者保护外围地区、反对宗主国强加给他们的统治和剥削的过程中，他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经受住了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浪潮和反抗浪潮的冲击，甚至从这些浪潮当中进一步走向了繁荣。“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载体，载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兴起，而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因此，正如塞尔·沙茨指出的，要使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摆脱停滞不前的处境，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检讨和继续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①。

沙茨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与胡乱指令之间存在矛盾的观点。但是，沙茨主张资本主义已经向一个适应过程（adaptive process）演化，这种适应过程减轻了能够打断资本主义制度连续性的矛盾所带来的影响。当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运用传统的控制工具和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又遭到抵抗的时候，它的

^① Sayre P. Schatz, "Socializing Adaptation: A Perspective on World Capitalism",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61 ~ 178.

反应就是锻造一种目的性更强的、中央集权式的控制手段。这里有两个关键的不足：一是控制形式的变化通常局限于那些对于消除眼前的危机症候来说不是特别紧要的形式；二是控制形式的变化总是出现在危机之后，因为这种变化只是一种反应，而从来不带什么预见。结果，矛盾从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新的危机还在周期性爆发，伴随每一次危机的，则是局部的、渐进的调整。

沙茨还认为，随着后殖民资本主义（postcolonial capitalism）的来临，“社会化适应”（socializing adaptation）的过程超越了此前曾局限于全球、如今正变成全球的国家政治框架。它的动力在于两个方面之间的分离：一个方面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这是现存的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制度都必须依靠的；第二个方面是跨国公司和宗主国家当局的各种自私自利的决定。当这些决定真正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的时候，就会招致某些不愿再默默忍耐的国家的敌对反应，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这些国家都有能力反过来造成明显的损害。更糟糕的是，如果对资本主义发展成果不满的情绪广泛蔓延的话，其结果就可能是政治上的剧烈变动，而这种变动反过来又可能会导致“第三世界”背离资本主义。新近出现的全球性的社会化适应过程，其目的就是防止这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这一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全球协调的意识日益高涨，并且国际资本主义的重要机构都在慢慢地、但也是毫不隐晦地迁就（accommodation）“第三世界”国家最为紧迫的要求。跨国阶级阵营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过程。这是因为，他们除了能够感化那些掌握着社会化适应过程所需要的权力的人之外，还在采取必不可少的适应性措施时产生了基础广泛的国际阶级利益。

在这种联系中，值得强调的是：后帝国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理论。任何人都可以从这种联系中正确地推渐出：当前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全球分界线是易变的，而不是固定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将会一致地促进后者的发展。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可能与以前一样，仍将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

——虽然现在的国家边界也许不再适合于描绘这种不平衡发展。民族主义分歧和意识形态纷争的消除并不能终止住所有关于发展后果的争论；只不过分歧的根源可能会发生转变，不再仅限于国家领土这一个维度。塞尔·沙茨的预见是，我们可以看到尖锐的系统性矛盾一再发生，每一次的矛盾都会由于新的迁就而趋向缓和，但却只是暂时的缓和。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的前景问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缓和的阶级利益冲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仍然实施着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而无产阶级仍然没有能力控制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方式，经济上的需要仍然迫使他们把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完成别人为他们选择和安排的工作。直到现在，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仍然远不及资本的国际流动。但是，后帝国主义时代的景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变化也发生在这一方面。国际无产阶级的形成趋势已然可辨，例如：“外劳”（guest workers）计划的展开，以及其它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劳动移民。这种趋势也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范围包括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美国总工会（AFL - CIO）下辖的美国工人自由发展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社会主义国际联盟（Socialist International）等。这些趋势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虽然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看待国家水平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景，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后帝国主义是关于国际寡头政治（international oligarchy）的理论。民族国家是否越来越会或一定会被“世界公司”（Cosmocorp）^① 边缘化为一种经济组织呢？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民族主义的血海深仇可以泯灭吗？我们并不能肯定其结果是否将成为公司资本主义思想家的乌托邦式预想。一个由国际资产阶级寡头

^① George W. Ball, "Cosmocorp: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Stateless," in Courtney C. Brown (ed.), *World Business: Promise and Problem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pp. 330 - 338.

政治所统治的世界，对进步论者而言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它的政权机构和政治责任机构甚至有可能离那些受它们影响的人更加遥远。更甚的是，在不得不面对无产阶级的不满和敌对情绪，而无产阶级又不具备由民族主义提供的合法性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也许会求助于公然强制的社会控制形式。

后帝国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ist）时代的开始。在社会建构的这个阶段，坚持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对于跨国公司本身、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应该立足于跨国阶级的发展来展开分析。这些制度是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在历史动力的作用下，超越限制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主要工具。假如这种历史动力继续起作用，帝国主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就会被（或正在被）跨国阶级对全世界的统治所取代。遗憾的是，人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这种变革运动仍然知之甚少。

（曹义恒 译）

hou diguo

zhuyi

第二部 批判争鸣

国际资本与国家发展：后帝国主义理论述评*

杰夫·弗里登 (Jeff Frieden)

“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给当代社会分析带来了许多分析和实际的挑战。但是，仍然有少数来自于欠发达国家 (LDCs) 的学者们满足于当前的各种发展理论，以及那些缺乏分析根据的、指示性的、不恰当的理论。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学者们本身变得越来越不像流行的思想学派那样死抱者陈词滥调不放，所以，这种理论和分析的缺陷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了。由理查德·斯克拉 (Richard Sklar) 于 1976 年首次提出的后帝国主义方法 (approach)，就试图把各种混乱无章的概念从发展研究当中清除出去。

斯克拉和戴维·贝克尔 (David G. Becker) 在《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ism) 一书中，以及随后各自的著述里，都表明了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说服力。与绝大多数“依附论”和“主流”方法不同，后帝国主义在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认真地分析了欠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形成动向。毫无疑问，他们这种方法使得后帝国主义理论面目一新，并更加令人信服。斯克拉在该书中抱怨说：“很多‘激进派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这些国家的时候，都低估了其资产阶级阵营的力量及其历史重要性，也低估了这个阶级的民族主义的连贯性 (integrity)，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数笔。”(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对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

* 译自：Jeff Frieden：“International Capit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ents on Postimperialism”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79 - 192.

文)。后帝国主义理论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纠正这种失误。

因此，后帝国主义方法在欠发达国家设定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national bourgeoisie)，其领导阶层是“管理者资产阶级” (managerial bourgeoisie)，而管理者资产阶级又是新生的跨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民族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和国际的公司资产阶级 (corporate bourgeoisie) 通过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勾结在一起。在这种利益关系中，国际资本关心的是进入欠发达国家的市场并获取那里的生产要素；这与欠发达国家（包括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关心的工业化目标切合到了一起。根据这种观点，多国公司 (MNCs) 并非一种反国家的力量，而是一种本身可以适应东道国家的力量。外国公司本身也有服从当地法规管制的趋势，斯克拉把这种趋势称作“所在地原则” (the doctrine of domicile)。因此，欠发达国家的外来投资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并没有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完整性。相反，在对发展中国家的阶级关系的特有影响方面，我们却能感受到外来投资的冲击。多国公司的存在促使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升，使它们成为了当地的统治阶级。外国资本既没有使管理者资产阶级“去民族化”，也没有削弱它的实力，倒是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帮助这个阶级变得更有能力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重新占据和据高它在发展中国家的统治地位。

后帝国主义方法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非常有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关注的是分化 (differentiated) 的阶级，而不是未分化的国家 (undifferentiated nations)。正如斯克拉指出的：“资产阶级——公司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命运也许是由国内斗争，而不是由推动反叛国家对抗外来强权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所决定的” (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对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所以，尽管存在者投资和金融的国际化趋势，但政治活动仍然主要是一种国内事务。我也持有这种乐观的观点，因为它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各国国内的个人和群体事实上是可以对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过程施加影响的。那种认为全球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排除

了国家水平上的政治活动存在的可能性的过于庸俗的假定，显然已经被基于后帝国主义立场而开展的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所驳倒。

“第三世界”的学者们越来越欣然地接受了斯克拉和贝克尔提出的主张；他们已经厌恶了那些与“依附性”有关的无休无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接受后帝国主义论者提出的关于跨国公司的观点的人，比十年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人要多出许多。各个领域的人们都相信了塞尔·沙茨（Sayre Schatz）的观点，认为不管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欠发达国家而言，在利用国外直接投资方面采取一种“肯定的实用主义”（assertive pragmatism）态度，可能是最可行的途径。用沙茨的话来说就是：“实用主义的方法有利于积极的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相互进行磋商并对后者加以监管，以便改善成本收益组合（cost-benefit mix）。”^①许多国家（包括很多革命后的国家）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与跨国公司建立起工作关系是可能的；其条件是国家主权不能妥协，也不能破坏国家的发展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跨国公司总是并且到处都受到欢迎；而是说，发展中国家容许国外直接投资并不必然是一种向帝国主义罪恶投降的卑都行径——相信后面这种观点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不在少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活动是不是在向帝国主义“投降”，几乎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国内阶级动态，而很少取决于这个国家是接受还是排斥国外的投资。

在我们从理论上理解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方面，后帝国主义方决向前跨出了意义重大的、完整的、令人振奋的一步。在告诉我们阶级分析方法一旦从教条当中解放出来就如何能够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方面，后帝国主义不仅作出了理论上的发展，而且提

^① Sayre P. Schatz, "Assertive Pragmatism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12.

供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范例。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将提出一些关于后帝国主义方法的特殊问题及一般问题；并且，我还将作出几个批判性的和质疑性的评论。我所说的一切都不会贬低后帝国主义方法的价值。正如我在以下的评论中将指出的那样，尽管我还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对于有一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后帝国主义必将成为人们有关欠发达国家发展的争论的核心问题，至少在接下来10年中会如此。我的评论的目的很简单：鼓励人们讨论那些由后帝国主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并着力阐明之。首先，我将对后帝国主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三个评论；接着，我将提出两个关于后帝国主义方法及其运用的警示意见，最后指出后帝国主义的来来问题。

对后帝国主义的三个批判性评论

第一个评论必须面对的是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矛盾，后帝国主义学派在澄清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沙茨对这个矛盾的表述是：“在国际上，生产的相互依赖性变得更加彻底；但是，政府的控制手段仍然是国内的。”^① 后帝国主义理论在解释国内的社会主体与国际的或外国的主体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管理者资产阶级（或公司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管理者资产阶级通过调节国外的资产阶级与国内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来削弱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冲突。由于管理者资产阶级的数量、权力、自信心和技术专长都增长了，并且由于外国公司更加严格地坚持所在地原则（它意味着对这些公司所投资的国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尊重），特定国家的国家发展与国际体系的发展之间的紧张局面趋向缓和。正如贝克尔和斯克拉指出的：“后帝国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见本书贝克尔和斯克拉“为什么是后帝国主义？”一文）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主张与考茨基（Kautsky）近70年前提出

① 同前页注①，pp. 114。

的主张有相似之处。在考茨基看来，随着生产过程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不断地加速，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冲突将会趋向缓和^①。当然，列宁在回答一系列关于资本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将如何演变的问题的时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认为资本主义在真正变成国际资本主义之前，其内部矛盾将会导致它自我毁灭。后帝国主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释，依据的则是管理者资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内部其他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因为按照后帝国主义学派的观点，管理者资产阶级缓和了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冲突，而且用贝克尔的话来说，充当了“当地社会与宗主国（metropoli）之间的……经济和政治枢纽。”^②他的这种描述追随的是斯克拉的观点，斯克拉认为：“管理着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其集体行动比其它任何行动都更能使这个亚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这个整体；它同时表现了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倾向，即与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进行联合，以使自己在外国具有同等水平的控制能力。”（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对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阶级的形成和阶级内部的斗争都是动态的过程。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其它阶层的力量相时有所下降，但是，即使是最发达的欠

^① Karl Kautsky, *Der Weg zur Macht* (Berlin, 1910); and “Akkumulation und Imperialismus,” *Neue Zeit* 32, 2 (1914): 908-922. 这两本著作的相关摘要重印于: Patrick Goode (ed. and trans.),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3), pp. 75-89.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茨基看来，国际化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因此也仍然是他所说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尽管后帝国主义理论和考茨基的理论一样，都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内部冲突”这一概念，但它在这一点上和考茨基是不同的，即它不认为今日的国际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是帝国主义。这种主张并不是说现代世界就不存在帝国主义了，只是说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扩张本身并不带有帝国主义的特征。后帝国主义理论也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是早期历史时代的特征。

^② David G. Becker,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 A Postimperialism View,”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53.

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管理者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没有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和统治力（hegemony）必然会继续不断地增长。事实上，在斯克拉起初对后帝国主义问题所做的论述中，走向反面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从长远来看”，斯克拉说，“如果（现有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继续发展下去，公司资产阶级也许有希望取代管理者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对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在几个比较发达的欠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似乎正在发生。在诸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中，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大部分公司民族资产阶级的能力和权力都已经大大增强。不仅如此，它们还或多或少地与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以前曾经和他们一起分享权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接句话说，正如贝克尔所描述的那样^①，资产阶级的两个精英集团——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可能会互相融合，并产生出一个拥有典型的阶级特征和阶级利益的公司民族资产阶级。随便哪一种情形都无法让我们非常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资产阶级当中那些地位日渐上升且信心日渐增强的人，将会采取与基于西方的（Western-based）国际公司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策略，而不会选择敌对的策略。在所有的发展理论文献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一直是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后帝国主义理论通过描述管理者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阐明了当地的资本家阶级的地位，但这种理论还是未能驱除停留在列宁心中的幽灵。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许有必要更深入地讨论管理者资产阶级（或公司民族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

第二个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评论涉及到后帝国主义理论当中的社会阶级的自觉意志（conscious volition）问题。后帝国主义学者们似乎相信，“第三世界”的阶级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权力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贝克尔和斯克拉对管理者资产阶级所下的定义，强调的恰

^① 同前页注^②，pp. 41 ~ 62。

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政恰权力关系和社会控制关系方面，他们也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见本书贝克尔和斯克拉“为什么是帝国主义？”一文）。在这个定义中，我看不到任何固有的理论问题或逻辑问题。但是，它却时常导致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线条变得模糊不清。自觉主体的自觉行动的结果，与欠发达国家潜在的、也许未察觉到的社会经济走势所带来的结果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重要的是，任何与社会生活有关的理论都必须识别这种差异。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政治决定主义来代替经济决定主义。前者认为，所有的社会发展都可以通过具有政治意识的群体或个人的政治活动获得解释。譬如，贝克尔断言：“秘鲁政府之所以实现了它的重要谈判目标（与拥有大量资源的跨国公司进行谈判）……主要应归功于它的谈判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知识和专长。”^①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秘鲁取得成功的一系列其它原因，例如：秘鲁在采掘工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那些已经在秘鲁投资的人们发现自己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及秘鲁与那些公司的母国（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状况。

贝克尔曾断言：“在后帝国主义的世界里，资本进入‘外围’，是获得了意识形态手段和致恰手段的保障（secured）的。”^②这种说法同样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他在这里表达的全部意思是指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在资本进入“外围”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当然是无需证明的。但是，如果贝克尔的意思是指资本只有单独

① David G. Becker, “‘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Peru Under Military Rul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72.

② David G. Becker,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 A Postimperialism View,”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54.

地依靠意识形态和政治才能不断地进入“外围”的话，那么他的说法肯定是令人误解的。宗主国的资本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入外围，至少部分是因为它能够给外围的社会阶级带来某些经济的、技术的和管理上的利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具体说明并解释这些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如何在对外投资活动中相互作用的，而不只是简单地说它确实起到了相互作用。

实际上，发展中世界以内的人们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塞尔·沙茨有效地把它们分为“接受”、“拒绝”和“实用主义”的态度^①——应该完全依据经济原因来解释，而用不着反过来求助于意识形态或文化方面的解释。例如，有人也许会争论：如果当地的商业人士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或也许存在）直接的竞争，并且感到没有能力与跨国公司在大政同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那么，他们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反对就会强烈。在那些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在那些需要集中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才能确保或功的生产部门，情况往往最有可能是这样。另一方面，有人也许会期望：当地的企业家相信跨国公司并不会与他们进行直接的竞争，或者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应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因此他们对国外直接投资会采取一种更乐于接受的（或实用的）态度。这种情况典型地存在于以下国家或部门：最不发达的国家；最发达的国家；资本和技术的集中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生产部门；以及那些对当地市场的了解（也许还包拒对当地政治家的了解）非常重要的部门。

如果一种一开始就大言不惭地声称进行阶级分析的理论依靠的却是这样一种主张，即并不依据社会阶级的自利行动来解释社会现象，那这种理论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以上据到的这些主张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本人希望那些运用后帝国主义概念的

^① Sayre P. Schatz, "Assertive Pragmatism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07 ~ 130.

学者更明确地强调阶级分析的视角——例如，欠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如何从跨国公司那里抽取到物质利益，以及这些利益采取的是何种表达方式。通过聚合到一起组成了社会阶级的个人的自利行动，比单独通过观念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所能解释的东西要多得多。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它只有与它所致力于合法化的物质利益有毫不含糊的关系的时候，才是重要的。

第三个评论与民主问题有关。尽管后帝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前视——跨国统治阶级的出现——本质上是主张寡头致治的，但国内的民主政治运动的命运既不是不可知的，也不是预先决定的。但我却弄不明白，对斯克拉和贝克尔而言，民族资产阶级本质上到底是亲民主（pro-democratic）的，还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这个问题尤其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化身有关：管理看资产阶级和公司民族资产阶级。斯克拉运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管理者资产阶级“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寻求各种形式的政治垄断的庇护，例如一党制国家和“凯撒式的”军政府”（见本书斯克拉：“后帝国主义：对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另一方面，当谈到资产阶级的“领导阶层”已经演变为公司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贝克尔声称：“因为其统治并非狭隘地为自身服务，所以，它不需要依靠强制性的力量，而是能够与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相共存。”^① 在后帝国主义的语境下，他是如此开始他对民主的讨论的：“威权主义的波涛已经耗尽了它的力量，他的潮流正在退去”；“国外直接投资与资本主义民主力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后果”^②。贝克尔的观点的实质是：由于管理者资产阶级（或

^① David G. Becker, “‘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Peru Under Military Rul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66-67.

^② David G. Becker,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 A Postimperialism View,”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公司民族资产阶级)的信心和能力增强了,因此,它并不太需要威权主义的、压制性的手段来维护其统治。

但是,对当代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还有其它一些解释方式。毫无疑问,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发生过引人注目的民主复兴运动;例如,我们只需要看看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秘鲁的民主化进程,就会了解这种复兴现象了。但是,在这些复兴运动中,管理者资产阶级(或公司民族资产阶级)当中似乎只有一部分坚决主张形式民主。准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指的是那些私人部门的管理人员,他们觉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必要与政府及其官僚的咄咄逼人的权力作斗争。在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斗争中,形式民主的需要已经变威了获得公众支持的强有力的武器。拉美地区正在进行的民主化进程显然使那些与国外资本有密切联系的政府官员和半国营化管理的公司,与包括私人部门的公司管理者在内的、希望国家把对自己的(政治的或经济的)限制分摊一部分给国外资本的、有着更多国内倾向的商业领导人之间产生了竞争。最近,欠发达国家为了应付国际金融危机普遍采取了紧缩计划,人们对此展开了抗议和争论,这使得公司民族资产阶级的阵营发生了分裂:其中有看国内倾向的部分已经与范围更为广泛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政府管理部门和国外资本的一些重要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巴西发生的戏剧性的民主化进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由化进程的大部分推动力都来自于民族资产阶级。1978年,在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夜,巴西国内八位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要求政府做出更具有一致性的民主承诺。他们写道:“我们认为,只有在允许全体国民广泛参与的政治框架中,我们所期望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可能成为现实。只有民主才能够推动各种利益和观点得到完全表达;并且,只有民主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去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46, 49.

吸纳各种压力，而不至于使这些压力转变为令人不快的阶级冲突。”^①这种未曾料到的、语气强硬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其形式民主信念的描述，成为了1979年巴西军政府做出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这一决定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私人部门公司管理者的反对态度越来越强烈，而且，他们在1985年为新的平民政府获取和整合力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我们是否乐意了解这些事件，在对管理者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做出具体的结论之前，我们至少有必要先对这些事件进行考察，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形式民主做更多的研究。

后帝国主义理论对以上三个问题——国内和国际阶级形成与互动之间的关系；阶级的自觉意志；阶级形成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发性的看法，但却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更多地表现了这种理论探索的新颖性，而不是这种理论及其倡导者的固有缺点的表现。毋庸置疑，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将有助于阐明这些问题及其相关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我将在下文提出两个更加有针对性的、关于后帝国主义的经验基础及其运用的告诫意见。

对后帝国主义理论范围的两个告诫

在检验和充实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学者们应该记住：不管是从部门角度来者，还是从地理角度来看，后帝国主义理论对案例分析的深度远不具有代表性。斯克拉和贝克尔所做的研究几乎只是与采掘业有关，并且只是研究了很少的几个国家。所以，被拿来支持斯克拉和贝克尔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案例，相对于整个欠发达国家的范围而言，有可能只是个例外。

第一个告诫是，在案例研究中应该追求更大的部门样本。实际上，提出和阐发后帝国主义理论所依据的所有的具体研究，均只是涉及到采矿业。但是，从矿业部门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许不能

^① 转引自：Senhor, August 17, 1983, p. 25.

应用于其它的工业部门。采矿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正如贝克尔自己指出的：“毫无疑问，‘第三世界’东道国最有信心的正是矿业投资，并且总的说来，这些东道国在处理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地方也是矿业投资。从跨国公司一边来看，它们一般也不反对东道国的目标，以防造成不快的后果。”^①与其它绝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国外投资相比，国外矿业投资的内在特性使得它更加服从于东道国的国内政策。采矿业通常需要非常大的投资，其行业规模也相当大，并且受特定地理位置的限制。它们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以确保获得基础设施的支撑，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水、电以及往返于港口城市的交通设施。它们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通常都集中在一些偏僻的地带。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非常活跃的采矿部门，它们也是国家出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尽管采矿业和石油业加在一起也只占拉美地区工业总产值的3%，但非燃料类矿业却占拉美地区出口总额的26%，石油工业则占22%^②。因此，在拉美地区的出口中，采矿业所占比重比一般经济部门的比重大约要高出15倍。正因为矿业公司在争取外汇方面非常之重要，因此不管它们属于什么国籍，都会理所当然地受到当地国家的密切关注。

外商独资的采掘业是欠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中引人注目的、集中的、大规模的和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该部门通常受到欠发达国家的严格监管，并且往往是国有化的首要对象之一。在欠发达国家征收外国公司的成百上千个例子中，有一个例子曾经表明：尽管采掘业只占国外直接投资的15%，被征收的采矿企业却占征收企业总数

^① David G. Becker, “‘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Peru Under Military Rul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67.

^②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atin America: Natural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IDB, 1983), p. 106.

的35%^①。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对制造业和其它部门的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但同期对采掘业的直接投资事实上却在下降。

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矿业部门的独有特征与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区别开来。欠发达国家对不同部门的外国公司的反应是不同的。例如，外商独资的矿业公司受到的待遇，与外商独资的公用设施生产企业受到的待遇是相似的，但与那些生产资本品的外国公司受到的待遇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发现，这些不同的结果显然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所以，后帝国主义理论必须越过采掘工业的研究门槛，并关注外国投资对欠发达国家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以及其它行业的阶级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告诫是，在案例研究中应该顾及地理差异。迄今为止，后帝国主义理论家们最深入地研究过的两个国家分别是赞比亚（斯克拉）和秘鲁（贝克尔）。这两个国家除了都高度依赖铜制品出口外，其他方面并不具有什么代表性，甚至在他们所属的地区也是如此，更别说他们与东亚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贝克尔在讨论秘鲁的“富脉矿的发展”的时候提到：“东道国表现出了一种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富脉矿的开采使统治阶级可以分享东道国具有强大管理能力的、高效的政府所带来的成果，而用不着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为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缴纳高额的税收。”^②人们可能会怀疑有关秘鲁当前情景的这些评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并且怀疑即使是在那些依靠开采“富脉矿”矿产来发展工业的国家中，贝克尔指出的这种趋势也远不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要问一问他们：这种趋势在何种程度是普遍的？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欠发达国家社会现

^① Stephen J. Kobrin, "Foreign Enterprise and Forced Divestment in LC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 1 (1980): 65~88; esp. p. 76.

^② David G. Becker, "'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Peru Under Military Rul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69.

实的演变的？仅仅从当代“第三世界”众多的、经常是矛盾的、横切的（cross-cutting）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挑选出几个案例，这种做法简单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在后帝国主义学派所考察的趋势当中，有一些趋势现在似乎正朝着与后帝国主义理论家们所期望的相反的方向运动。在过去的15年中，比较发达的欠发达国家还出现了“远离”国外直接投资的趋势。趋来越多的当地经济被当地所控制。如同我自己曾经对搜集到的案例进行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①，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日益增长的对当地经济活动的控制获得了国外资金的支持，而这些国外资金通常是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来的。

无论表面看来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无法否认：长期以来，在所有快速工业化的欠发达国家，外国公司的相对比重事实上一直在持续下降。以巴西为例：在1972年的时候，外国公司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为42%；在该国前200家公司的资本总额中，外国公司占20%。如今，这两个数字却分别变成了大约23%和8%。事实上，在整个拉美地区，类似的趋势非常之明显^②。后帝国主义理论家们强调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自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外国公司、（在斯克拉的意义上的）管理者资产阶级、国内公司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诚然，上述趋势并没有宣告他们的研究无效，但这些现象的存在至少要求对这两个经常发生冲突的阶级成分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贝克尔发现，“矿业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表现得恰如其份，他们成了

① Jeff Frieden, "Third World Indebted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Mexico, Brazil, Algeria, and South Korea,"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131 ~ 160.

② 尤其是，贝克尔注意到了在秘鲁也存在这样的趋势。参看：David G. Becker, "Peru after the 'revolution': Class,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 3 (1986): 3 - 30.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阶层。”^①但贝克尔又指出：

资产阶级在整体上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个人所组成；他们互相竞争，追求着自己的狭隘的利益，这就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面对的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现实。因此，资产阶级被划分成了阶层和利益集团，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别，例如生产什么、在市场中的作用如何、对市场的定位如何、对政府的市场行为的态度如何、对国内和国外的关注点是什么等等，他们都各不相同。这些集团在多元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下互相竞争，以增强各自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的影响力^②。

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和描述这些集团呢？面对跨国公司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要进一步发展后帝国主义理论，就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到后帝国主义理论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或公司民族资产阶级）概念的背景下来进行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扩大研究范围，在进行案例研究的时候应该把亚洲、北非和中东地区包括进来，也应该包括一些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IGs），如韩国和巴西。

有关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学者们会关注后帝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呢？原因之一是他

^① David G. Becker, “‘Bonanza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Peru Under Military Rule,”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c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87.

^② David G. Becker, “Peru after the ‘revolution’: Class,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 3 (1986): p. 19.

们认为：后帝国主义思想非常有希望成为一种研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的理论方法。实际上，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们面对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选取一系列实质性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案例，通过运用后帝国主义方法对它们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把后帝国主义理论变成一种成熟的发展理论。贝克尔和斯克拉曾经坚持认为，“后帝国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理论”（见本书贝克尔和斯克拉“什么是后帝国主义？”一文），但这种理论当中存在着足够多的启发性因素，使得我们实际上有必要从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贝克尔和斯克拉曾说：“后帝国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见本书贝克尔和斯克拉“什么是后帝国主义？”一文）。这一结论显然与全面推进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要求相一致。不过，如果我从他们的主张中做出这样的推断，相信他们也不会埋怨我，这就是：即使后帝国主义现在并不是一种发展理论，它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否则的话，我们将没有理由接受甚至评价在他们的分析中体现出来的某些结论，以及从中流露出来的某些启示。

这些启示像一条条网线，贯穿于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投资正在导致“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的线条变得模糊不清，或者用贝克尔和斯克拉的更为准确的话来说就是：“当前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全球分界线是易变的，而不是固定的。”（见本书贝克尔和斯克拉“什么是后帝国主义？”一文）但是，正因为后帝国主义不是、或者说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种发展理论，所以贝克尔和斯克拉这种主张在经验上是牵强的、在分析上是提示性的、在理论上则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说贝克尔、沙茨、斯克拉等后帝国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国外直接投资可以给欠发达国家带来工业发展，那么，这样的工业发展是否会保持下去并使得当代的一些欠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工业国行列，他们却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尽管贝克尔相信这一点并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总有一天会获得宗主国的地位……且不会破坏现存国

际秩序的基础”^①，但是，承认这种可能性就会造成分析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更深层次的理论联系进行比后帝国主义理论更深入的讨论，尤其是涉及到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力量的时候。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转会不会强化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当中的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这种等级制度中的成员关系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成员关系的固定会不会造成所有国家都没有可能“赶超”？不同的等级之间在规模上是不是固定的呢？这种规模上的固定会导致一个国家的“赶超”依赖于另一个国家的“赶超”吗？或者变换一下提问方式，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之间在内部结构上存在差异吗？这种差异会不会事实上造成后者无法赶上前者？如果是这样，这些差异与国际经济体系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这一系列极端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出经验研究和理论突破，而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恰好顺应了这一要求。贝克尔和斯克拉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和致治发展的论述，强有力地证明了后帝国主义的解释力。接下来，这一理论必须走出关键的两步：经验的拓展和理论的深化。进一步应用后帝国主义这个分析工具去研究其他社会和其他经济部门，将有助于增强它的解释力，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同时，把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的经验纳入到后帝国主义理论的范围，将会使这一理论更富于启示性。可以相信，走出这两步，将使我们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思考获得重大进展。

（曹义恒 译）

^① David G. Becker,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 A Postimperialism View," in David G. Becker, Jeff Frieden, Sayre P. Sahatz and Richard L. Sklar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 54.

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的阶段划分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及后帝国主义*

基思·海恩斯

本文吸收了各种理论及历史编撰学的传统，同时，还利用了我自己对墨西哥革命经验的研究，以构成本文的解释框架。该解释框架与试图阐述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的一些谨慎意见既相一致，也有一定的可比性。

一般说来，人们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国际化在其中得以发生的诸多社会机制的一种，并且得出结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演变的一个必需阶段，帝国主义既不是最后的，也不是最高的阶段；在20世纪早期，它仅仅是最近的阶段。因此，本文试图自觉地把资本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置于我们的集体意识的中心。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自由主义学术传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一开始极力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讨论，但遭致失败之后，最终也同意对帝国主义加以研究，并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完全无关的特有现象。在这种传统看来，帝国主义是“政治道德”、异常的文化沙文主义（cultural jingoism）和战略需要的产物。

激进历史学家们在理解帝国主义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中，尽管反对上述这些自由主义的解释，但也吸收了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他们大多都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严密的分析，却把焦点集中在“帝国文化”（imperial culture）、“反帝国主义诸语”

* 译自：Keith Haynes, 1993: *Capitalism and the Period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Ultraimperialism, and Postimperialism*, *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57, Fall 1993.

(the discourse of antiimperialism)、“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和“种族—性别—阶级的三联关系”(trptych of race-gender-class)等方面。诚然, 这些方面本身都是重要的课题。但是, 如果将它们放进马丁·斯克拉(Martin J. Sklar)所说的“基于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框架里, 它们就会获得更大的历史概貌(和政治共鸣)。然而, 这需要重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使之超越以往在唯物主义“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的毫无结果的决定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在形成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斗争所造成的经济需要和经济能力反过来从各个方面塑造了世界历史的图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模式的变换。国际关系的历史结构是“宗主国”和“外围国”这类世界观的产物, 尽管它形成于国际舞台, 实际上却源于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斗争。

因此毫不奇怪, 诸如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这些宗主国统治阶级领导人的世界观, 都是历史学家耳熟能详的。特别是威尔逊, 他的著名的“十四点协议”、他对罗斯福的门罗主义解释提出的批评、他在凡尔赛为重建国际秩序所作的努力、他对帝国主义辞藻华丽的谴责, 甚至他向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派遣武力等等, 都被那些从各种角度分析这种明显的言行不一的历史学家们详细地记录下来。历史学家们了解不多的是那些处在“外围国”的民族精英所持的世界观, 以及造成这种世界观的阶级形成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为止,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经常反对帝国主义, 他们所持的理由与几十年前欧洲和美国的企业资本家精英所同意的理由如出一辙: 保护和促进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 以方便资本积累。依据他们的观点, 帝国主义远不能保证以私有权、投资、生产和贸易为基础的社会的繁架, 实际上帝国主义本身也有

灭亡的危险。墨西哥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革命政府工商劳动部部长阿尔贝托·潘尼（Alberto J. Pani）在1918年向墨西哥工商协会联盟（Mexican Confederation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与会代表所作的一个简短讲话，就反映了这种观点。他解释说，帝国主义恶化了社会中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保护落后政策的那些错误的原则……到处挑起了血腥的暴动，以抚平人们心中的忧伤与绝望。”为了不让人怀疑应该由谁或什么来为这种事态负责，潘尼说：“最坏的国民政府给本国人民带来的损害，总是小于最好的外国统治者。”并且，他还抱怨说：“对这个公理的疏忽和无知，加上错误的国家观念，一起保护了征服者和强权帝国的荒唐权利。”

社会秩序的混乱反过来会对“所有的经济繁荣都不可或缺的”资本带来破坏性威胁。这种威胁“将会导致社会倒退到日愈悲惨的文明阶段，甚至无法养活现有的人口。”因此，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对外国资本施加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限制。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普卢塔科·以利亚·卡勒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在谈到墨西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领导阶层的利益时，坦率地指出：“我们实际上是在为（外国投资者）及其利益而战。”潘尼以及卡兰萨政府甚至希望墨西哥革命能够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下取得完美结果：“我们的法律所包含的对外国人的少数限制，主要是迫于其他国家所表达的国家观念的压力。因此，这些限制中的大部分都应该被取消。这样一来，帝国主义的基础也就不见了。”并非巧合的是，虽然1918年墨西哥人对国际关系的这种观点源于其独特的社会条件，并且受到了独特的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巨大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却非常符合伍德罗·威尔逊的说教——正如潘尼和其他墨西哥人急切地指出的那样。但是，一些老练的历史学家大都没有及时认识到帝国主义在历史角色中的这种转变，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他们曲解了帝国主义的含义；第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围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忽视了这些阶级关系与“宗主国”世界

之间的联系；第三，忽视了从恰当的历史分期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关系，历史分期理论应该从某个社会的独特类型出发，“从该社会的普遍的历史样式（formation）出发，从该社会的更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演变环境和演变阶段出发，着重分析该社会的关系体制及其历史演变的条件、能力、权威模式、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

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和最初研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查尔斯·科南特（Charles A. Conant）及其公司资本主义理论的追随者，就曾明确地采用了诺曼·艾思仑登（Norman Etherington）的说法，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为了赢得经济优势，运用国家权力来对抗外国。”而且，他们还把“对国外的投资领域”的新“需求”与以“资本和信用的充斥”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联系在一起，而对于那些没有“开放的世界”，则似乎可以动用“国家的武力”。

毫不奇怪，经常引用其资产阶级前辈的开创性著作的、研究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类似的阶段划分，并将其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联系在一起。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尼古拉·布哈林和弗拉基米尔·列宁等人的著作，就都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公司国家主义时代的过渡。

而且，卢森堡和考茨基还在国际关系的易变性和资本主义需要的变化之间画上了清晰的平行线，并认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扩张曾经采取过各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卢森堡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区分开来，并且明确地指出，殖民主义针对的是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它是资本主义扩张与“使资本积累受到限制的自然经济”相冲突的产物。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针对的则是欧洲国家及其所要建立的侵略性的、扩张性的社会秩序，它是“资本积累在争夺非资本主义环境下仍然开放着的东西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恰特征”。卢森堡甚至还强调了这类形式的统治给当地的“非资本主义”居民、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所帝来的影响。

当然，考茨基和卢森堡都期望帝国主义仅仅只是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在最近阶段的表现；在某个历史接合点，帝国主义会与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条件相抵触，因此而发生的斗争就将改变帝国主义。例如，卢森堡解释说，正是传统的欧洲帝国主义及其特定的利益范围，有可能妨碍国内和 international 的资本积累。她特别引用了土耳其的案例，并且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德国曾经极力维护土耳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开放，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非常类似。至于考茨基，他特别善于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来建立他自己所说的“超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垄断导致了竞争和垄断竞争。大公司、大银行和大富豪之间的疯狂竞争，迫使他们组成巨型的金融集团，他们不断地吞并小集团，并且创造出了卡特尔这一概念。同样地，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其结果也许就是这些最强大的国家形成联盟，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将会停止。”

1916 年，列宁撰文回应了考茨基，并且首次抛弃了上述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传统；帝国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所依据的众多统治形式当中的一种。尽管列宁严厉地批判过“叛徒考茨基”，并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破坏和随后 10 年里迅速出现的国际军备竞赛似乎首先证实了列宁的论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后果却似乎复活了考茨基的思想及其个人声带。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这段时期里，以威廉·威廉斯 (William A. Williams) 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和威斯康星学派 (Wisconsin School) 越来越强调美国通过以其为主导的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来湮灭国内反对势力从而提升国际公司资本家利益的外交努力。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文章被《新左派评论》予以重印，尽管其引言有点令人误解，但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大约在同一时期，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家开始出版一些作品，以分析依附性及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帝国主义日益成

了市场开拓的同义语，并被用来描写富裕的“北方”、“核心”或“宗主国”联合起来压迫贫穷的、欠发达的、依附的“南方”外围国家的行为。然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的作品中坚持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Austro-Marxist）依据生产方式来划分历史时期的传统，仍然和考茨基一样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不是其最后的阶段：“把帝国主义描绘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阶段，或者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根本就是一种谬论。”相反，熊彼特把帝国主义的定义实质上扩展到了包含所有的侵略性、征服性战争，并认为帝国主义主要是一种返祖性的封建精神的遗产，它本质上是与资本积累的和平（即非军事的）要求相对立的。随着现有的贵族逐步灭亡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将会消失，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发展毕竟主要依赖于市场力量的强迫，而不是武力的强迫。熊彼特预期，很可能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或者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资本主义的实现”，“侵得它自身（即资本主义）成为多余”。

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Sklar）的研究摆脱了这种传统，同时对那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许多现象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1976年他认为，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的分析，应该纳入到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跨国公司联盟所引发的国际资本主义急剧转型这一框架中来讨论。他对非洲政治和跨机构及其形成、联合与合并的考察，促使他得出结论：通过建立和平解决资本主义列强冲突的机制，跨国资本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需要和能力，破坏了帝国主义的基础。

然而，斯克拉不只是超越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内部关系的强调，而且突出了跨国的公司资本主义机构在调节和阻止宗主国与外围国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为此，这些机构在外围国家创造了一个“管理者资产阶级”，来管理全球公司资产阶级的跨国利益。相应地，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张仍然在继续，但它们依赖的却是特定国家或地区范围内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它们采取的形式通常也与那些典型的传统帝国主义和超帝国主义截然不同。凭借这些观点，斯克拉建

造起了一座后帝国主义的**经验大厦**。

斯克拉重新审视了古典理论家们的帝国主义定义，并认为这一概念不再适合于解释拉丁美洲农民和工人的从属性，正如它不能说明同一时期美国南部的农场主、小佃农和工人的不幸一样。引起这些问题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因此他主张，分析家们不应该再用老一套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界定帝国主义；相反，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后帝国主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权力的地域范围及其保护资本家利益的责任扩大到了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统治阶级，后者在推动以私人企业和国际投资为基础的国家发展方面，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自己研究这一主题的方法也出自于这些本富的理论和经验传统，但与此同时，我还更深入地研究了外围地区的阶级结构的作用，并将其看作国际关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适过吸收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埃里克·赖特（Eric Olin Wright）等人的观点，我认为，当地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在历史上决定了统治精英们的全球意识，并因此决定了国内社会关系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局限性和能动性。这些斗争和竞争导致了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它们是：1）殖民主义，以便满足或多或少帝有传统色彩的贵族的需要，这些贵族既处于封建主义的社会背贵下，又处在资本主义转向初始的全球商业竞争阶段的过程中；2）自由资易或“非正式的”帝国主义，以便在一种其国际实力无人挑战的竞争性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框架内保进资本的积累；3）投资的帝国主义（investment imperialism），以便在一个全球竞争时代保进对手国家的公司资本主义的利益；4）超帝国主义，以便在一个国际工业资本家合作的时代满足公司资本家的需要；5）后帝国主义，以便在一个全球资本家合作的时代创造出一种“国际寡头政体”（international oligarchy），这一政体的权力由“管程者贵产阶级”掌握，后者不管其国籍如何，都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对资本所负的责任，都级

力捍卫跨国公司资本主义的利益。

由于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需要的只是一个稳定的私有财产、投资、生产和贸易的体系（也就是一个产业工人的国际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积累历史上为了产生出这样的有利条件而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超帝国主义的依赖，只有在存在着有效的、有组织的对资本流动和贸易的反抗并且没有其他办法来调解和压制这种反抗的时候，才是必须的。从资本的角度看来，共产主义世界的瓦解、独立的资产阶级在外围国家历史性地产生和发展、这一阶级对民族国家权力的垄断，以及为调解发达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冲突而建立起来的跨国机构，都使得“征服者权利和暴力帝国”成为多余——甚至往往产生出相反的效果。要是跨国公司遵循“所在地原则”（doctrine of domicile），要是相对独立的民族国家创造一个“所在地”，以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基本需要和能动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帝国主义和超帝国主义都已经让位于后帝国主义。

但是，这并不能排除那些构成了民族阶级认同不断进行组织、解体和重组的过程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亦即区域的、人种的、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和性别的斗争。相反地，不管是在宗主国，还是在外围国，由于这些斗争是在不同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将极大地改变来来的国际关系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这些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被湮没下去，将有助于发展出后帝国主义关系。这也许对我们更快地找出通常引起这些斗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来源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来源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另一方面，保护国家利益、恶化地区不平等、破坏跨国机构的“民粹式”斗争，很可能捍卫和复辟那些旧形式的外部统治（如帝国主义或超帝国主义关系），并同时把私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社会不平等的核心作用搞模糊。

（曹义恒译）

全球化的阶级政治*

亚历桑德罗·科拉斯^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是解释人类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以阐明未来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这一基本原则——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列出的第十一条说得最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明显特征。可能除了女权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现代社会理论能够按照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使用过的方法，把弥补理论与现实、社会科学分析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差距作为明确的目标。

本文要着重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特有的范畴，即“阶级”范畴。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阐明阶级这个概念所花费的精力相对较少，但毋庸置疑的是，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历史和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关键概念。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社会主义变革事业的关键范畴。正如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曾经明确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一事业——通过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实现消灭阶级的目的——的看法，为人们把社会主义目标建立在一种

* 译自：Alejandro Colás：“The Class Politics of Globalisation”，in Hazel Smith and Mark Rupert (e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Routledge, 2002).

^① 作者十分感谢以下学者对本文初稿的广泛评论和尖锐批评：Hannes Lacher, Shirin Rai, Mark Rupert, Hazel Smith, 以及 Benno Teschke.

历史运动和社会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提供了系统连贯的说明^①。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并且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阶级政治；在本文中，我将把这两个基本的假设当作是既定的。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主要有两个打算。首先，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解释在当前的全球化大讨论中所处的地位；第二，为新世纪重新复活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寻找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源头。我的基本观点是：现阶段的国际资本主义积累（“全球化”）过程仍然在特定的国家之间以及它们的内部不断地制造着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这些分裂所采取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形式；并且，我们既可以把它们看作与全球化相关的过程的起因，也可以看作这一过程的结果。换言之，这里所说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对立的表现；同时，全球化还表现为另一种斗争，即追求再生产现存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人们与旨在使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向真正的民主社会（即社会主义国际秩序）转化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斗争。

本文的起始前提是，全球化概念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解释力，它描述的是整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越来越一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从其它一些概念（如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科学技术、国际组织等）派生出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全球化相关的过程应该源自于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转型过程。换句话说，在对全球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之时，应该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说明这一过程：把它看作结果，而不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全球联系发生变化的原因。

以这个初始的假设为出发点，我认为：人们对于阶级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得出了两种各不相同的

^① E.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6), p. 90.

但也决不是完全对立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作为全球化过程的代理者（agent）或主体（subject）的特权阶级，往往倾向于强调国际的或跨国的统治阶级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起的支配性作用。因此，那些属于所谓的国际关系“新葛兰西”学派的学者和那些致力于构建“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都把全球化理解为跨国的“历史性集团”或“国际公司资产阶级”在共同管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所采用的战略安排的产物^①。另一方面，那些着力把阶级看成是全球化的客体的理论家们，则倾向于分析全球化过程对被剥削阶级的影响，被剥削阶级也就是那些产业工人、农民和农业临时工。从对“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传统解释，到最近对全球化和“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思考，这种种观点都突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样性，以及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产生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分裂^②。

在本文的论述中，我将对上述两种观点提出批评。本文所追寻的目标是强调全球化过程中阶级的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之间必然存

① 参看下书所收集的论文：S.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与这种理论有关的单本著作包括：R. W. Cox, *Power, 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S. Gill,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O. Holman, *Integrating Southern Europe: the EC and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Sp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H. Overbeek,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Hegemony: Concepts of Control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W. I. Robinson, *Promoting Poly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M. Rupert, *Producing Hegemo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至于后帝国主义的各方面主张，可参看：D. G. Becker et al. (eds.), *Post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K.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8)。

② Fröbel et al. (trans. P. Burgess),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在的互动关系。依据这种思路，我认为，应该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长期的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的角度，来解释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种现象。人们普遍认为，阶级冲突的爆发总是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将反作用于当前全球水平上的阶级形成和阶级动员过程。因此，本文提出的全球化的阶级政治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国内对立同时在国际水平上得到解决和再次产生；资本家和工人为应对所谓的全球化而采取的政策和策略，也在这一过程中催生出新的国际阶级冲突表现方式^①。

为了阐明对全球化的阶级政治的这种理解，首先，我将批评那些新葛兰西学派和后帝国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解释，认为他们那种使统治阶级具体化的做法模糊了国内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在形成占霸权地位的“历史性集团”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接下来，我将考察那些全球化理论家们的观点，他们把全球化看作一个分裂的进程，并最终混淆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概念，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界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概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批评上述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他们把这些抽象的阶级范畴和他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具体描述混合到了一起；或者换种说法，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偶然表现与资本主义确定的结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混淆到了一起。我认为，这样一种区别（即抽象与具体之间或结构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区别）一旦被他们考虑到，那么，在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消除这种“两阶级模式”（two-class model）的。最后，后一种观点也许通过下述说法能够成立，即现实存在的全球资本主义并不表示“资本主义的原初文化”取得了胜利，相反，它仍然是这样一个领域：资本主义剥削的固有逻辑仍然在其中大行其道，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与非资本

^① 对于阶级和全球化的这种理解，特别类似于彼得·伯纳姆（Peter Burnham）的解释，参看：Peter Burnham, “Open Marxism and Vulga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2, Summer 1994), pp. 221-231.

主义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些等级制度涉及到生产、种族、性别，实际上涉及到政治权威^①。换言之，我的主张是，全球化并不标志着被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划时代起点，相反，它代表着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关联已经加强，并在全球产生出了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结合形式。与那些把全球化看成一个同质化过程的主流观点相反，我将首先从剥削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事实上强化了国际体系的许多引发分裂的结构和制度，例如国家主权、不平衡发展、军事实力，以及种族和宗教方面的沙文主义。

本文的结尾部分将简短考察上述所有方面对社会主义策略带来的影响。作为一种预期，我的主要论点是：只有把资本主义剥削的抽象的、普遍的本质与它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具体表现之间的联系搞清楚，才有可能把资本主义全球化所产生的阶级对立拉上社会主义变革事业的轨道。在目前对全球化的分析中，有的把阶级视为不幸的受害者，有的则把阶级看作全球化进程中发号施令的代理人，由此而赋予了这种或那种全球资本主义观点以特权。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是：有可能拉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能动性，并且看不

^① 在本文中，“结合”（articulation）一词是在所谓的“生产方式的结合”（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的意义上借用的。代表性的著作包括：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 - P. Rey, *Les alliances de classe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3); H. Wolpe (ed), *The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至于这种结合理论的全面讨论，请参看：Aidan Foster - Carter,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Controversy” *New Left Review*, No. 107, 1978, pp. 47 - 77. 按照福斯特·卡特（Foster Carter）的说法，有关生产方式的结合的文献主要考虑“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的矛盾关系，这些生产方式被认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延续，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演化，而只是资本主义既不是从中演变而来，也不会被资本主义必然消解掉的东西。实际上，资本主义并不会消除各种前资本主义形式，它不仅与它们相共存，而且扶持它们，某些情况下甚至狂热地把它们召唤出来”。

到这一体系的抽象表达和具体表现之间的重要关联。由此而产生的结论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能够把我们日常所经历的、工作场所内外的异化与剥削转化为全球水平上的反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之前，全球化很可能不会引发社会主义的变革。因为当我们在强调资本家阶级的分裂的时候，不管他们自己内部的分歧如何，资本家最终追求的是他们共同的利润，而且他们还存在着普遍的全钱拜物教的集体意识。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却总是处于劣势，因为我们的“一般等价物”即阶级剥削总是通过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性别的和无数其它方面的分裂的感性现实煎熬着我们。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培养我们的政治创造力，并在独特的个人经验和集体的阶级利益之间不断地伸展着我们的组织肌体。

在对这些论点进行更全面的讨论之前，我先说明一个不足和一个定义。不足就是，以下的论证很少是以资本主义之下全球阶级格局的经验性论据为基础。毫无疑问，为了增强本文的说服力，有必要进行这样的经验性分析。然而不好意思的是，我的论证采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判定一个事物如何在现实社会关系当中体现出来或不体现出来之前，必须先从该事物当中抽象出一个问题。第二个要预先说明的，是在紧接本段之后的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将简单地并且必然是概略性地补充界定一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在这里，我将对本文其它部分使用“阶级”一词的方式作出说明，这一术语的用法十分接近于场普森（E. P. Thompson）在他的各种相关作品中所详细说明的含义^①。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

尽管“阶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使用之前很久，

^①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Vol. 3, No. 2, May 1978), pp. 133 - 163;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就已经成为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常见用语，但是很少有人会怀疑，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阶级概念才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概念进行了两个重要的创新，一是把它历史化，二是把它与社会利益冲突联系在一起。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阶级分化是贯穿整个历史的人类社会特征。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却带来了社会分化的特殊形式：现代的阶级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定义的。而且，这一组新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则是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必然的利益冲突^②。这种对现代市民社会内部的阶级概念的双重改造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醒我们，“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③。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标志看与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等级的分离：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④

^① 关于这一概念的有用定义及其演变的总结，可参看：T. Bottomore,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91); G. Labica and G. Bensussan,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2).

^② 参看：J.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

^③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p. 80.

^④ 同上，p. 80。

这两大阶级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利益之间的差别，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但是，这种对现代社会阶级冲突的精彩表述，迫切需要我们至少解决与我们所讨论的全球化有关的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把其他对现代世界产生过影响的阶级（农民、奴隶、小佃农、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土地所有者等等）摆在什么位置？其次，对于阶级的定义而言，阶级意识有多重要？这两个问题一开始就站在马克思主义者有关阶级问题的交锋处。

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定义所进行的最初评价补充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持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的力最导致现存的所有阶级都被吸纳进了两大敌对的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研究成果（《资本论》三卷、《剩余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使这种观点得以产生，同时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①。因此，从抽象层面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合和保存前资本主义阶级的进程并没有采取一成不变的理论化方式。

只有当我们转向马克思的历史和政治著述的时候，社会的各个阶级而不是惟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作用。马克思在解释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报刊文章中使用过“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金融贵族”（finance aristocracy）和“小资产阶级”（petty-bourgeoisie）等术语^②。也许更为有名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演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对小农阶级的讨论。在这里，马克思把在小块土地上从事生产

^① K. Marx (translated with a foreword by Martin Nicolaus),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p. 108.

^② 有价值的论述摘要集，可参看：J. Elster (ed.), *Karl Marx: A Rea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尤其是其中的第6章。

的“绝大多数”的小农看作“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①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并有共同的生产方式；“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②。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局面的结果是非常清楚的：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受教育的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③

这篇著名的文章揭示了马克思的阶级研究方法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即阶级意识问题。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清楚地按照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的集体地位来确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但他们同时也含蓄地指出，一个阶级的存在是以它打造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我表现工具的能力为基础的。在马克思对阶级的理解中，这种双重性的经典表述可以在其《哲学的贫困》一文里找到，在这里，马克思对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进行了区分。在谈到早期阶段的英国工人阶级联合的对候，马克思断言：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

① K.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p. 105.

② 同上 p. 105。

③ 同上 p. 106。

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①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者在分析阶级概念的时候必须处理好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相信，阶级客观上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与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就一无所有的人们之间的剥削关系来决定的。而且，这两个阶级会逐渐地将以前的生产方式中的阶级残余（土地所有者、农民、手工工人和小商人）吸收到他们当中。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某些著述中却认为，阶级在主观上变为由阶级意识来确定；此外他还认为，在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其国际联合的时候，“残余”的阶级（例如小农阶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从这个错误的绝路上走出来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抛弃这种人为的二元性。和看待马克思思想中的联合二分法（基础与上层建筑、作用与结构、理论与实践）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把阶级的客观观点和主观观点看作是相互排斥的，更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它们是对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的个别现象进行不同的表述。换言之，阶级是在客观社会结构（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中形成的；但是，为了解释社会中的社会-历史动力，我们同时必须对再生产了客观社会结构的、由单个人构成的集体组织（collective agency）进行说明。

^① K.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Answer to 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 by M. Proudh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no date), p. 166.

^② T.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p. 100.

这种阶级观的最有力的表述之一是汤普森 (E. P. Thompson) 对阶级形成的历史性描述, 尤其是他的最具有开创性的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在该书的序言中, 汤普森强调说:

我是通过阶级来理解某种历史现象的, 不管是在原始的经验材料当中, 还是在意识当中, 我都可以用阶级把许多不同的、表面上无联系的事件连贯起来。我强调的是, 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我并不把阶级视为一种“结构”, 甚至不把它视为一个“范畴”而是看作一个事实上在人类关系当中发生 (或可以表明为发生) 的事物。^①

然而, 汤普森对阶级所作的最简洁的定义还是在他的论辩性著作《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 一书中:

阶级是这样产生的: 处于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之中的人们能够判断出谁是他们的利益的敌人, 然后起来与这些敌人作斗争, 并按照阶级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评价。因此, 阶级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自我产生的过程, 尽管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过程是“既定的”。^②

显然, 汤普森对阶级的解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范围内多种经典的和当代的另类解释方法当中的一种。而且, 他的阶级概念也招致了当前时代某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评^③。但是我认

①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 Class* p. 9.

②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r Error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9), p. 9.

③ 在这方面相关的文献包括: P.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3); L. Katznelson and A.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Princeton: Princeton

为，所有那些批评都不能诋毁汤普森对阶级的理解的正确性，因此，我在本文中打算采用他的解释。尽管对列宁、卢卡奇、考茨基、葛兰西和卢森堡等人的有关阶级问题的著述以及近来由约翰·罗默（John Roemer）、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和其他“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重新定义的阶级概念进行全面分析，无疑将提供一副更全面的有关这一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争论图景，但该任务超过了本文的范围，亦非作者所专长^①。至于当代的各种批评，由于汤普森的关键前提已获得广泛接受，因此与汤普森的观点刚刚出现的时候相比，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同意他的观点。甚至连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汤普森进行的有名的、独具特色的、称汤普森的定义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阶级定义”的抨击，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对于阶级概念到底意味着如何“以阶级的方式去思考、斗争和行动”，双方强调的角度不同，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例如资本主义）之内阶级到底由何种客观因素所决定，双方存在实质性的争执^②。一句话，汤普森理解阶级的基本原则——阶级是从一定的生产关系当中产生的，而这种生产关系在不同

University Press, 1986), 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章；以及：H. J. Kaye and K. McClelland,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① 例如，可参看：J.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E. O. Wright,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5)；J.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完全证明这种对汤普森和安德森理论的有争议的解读，非本文篇幅所及。然而，我的主张实际上是：安德森把汤普森的阶级定义错误地归结为缺少一种完全成熟的、自为的阶级意识；反之，正如汤普森在对18世纪英国的“无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研究中所表明的，对于他来说，“按照阶级的方式行动、思考和斗争”可以意指各种集体往往以一种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为的工人阶级运动有别的语言和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客观的阶级立场。埃伦·伍德（Ellen Wood）曾对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阶级定义的真正差别进行了精辟的总结，他说，“在汤普森的批判者把结构看成是与过程相反的东西，或看成是排斥过程的东西的地方，汤普森看到的却是结构化的过程。”参看：E. Meiksins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9.

的社会群体之间导致了有意识的利益对立和价值观对立——是马克思主义者解释阶级和全球化的最合适的出发点。

作为全球化之主体的阶级

由于全球化这个术语的不严密性以及分析者的肤浅性^①，它至少意指当前的四种现象：

1. 过去30年里与总产出相关的跨边界金融、贸易和资本流动呈指数增长（至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PEC] 内部是如此）。
2. 随之而来的对这些跨边界活动的政府干预和控制减少。
3. 在管理世界社会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这经常被称为“全球治理”——方面，以前由民族国家承担的责任越来越转移给了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
4. 在全世界主要人口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规则日益同质化。

值得赞许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创性地对全部或部分国际关系的新发展展开了认识和分析。而且，在对阶级概念的运用充满敌意的学术氛围中，他们还通过故意运用阶级概念来这样做。在这一部分里，我将对其中的两种理论——“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ism）和新葛兰西学派的“跨国唯物主义”（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进行批评性的评价，目的是在比较当中阐述我自己对全球化和阶级的看法。

实际上，我所评论的这两种理论都试图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在国际上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角度出发，来解释20世纪70

^① 哈利迪（Halliday）和萨克利夫（Sutcliffe）认为，在描述同一种现象时，“帝国主义”一词比“全球化”一词表现出了更大的理论力度。参看：Fred Halliday, “The pertinence of imperialism”; Bob Sutcliffe; “How many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debates about imp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in Hazel Smith and Mark Rupert (e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sation* (Routledge, 2002) .

年代以来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时间上相隔近 20 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采用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但后帝国主义理论和新葛兰西学派的跨国唯物主义理论都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给予了分析上的关注，这些新制度包括跨国公司、多边机构和跨国压力集团等等。而且，在解释这些新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时，站在这两个“学派”麾下的理论家们都强调了跨国统治阶级联盟在维护资本对全球的物质统治和意识形态统治上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贝克尔（Becker）和斯克拉（Sklar）主张：

后帝国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ist）时代的开始。在社会建构的这个阶段，坚持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对于跨国公司本身、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应该立足于跨国阶级的发展来展开分析。^①

同样，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在一部跨国唯物主义的“奠基性作品”中指出：

对于有着这种传统的学者来说，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变化需要他们使用一种更灵活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为分析跨国社会力量（包括每一个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可能性。罗伯特·考克斯变量（[Robert W.] Cox's variant）当中的关键单位是各种社会力量（观念、制度、物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变量影响着“跨国”阶级以及一些民族阶级（劳动和资本的）的形成，也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我称之

^① David G. Becker and Richard L. Sklar, "Why Postimperialism?" in Becker et al. (eds.), *Postimperialism*, p. 14. 参见本书“为什么是后帝国主义”一文。

为“跨国化”)。^①

在此，我将粗略地指出这两种阶级和全球化分析所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不足。但在此之前，必须强调一下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某些区别，以便进一步说明它们做出的贡献。此外，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评价的一些作品并没有按照全球化的术语来明确地展开分析——我曾经设想过，他们的疑难问题本应纳入当代全球化争论的框架内来讨论。^②

首先，在后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专心关注于多国公司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阶级关系转变时，新葛兰西学派却明确地强调生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者在建构历史性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的影响。因此，对贝克尔和斯克拉而言，“后帝国主义的观察是从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的作用开始的，它认为全球公司在新的跨国基础上，可以促进各国利益的一体化”^③。在这一过程当中，国际阶级力量出现了一种新的组合，宗主国的帝国主义统治被两个方面之间的新的利益联合所取代：一方面是民族的“管理者资产阶级”，他们由不发达国家的私营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所组成；另一方面是跨国的“公司资产阶级”，他们隶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这种伙伴关系主要是通过协调以下双方的利益得以维持的：本地的管理资产阶级需要的是国际直接投资，而公司资产阶级也情愿接受东道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条

① Gill, *American Hegemony*, p. 46.

② 例如，一些最近的新葛兰西学派作品确实明确地讨论过全球化：Stephen Gill, “Gramsci and Global Politics: Towards a Post-Hegemonic Agenda” in S. Gill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ephen Gill, “Globalising Liberalism” *Millennium*,; H. Overbeek (ed),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Hegemony: Concepts of Control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③ Becker and Sklar, “Why Postimperialism?”, p. 6. 参见本书“为什么是后帝国主义”一文。

件——斯克拉笨拙地称之为“公司的所在地原则”（corporate doctrine of domicile）^①。所有这些导致的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司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上的阶级，现在包含了三个相互交叠的实体（‘公司资产阶级’、‘管理者资产阶级’和二者的混合体‘国际公司资产阶级’）。”^②

尽管新葛兰西学派也关注跨国阶级的形成，但他们当中主要的理论家都试图避免过于简单地解释这种现象。在新葛兰西学派看来，跨国阶级的形成是多种复杂过程的结果，而不仅仅只是多国公司和第三世界一部分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的简单趋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跨国历史唯物主义很少关心经合组织国家以外的阶级联系，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形成的阶级联盟。因此，基斯·范德佩尔（Kees van der Pijl）的开创性著作《大西洋统治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和近期著作《跨国阶级和国际关系》（*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及史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对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即由美、日、欧三方构成的发达国家组织——译者注）的研究，都是为了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制度化的国际统治阶级：我们可以不那么文雅地称之为“自为的国际资产阶级”（international bourgeoisie - for - itself）。

新葛兰西学派在进行这方面努力的时候所使用的策略是变化无常的。一个极端是，范德佩尔在他的早期著述中很少提及后来被他的“意大利学派”同仁所发挥的葛兰西的范畴，却把注意力集中于

① “（它）表示国际企业集团的单个子公司也许会遵循它们各自的东道国政府所推行的、与它们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政策的要求……在实现利益双赢的情况下，所在地原则可以使跨国企业的扩张合法化，同时使它能够在东道国的眼皮底下合法地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 Richard L. Sklar, “Postimperialism: A Class Analysi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Expansion”, in Becker et al. (eds.), *Postimperialism*, p. 29. 参见本书“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② 同上，p. 31。参见本书“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扩张的阶级分析”一文。

运用相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方法分析 1917 年至 1971 年间大西洋两岸一部分统治阶级进行联合的历史。范德佩尔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得到启示，认为在 20 世纪的不同时期，各个部分的大西洋统治阶级是和两种不同的资本概念相一致的：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源于前一种资本的那部分统治阶级在看待大西洋经济时往往持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这种经济与金融资本流通所产生的利润相适应，并因此以美国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中的霸权为前提。源于后一种资本的那部分统治阶级则与大陆的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因此更喜欢采取一种以国家为基础、以需求为前提、目的是通过稳定生产资本价格来榨取剩余价值的政策。新葛兰西学派的另一个权端是，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通过运用“世界秩序”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使跨国唯物主义在地理上和概念上触及的范围大大延伸。尽管考克斯坚持认为，阶级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外产生的，但同时他又认为，阶级是通过一种霸权性世界秩序（如英国统治下的和平 [Pax Britannica] 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而在国际上结合起来的：

我在这里使用的霸权一词不只是表示单独某个世界性权力的统治。它表示的是一种特殊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创造出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以普遍的认同为基础的秩序，并依据事实上是为了确保某个国家、某些国家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级的霸权得以持续但同时又给那些弱势国家提供某种满意的前景的普遍原则表运作。在这种秩序中，特定国家的生产是通过世界经济机制而联结在一起并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阶级，则是在其它国家找到同盟者的。作为特定国家的支柱的历史性集团，通过社会阶级的相互利益和意识形态观点联系在

一起；因此，全球阶级开始形成。^①

从一定层面上来看，对阶级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的这种表述似乎与贝克尔和斯克拉所表述过的极为相似。但是，他们之间的重大区别（考克斯在早先的文章中并未对其予以重视）在于：考克斯和新葛兰西学派强调的是由特定的历史性集团所代表的霸权概念。尽管后帝国主义学者也偶尔提到过文化的和教育的跨国社会化形式，但新葛兰西学派通过把意大利共产党对于（最广义上的）文化在它所属的国家维护一种反社会主义的霸权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反思外推到国际舞台，从而准确地使用了跨国社会化这一术语。因此，对于跨国唯物主义而言，世界秩序不仅依靠迟钝的市场强制和国家的高压权力得以维持，而且以一种共同导出的方式通过诸如跨国基金会、思想库、压力集团和多边机构之类的思想形式和制度形式得以维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从三边委员会或达沃斯世界论坛之类的公民社会中产生的机构，成了跨国统治阶级的组织代表。^②

我们有必要粗略地审视后帝国主义理论家及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的分析，这种审视将有可能表明：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关注于统治阶级在战后（在范德佩尔那里指19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它们的方法和结论不同，但我还是想说，这两种理论为探索阶级与全球化之间的交界面提供了同一条道跨。这种观点是这样的：它把全球化解释成一个由国际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发动的过程；这些统治阶级要么通过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利益集中（后帝国主义），要么通过标志着霸权世界秩序的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机制来发动全球化（跨国唯物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都过分强调了阶级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观作用，

^① R.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

^② 尤其可参看：Gill, *American Hegemony*;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4.

并因此低估了客观的生产关系在阶级对立的全球蔓延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考虑到后帝国主义理论和新葛兰西学派理论的下面两个假设，这样的“指责”并不过分。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两种理论都把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看作一个实质上独立的实体，它自由地决定着自身发展的历史条件。因此，他们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中的一个中心原则，即阶级在剥削过程中的相互塑造（constitution）。后帝国主义学者假定说，仅仅让公司中的国际阶级得到处于跨国公司最高层的好处，就能够使他们获得满足。与此相似，跨国唯物主义者通过回溯至貌似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历史时期，得出了他们的霸权世界秩序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在公司的国际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霸权历史性集团的形成过程中，都很少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甚至也不存在反霸权集团夺取“历史性胜利”的可能性（例如，通过革命）。但是，这些统治阶级在形成过程中总是面对着被剥削阶级，这种情况也许有可能，也许并不可能，通过“所在地原则”或霸权世界秩序的建立而得到解决，但它必定是由阶级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危机的产物。换言之，在我们谈论国际统治阶级的产生及其衍生的霸权制度的时候，必须把这些现象解释为对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斗争的动态响应。反抗往往给被剥削阶级带来有利的结果。

坚持强调生产关系在阶级的形成与再生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突出地说明了与后帝国主义学者和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相关的又一个缺陷，也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假定：各阶级在国际上的自组织过程表示资本主义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并因此更确定的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后帝国主义和跨国唯物主义都过分强调了全球的统治阶级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表现能力，而忽视了这些阶级在地方条件下的形成过程。由于这个原因，民族阶级成了更强大的、在全世界组织起来的跨国阶级的附属品。例如，比尔·罗宾逊（Bill Robinson）在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中坚持认为：“地方政府被全球资本主义所捕获，从而解决了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

之间的制度矛盾……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行为日益与全球资本主义相一致。”^①相反，本文采纳的观点却认为，如果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即阶级在国际上是通过剥削的过程而不是惟一地通过他们在全球自我表现能力而形成，那么，地方与全球的关系将变得更有活力，从而也就揭示了资产阶级在全球水平上往往通过政府间组织来调节自身利益并维护十分特殊的地方特权这一事实。从这个视角来看，罗宾逊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管理者，如克林顿、布莱尔、卡多索和姆贝基等”采取的许多政策，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类的全球阶级统治的多边机构来保护地方的、国家的阶级利益。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资本家阶级通过剥削工人阶级来保证自身再生产这一需要——对于这一目标，资本家阶级既在国家范围内、也在国际范围内加以追求，但它并不需要像罗宾逊所认为的那样，必须通过全世界的跨国“自为阶级”组织来达到。

作为全球化之客体的阶级

至此，我已经相当集中地评论了一种有关全球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统治阶级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主体（agent）。综合以上评论，我认为：后帝国主义者和新葛兰西学派对阶级和全球化的阐释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掩盖了社会生产关系在对立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其次，他们根据自己的想像，把假定的国际统治阶级规划世界的权力具体化了。

现在，我将目光转向一些关于战后国际生产组织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并不是都使用过全球化一词，但本质上仍然是有关全球化的。这些著作声称：20世纪70年代的长期的战后繁荣所带来的危机，给世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积累的手段和场所带来了根本的转变。

^① William. I. Robinson,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the State", p. 12.

这些以阶级为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呈现出两个派别；一是福禄贝尔（Fröbel）、海因里希斯（Heinrichs）、克雷（Kreye）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二是一些受到所谓的“调节学派”所启发的学者如胡格威特（Hoogvelt）的“弹性积累”理论。与本文前一部分分析过的观点不同，他们都明显关心生产领域内阶级形成的国际维度。而且，他们还强调世界重构对被剥削阶级的影响。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些理论代表了一种全球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把阶级理解为全球化的客体（虽然并非总是被动的）。

1973年之后的危机对劳动产生了各种影响，在对其进行的分析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也许要算福禄贝尔等人对“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讨论。通过深入实地调查70年代德国的工业资本向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这种资本的国际配置，福禄贝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在资本的价格稳定机制和积累机制方面，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质的变化。生产资本正在被重新配置，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流向了它的外围，从而在一些外围经济体中产生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并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带产生了结构性失业。他们新定，这种全球性的转变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先决条件所导致的：第一，世界性的“劳动储备大军”唾手可得，他们主要（但不是唯独）来自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第二，科技创新的发展，它给生产过程的所有阶段带来了巨大的弹性；第三，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资本和劳动发生了水平的（地理的）、垂直的（社会的）分裂。

他们关于阶级和全球化的研究的相关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福禄贝尔等人承认，在外围，资本的重新配置正在再造着一个产业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最终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却认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加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外围与中心之间的依附性发展关系。由于这些问题在福禄贝尔等人的著作中并未得到清楚的回应，因此，要找寻答案的话，也许应求助于他

们的当代追随者，这些人近年来重新形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命题。例如，斯文兰登（A. Sivanandan）认为：“资本仍然靠剥削工人阶级来获取利润，只不过这类剥削所产生的正面冲击现在已经转移到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剥削程度正在日益加强，大大高于对中心国家的相对损失所作的补偿。”^①

尽管斯文兰登的论述在概念上和经验上都大错特错^②，但他在论述中也提出了一个与阶级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有关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与全球化有关的进程是否以这样一种方式导致阶级之间产生了垂直的和水平的分裂，居然使得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范畴在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候变得多余？我本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我在本文的结尾部分将尽力证明它的合理性。但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在这里应该有必要稍作停顿——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性回答的两种观点，这应该是十分有趣的。

第一个命题是由安琪·胡格威特（Ankie Hoogvelt）从发展研究的角度出发作出辩护的。她在《全球化与后殖民世界》（Globalis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的研究中认为，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的“弹性积累”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已经改变，超出了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范围：

在弹性的生产条件下，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资本分裂成许许多多具有生产能力的小碎片，使现实中的资本与劳动的所有权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其次，劳动成果在交割之时才获得报酬……因此，以兼职工作（有时需要契约）、自我

^① A. Sivanandan, “The New Circuits of Imperialism” in *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Black Struggles for Soc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0), p. 181.

^② 有人认为1973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剥削程度有所提高，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是否在历史上经历过与“畸形发展”相对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欠发达”状态，则至少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雇佣、记件工作等等形式出现的劳动的临时雇佣制，是全世界到处都在出现的社会变化……关键的一点是，在生产组织方式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历史潮流：在这种方式下，资本不再需要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付出代价。^①

尽管角度不同，但按照相同的思路，罗伯特·考克斯也认为：“20世纪末的发展表现出了一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走向统一的趋势，而产业工人和其它从属阶级则变得支离破碎。”^② 尽管考克斯最初曾将生产关系作为他的阶级分析的坚实基础，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后来却转向了以技术官僚化和职业化的威权概念为基础的阶级主义。于是，在他的论述中，统治阶级分裂成了三个部分：“1) 那些掌控着全球运作的大公司的人；2) 那些掌技着大型民族企业和工业集团的人；3) 以地方为基础的小资本家。”^③ 而被剥削阶级则进一步分裂为：“中间社会阶层，他们是一些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新兴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当中新生的产业劳动力”；“农民和处于边缘状态的人”。^④

尽管存在分歧，但上述这些说法无非都在表达同一个观点，即本文前面所谈的全球化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分裂，结果使得资本和劳动在当代社会的分析中成了毫不相干的东西。不管是在特定的生产链条之内的还是在不同的生产地点之间的劳动分工，都使得资本无法解释扩大再生产的任何规律，使得劳动因太零散而无法以任何有效的形式来抗衡自身受到的剥削。

① A. Hoogvelt,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97), p. 112.

②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p. 358; J. Harrod, *Power, Production and the Unprotected Work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同上, p. 358。

④ 同上, p. 368。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个与他们相反的论点，这两个论点很可能为本文下一部分和结论部分所提出的主张做好铺垫。第一个论点是，即使我们暂时假定胡格威特对“弹性的积累体制”的分析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反映了世界经济当中大多数工人的现实状况，但事实仍然是，再多的临时雇用制度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胡格威特认为代表了资本—劳动关系终结的那种弹性的、无约束的剥削关系，实际上反过来提示了直接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赤裸裸的利益冲突：在此，资本家只是由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转向了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但是，这仍然是对资本家有好处的剩余价值！

第二个论点是，考克斯对活动于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阶级的描述性分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解释力（explanatory value）问题提了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我们：“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① 虽然阶级确实是在工作场所内外的人际关系背景下形成的，但这些日常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却只是一系列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外在表现；这些社会结构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把社会划分成两大集体：其中一个集体由那些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谋生手段的个人所组成，另一个集体则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并靠榨取他人的剩余劳动来生存。从本质上说，这两个集体分别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家们曾依据无数其它的方式来划分社会，考克斯和胡格威特也正是这样做的。关键的一点是，他们这些另类的划分方式是否真正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他们根本未曾做到。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资本家与工人的偶然的分裂说成是一种结构性分裂，因而必然把剥削关系也说成是结构性的。作为对世界上所有的

^①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p. 91.

社会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复杂形式的描述，这种把资本与劳动进行细细区分和层层剥离的做法在经验上是有用的，也抓住了问题所在。但是，一旦我们对这样的分类法进行抽象分析和理论推敲，那么，他们的解释就与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引起的阶级对立现象没有多少关联。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理解却很好地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因为它找到了与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不可分离的条件所在：正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剩余价值本身的再生产准备了条件。当然，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扩张及其催生的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使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制和资本积累的机制发生了转变，并因此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设定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限制条件。但是，这种全球再生产并没有改变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的剥削关系。事实上，以前的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剥削形式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同时并存，且经常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将提供一些关于阶级和全球化的一般性思考，并希望借此进一步强调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出现的、资本的抽象的“运动规律”与其具体的历史表现之间的生产性紧张关系。

结论：阶级、全球化和旧体制的延续

很少有人会怀疑，自从长时期的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各种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显然，资本积累和资本流通过程中的科技创新、“全球治理”机构治理范围的扩大、曾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地区的以出口为依托的经济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资本主义替代性道路的缺失，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造成了影响。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明确指出的：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描述自1973年第一次主要的战后萧条以来世界经济发生过的转变和起伏。在做这样的描述时，我们不可忽略

一个事实：作为历史-地理（historical-geographical）发展中恒定的构成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法则仍旧在起作用。^①

在本文中，我曾为一种观点进行过辩护；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我们就可以解释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过程。因此我主张，只有资本和劳动之间那种抽象的（但也并非毫无真实性）对立，才是我们分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难点在于：如何在分析的过程中对这种阶级斗争进行具体的说明。因此，在这里我将回到本文的引言中提出的主张，即资本主义本身是在与其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联过程中进行历史性再造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远远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过的那种“依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的世界”，这种扩张业已证明，资本的适应机制已经使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将其命名为“分化的”生产方式（“differentiated” mode of production）^②。对于阶级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情况的所有含义都是双重的。

首先，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它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挑战；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资本自身的剥削逻辑是如何转嫁到以前存在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上的，如君主政体，种族的、宗教的或种姓的等级制度，尤其突出的是性别差界。其原因是，对世界范围内阶级形成的实际过程的研究提示出，阶级的形成总是存汤普森所说的意义上（即既在客观意义上也在主观意义上）与其它社会等级关联在

^①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9), p. 121.

^② 如想更深入地了解“分化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可参看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这本著作的第十章：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一起^①。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所有这些等级都被包含在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单一逻辑之中，而这种逻辑是由直接生产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确定的。但是，各种形式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时时刻刻都在渗入到这种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关系的根基当中；而且，大部分遗产在本质上都是国际性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遍性与其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表现的特殊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国际的阶级形成与再生过程。

阶级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它绝不可能是静态的。资本主义的动态本性使这些社会等级有可能通过自身的集体组织去实现转变，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往往会巩固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自由交换的信念。例如，只有通过黑人和女工为反抗工作场所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而进行的集体斗争，才能在当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近乎纯朴的、无阻碍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但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全球资本主义或者无力摧毁“自然经济”，或者只是它太能容纳非资本主义形式的镇压和剥削，以至于把我们沿着资本—劳动两极来识别阶级的过程搞得复杂无比。同时，正是阶级形成和再生过程中的这些异质性变化，要求我们在既定的生产方式的结构之内对阶级作出抽象的定义，同时在偶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阶级作出具体的描述。

所有这些思考都显示出如下基本要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按照无数的方式与它自身的国际化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人们对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拱形逻辑的表述也多种多样。通过主权国家的各种制度，通过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种族、种姓和肤色等方面的等级制度，阶级的对立曾经得到了缓和。然而，既然全球化进程是对源自于这些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阶级对立的反映，那么，它往往只会强化而不会破坏这些差别。因此，在微电子工厂雇佣了南亚女

^① 安娜·阿加瑟诺波罗 (Anna Agathenoupoulo) 在她给本文的建议中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更清楚的实际例子，我们两人似乎得出了同样的政治结论。

工的多国公司，往往更容易强化以前存在的对这些妇女的性别歧视^①。同样，在中美洲经营的农业综合企业，也更容易强化而不是淡化混血统治阶级与印地安血统农业劳动力之间的种族歧视。与大多数强调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出现根本性变化的阶级和全球化观点相反，我则把旧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当代的延续——实际上是“坚持”——放到全球资本主义之内来看待。

把即使是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分化的”或“关联性的”生产方式这种观点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含义涉及到如何构筑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这里的起始前提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包含着被剥削阶级的自组织过程，其目的是超越资本主义并打造一个可行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我同时还认为，这样一项事业在范围和组织方面必须是国际性的，并因此必须吸收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这个宝贵传统。我们在前面讨论阶级和全球化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包括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观念）现在仍然在全世界大多数社会关系中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方式确实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以至于只有一种意识到了阶级对立的一般表现和特殊表现之间的分界线的社会运动，才可能转化为一条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这里的意思是说，不管是那种把被剥削阶级具体描述为纯粹的历史牺牲品的阶级和全球化观点，还是那种把跨国统治阶级的主观力量当成既定事实的阶级和全球化观点，都不能够提供一条全面可行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

^① 最近有关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研究显然坚持了这一事实，即这一过程是在明显带有性别偏见的条件下发生的。例如，可参看：H. Afshar and S. Barrientos (eds), *Women, 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Developing Worl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99); S. Horton (ed), *Wom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A. Ong,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ans in Malaysia* (New York: SUNY Press, 1987); V. M. Moghadam (ed), *Patriarc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Guy Standing, "Global Feminization Through Flexible Labour", *World Development*, Vol. 17, No. 7, pp. 1077-1095.

主义道路。此外，我们还应该特别小心，避免把所有的或单独任何一次反对现存世界秩序的运动当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方案。被剥削阶级确实在抵抗，并组织起来向他们所感觉到的敌人进行斗争；但这些斗争既不一定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方案（如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全球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抨击），也不一定表示着系统地反对资本主义（如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反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毫无章法的行动）。这种“自下而上”的观点往往无法阐释“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复杂本质。另一方面，那种把所有的重点放在诸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所谓的霸权性机构上面的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同样没有抓住这些组织与其他表面上处于从属地位的、诸如国家和阶级这样的实体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并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联系。

因此，一种可行的世界性社会主义方案必须尽力弥补以下两种观点之间的差距：一种观点惟一地关注于各种形式的局部反抗，另一种观点则使全球霸权秩序具体化了。我们必须提出一种世界政治的阶级理论，这种理论的前提是：资本主义依靠国家的中和作用以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随之而来的压迫性意识形态，进行着复杂的、多样化的自身再生产。这样一种理论在提到社会主义组织——工会、政党以及其他团体——的使命感的时候，指的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系作经常性的斗争。这种理论同样有可能重新制定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后者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和政治实践曾经在20世纪的美好时期（指战后黄金时期——译者注）抓住过如今似乎迷惑重重的全球化理论家们的心灵。

（曹义恒 译）

第三部
另类视野

第三部 另类视野

美国的帝国主义，欧洲与中东*

萨米尔·阿明

本文旨在分析欧洲和中东在美国的全球帝国主义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其出发点是一种资本主义扩张的普遍历史观，对于这种历史观，我曾在别的地方作过详细的论述^①。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从一开始本质上就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体系，即帝国主义的体系。这种两极分化——由支配的中心、被支配的外围以及它们在每一个阶段都渐趋复杂的再生品所共同形成的结构——内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过程。

在这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看来，从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积累体系的质的变化，构成了中心极与外围极之间的不均衡的连续形式，也就是现实中的帝国主义的连续形式。在可见的未来时期内，只要当代世界体系的基本逻辑仍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那么帝国主义（或两极分化）就不会消除。这种理论把帝国主义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过程联系在了一起，在我看来，这一过程构成的是一个惟一的事实，其不同的维度实际上

* 译自：Samir Amin，2004：U. S. Imperialism,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Monthly Review*, November, 2004. 这是他该文的删节本：“The U. S.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in Pratyush Chandra, Anuradha Ghosh, and Ravi Kumar (eds.),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and Counterstrategies* (Delhi, India: Aakar Books, 2004).

① Samir Amin, *Class and Nation* (New York: NYU Press, 1981); Samir Amin, *Eurocentr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 Samir Amin, *Obsolescent Capitalism* (London: Zed Books, 2003); Samir Amin, *The Liberal Viru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这与通俗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好像以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阶段不是两极分化似的），而且与当代的后现代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把新近的全解释成了“后帝国主义的”。

帝国主义与集体帝国主义的持续冲突

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出现（16世纪）直到1945年，其全球扩张就总是与形式多样化勾连在一起。与阶级斗争一样，各种帝国主义之间的持久的并且往往是激烈的冲突，也在世界转变过程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依此得到了表现。而且，各种帝国主义之间的社会斗争和冲突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种关联决定了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当然，我在这个方面提出的分析完全不同于“霸权的更迭”（*succession of hegemonies*）理论^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帝国主义形式的巨大转变而告终，它用一种集体帝国主义（*collective imperialism*）取代了冲突不断的多样化的帝国主义。这种集体帝国主义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全体成员，或者更简单地说，它指的是这三股势力的集体：美国及其外部的加拿大“省”，中西欧，以及日本。这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扩张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但直到1945年才出现。美国的霸权角色必

^① “霸权的更迭”这一说法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因为它认为在世界体系核心所发生的转变以一种决定性的、几乎是毫无例外的方式支配着世界体系的全球演变过程。我们不应该低估外围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反应。拉美国家的独立、俄国和中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举行的伟大革命、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重新独立，均是外围国家对于世界体系的愤怒反抗。我不相信有谁在描述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的时候能够不理睬这些转变给中心资本主义国家所带来的被迫调整。同时，在我看来，帝国主义的历史更多是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中所形成，而不是在不断更迭的霸权所强加的秩序中形成的。霸权的嚣张时期总是十分短暂的，而所谓的霸权也是非常多变的。

须放到其中来考虑，这一霸权所作出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必要在它新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得到说明。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而我在此正想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它摧毁了该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这给美国推行其经济霸权提供了良好机遇，因为全球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美国，尤其是在改变了20世纪下半叶发展进程的技术领域。此外，美国还单独拥有核武器——一种不坚不摧的新式武器。

然而，在一段相对不长的时期里（20年以内），美国的这些双重优势因为两股势力的上升而逐渐丧失，这两股势力就是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实力，以及苏联的军事实力。我们必须记住，正是美国力量的这种相对退步，使得有人产生了美国正在走向没落的生动遐思，甚至还有人预测说，其它霸权力量的地位有可能上升（包括欧洲、日本，后来还有中国）。

就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戴高乐主义（Gaullism）。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认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目标就是要控制整个旧大陆（指欧亚大陆）。华盛顿政府曾从战略上设计了它在划分欧洲——在戴高乐看来，它的跨度从大西洋一直到了乌拉尔山脉，包括“苏联”——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手段包括召唤出莫斯科人侵这一幽灵，但戴高乐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幽灵。他的分析是现实的，但他总是发现自己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针对华盛顿提出的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戴高乐设计出了一种反策略（counterstrategy），这种反策略的基础是德法和解以及打造出一个非美国的欧洲——戴高乐从中谨慎地排除了英国，因为他把英国恰当地确定为大西洋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于是，欧洲就可以开始与“苏联”和解。欧洲三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即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和解与团结，将会毫无疑问地终结美国统治世界的计划。因此，欧洲计划所特有的内在冲突就可以概括为两条道跨之间的冲突：其一是大西洋的欧洲，在其中，欧洲是美国计划的附属物；其二是非大西洋的欧洲（包括

了俄罗斯)。这种冲突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后来的发展进程——戴高乐主义走向终结、英国获准加入欧盟、欧洲东扩、苏联解体——使欧洲计划遭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来自于两方面的削弱作用：一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二是与华盛顿的政治军事结盟。而且，这些发展进程还使得三强帝国主义（triad imperialism）的集体特征更加突出。

美国统治阶级的计划：让门罗主义走向全球

当前的美国计划，其意图是自负的，甚至是疯狂和罪恶的，但它并非从乔治·布什的头脑中突然产生出来并要求那些通过令人质疑的选举而夺得政权的极右翼团体去执行的。这个计划是1945年以来美国统治阶级不斯地培育出来的，尽管其执行过程总是起起落落，并不能保持其连贯性和暴力性；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证明。

该计划总是十分强调军事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美国非常迅速地制定了一项**全球军事战略**，把世界划分为许多区域，并把控制每一个区域的责任交给了美国司令部。美国计划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包围苏联（和中国），而且是为了确保华盛顿作为整个世界最终靠山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把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扩大到整个世界，实际地给予美国按照它自己确定的国家利益来管理整个世界的权力。

该计划意味着美国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超越了其他支配合法政治行为的所有原则，它遭到了人们对所有超国家权利的系统性猜疑。当然，过去的帝国主义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同之处；而且，那些极力为当前的美国当局所负的责任——及其罪恶行径——找寻借口、进行辩解的人，也在利用这个论据，并且能够轻易地找到历史先例。

但这恰恰是我们早应该看到的1945年以后的历史变化。正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法西斯强权对国际法的蔑视给人们心中

带来了恐惧，联合国才在一种新的原则基础上得以建立，该原则宣告了各国以往确定的战争发动权的非法性。应该说，美国不仅自己认同了这一新的原则，而且是首先倡导这一原则的强权之一。

这一很好的倡议——当时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支持——确实代表了一种性质上的飞跃，并开创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但它却从未赢得过美国统治阶级的深信。华盛顿当局对联合国这一概念一直感到局促不安，到如今他们终于粗暴地宣布了迫使他们隐瞒至今的事实：他们根本就不接受哪种凌驾于他们自己认为是保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之上的国际法概念。我们绝不可原谅这种回归到纳粹分子提出的观点的行径，纳粹观点最终导致了国际联盟的毁灭。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明智而文雅地呼吁支持国际法，这不是他回顾过去产生的怀旧情结，相反，这是他对未来应当如何的提醒。就在那个场合，正是美国为过去做了辩护，其冠冕堂皇的说辞清楚地表明了它的顽固不化。我们有必要至始至终审查美国计划的执行过程，因为该计划是通过他们自己定义的特殊权力关系而形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时，欧洲和日本的资产阶级不仅接受了美国的领导，而且几乎是恳求美国这样做。其原因是：尽管只有弱智者才会真的相信苏维埃的入侵，但这种符咒还是使得他们对美国的权力服服帖帖，也对敌对的共产主义兄弟所猎获的社会民主党人服服帖帖。有人也许会由此相信，新帝国主义的集体特征仅仅源于致治因素；并且欧洲和日本相对于美国的劣势一旦被扭转，他们就会极力摆脱华盛顿这一累赘及其无用的约束。但情况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

我把理由归结为1955年万隆会议（此次会议诞生了不结盟国家运动）之后的20年时间里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苏联和中国对这些运动的支持（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因而，帝国主义不仅被迫接受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它的持制的广大地区（社会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而且被迫就亚非国家参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

条款举行谈判。由美国领导的三强集体结盟似乎对管理南北关系有一定用处。这就是不结盟国家为什么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实际上不可分离的西方集团的原因。

苏联的解体以及从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民粹主义国家政体被扼杀，使得美国的帝国计划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非常大的推行能力。实际上，该计划仍然在为集体帝国主义服务，至少在某一方面是如此（这一点我以后再说明）。它的表现已经达到了对世界的经济统治，这种统治以新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通过七国集团及其服务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强加给饱受压制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来实施。甚至在政治层面上，欧洲人和日本人显然一开始就是和美国计划结成联盟的。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2002年的南斯拉夫战争和中亚战争中，他们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利益，均认可了联合国被边缘化的事实。这个时期还没有结束，尽管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暴露出了表面上的一些裂缝。

美国统治阶级公开宣称，他们不会容忍任何能够动摇美国统治全球的垄断权力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方面的重构；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赋予了自己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权力。美国主要瞄准的对手有以下三个。

俄罗斯是其首要的目标。自从俄罗斯从苏联分离出来之后，它就成为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然而，俄罗斯期的统治阶级似乎并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似乎相信，战争之后就会赢得和平，就好像德国和日本过去的情况一样。他们忘记了，正是为了应付苏联的挑战，美国才需要这两个以前的对手的复兴。现在的新情况有所不同，美国不再有危险的竞争对手了。因此，美国的第一选择就是永久而彻底地摧毁已经饱经沧桑的对手俄罗斯。普京会明白这一点并着手动员俄罗斯统治阶级抛弃他们的幻想吗？中国是美国的第二个目标，中国的强大和经济成就令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瓦解这个大国。

欧洲是世界新主人的这种全球视野中的第三个目标。但是在这里，北美当局还没有显露出他们的焦虑，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英国以及几个新的、奴性十足的东欧政权）的无条件的大西洋主义、欧洲计划陷入沼泽（我后面将回到这一问题），以及三强集体帝国主义的统治资本的利益趋同，都使人们淡忘了欧洲计划。在美国的计划中，欧洲仍然是华盛顿外交的目标之一，美国曾利用这种手段设法使德国服从。欧洲的再次统一以及东欧的被征服似乎也加强了这种联合。德国在鼓动之下恢复了向东扩张的传统；柏林在通过匆忙认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而瓦解南斯拉夫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其他方面，德国也被诱使踏上了华盛顿的轨道。在行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变化呢？德国的政治阶层显得犹豫不决，而且他们的战略选择要等到美国关注之后才会做出。代德大西洋主义联盟的，是巩固新生的巴黎 - 柏林 - 莫斯科轴心（Paris - Berlin - Moscow axis），这一轴心也许会成为独立于华盛顿的欧洲体系的最坚实的支柱。

现在，可以再次思考我们的主要问题了，即：三强集体帝国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它的潜力如何，以及它的美国领导者的矛盾和弱点有哪些？

三强集体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关联及其矛盾

今日的世界是军事单极化的世界。同时，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有关如何从政治上操纵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全球体系方面出现了一些分歧，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些分歧是暂时的、有限的，还是代表了某些长期的变化呢？我们有必要深入全面地分析新时期的集体帝国主义（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南北关系）的变化逻辑，以及美国计划的特定目标。本着这个目的，我将简明扼要地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新集体帝国主义的演变问题

我们发现，新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形成视源于竞争条件的变化。

仅仅在几十年以前，大型公司还发现它们的竞争场所实质上只是国内市场，不管是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的大公司也好，还是欧洲国家（尽管其规模适中，但美国的大公司还是妨碍了它们的发展）的大公司也好。国内市场的赢家在世界市场上也有好的表现。今天，要在首轮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其市场规模需要拥有5~6亿的潜在消费者。因此，战争必须直接从世界市场上开始，获取胜利也必须是在世界市场上。那些统治世界市场的大公司接着就可以将其实力施展在各自的国内市场上。全面国际化成了各大公司的首要活动任务。换言之，在国内和国际这一对术语中，因果关系被颠倒过来了：先前是国内的实力掌控世界局面，而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之。于是，跨国公司，不管它们的国籍如何，在操纵世界市场方面有了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考虑被施加到各种各样的商业冲突头上，而商业冲突塑造出了所有的资本主义竞争形式。

在三强集体帝国主义的跨国资本中，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资本确实勾结到了一起，并在同声拥护全球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看来，美国是这些共同利益的守护者（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动用军事力量）。然而，华盛顿并不想平等地分享其领导权的利益。相反，美国追求的是让那些同盟者们成为美国的附庸；因此，在三强集体帝国主义当中，美国只准备向其附属同盟者作最小的让步。统治资本内部的这种利益冲突是否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破裂呢？不是没有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

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只是为了使自己处在冰山之巅，将本国的优势延伸到所有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但也包括政治和文化领域。因此，服从于美国所粉饰的霸权是不可避免的。

相反，我认为，美国在集体帝国主义的体系当中并没有决定性的经济优势。美国的生产体系决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事实上，没有几个美国生产部门能够确定无疑地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梦想的真正自由的市场上把竞争者打败。美国的贸易赤字在年复一年地

增长，从1989年的1000亿美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5000亿美元。而且，这些赤字几乎涉及了所有的生产领域。甚至美国曾一度引以为荣的高科技产品领域的贸易盈余，在1990年时还有350亿美元，如今也已变成了赤字。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公司（Ariane rockets）与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之间的竞争，以及空中客车公司与波音公司之间的竞争，都证明了美国优势的脆弱性。在高科技产品领域，美国面临着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在普通制造品领域，美国面临着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其它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在农业领域，美国面临着欧洲和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的竞争。如果不是因为求助于经济以外的手段（extra-economic means）、违背自由主义原则以给竞争者施加影响，美国或许不能赢得竞争的胜利！

事实上，美国只受益于其武器生产部门的比较优势，而这恰恰是因为该部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市场规则之外并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这种优势或许会顺带给民用领域带来一些实在的好处（互联网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但它也可能引起严重的扭曲，对很多生产部门产生不利影响。

北美经济是以寄生形式存在的，它对世界体系中的伙伴产生了损害。正如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所回忆的那样：“美国的工业生产消耗有10%依赖于其进口成本无法用自己的产品出口收入来抵消的商品。”^①世界在生产，而美国（实际上没有国民储蓄）却在消费。美国的优势在于其作为掠夺者的优势，其赤字通过向别国借款来弥补，要么出于自愿，要么使用武力。华盛顿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手段来弥补上述缺陷：再三地单边违反自由主义原则；出口武器；从石油上搜寻更大的利益（这意味着对石油生产国的全面控制，它是美国发动中亚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之一）。事实是，美国的赤字基本上是通过欧洲、日本和南方国家（石油富国，

^① Emmanuel Todd, *After the Empire: 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每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买办阶级，包括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提供的资本来弥补的；此外，美国还通过给几乎所有的世界体系外围国家强加债务，来收取额外的资本数目。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长被人们炫耀成遗憾地遭到欧洲拒绝的自由主义的成果。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并且无论如何都推广不了，因为这种增长是依靠资本转移实现的，而资本转移却导致了伙伴的经济停滞。至于现实生产体系的所有部门，美国的增长并不比欧洲好。美国之所以能出现奇迹，是因为它独自享用着由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金融业和个体服务业、律师大军，以及私人保安队伍）所导致的支出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确实为反抗浪潮以及随后的小布什的胜利推备了条件。

导致美国生产体系弱化的原因是复杂的。这些原因当然不是同时发生的，并且不能通过采用某些办法来纠正，如正确的汇率，或者把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适度平衡摆在合适的位置。这些原因是结构性的。普通教育培训体系的庸庸碌碌，以及根深蒂固的、喜欢私人服务甚过公共服务的系统性偏见，这些都是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深重危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令人惊讶的是，欧洲人在观察美国经济状况时不但没有得出美国经济有缺陷的结论，反而积极地仿效它。在这里，自由主义的流毒也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虽然它在麻痹左派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广泛的私有化和公共服务的解体只会降低“老欧洲”（布什这样形容）尚还满意的比较优势。然而，不管这些东西将会造成什么样的长期破坏，此类措施也还是会为短期内见效的统治资本提供获得额外利益的机会。

三、美国计划的特定目标问题

美国的霸权策略内在于新的集体帝国主义框架之中。

传统的经济学家缺乏必要的分析手段以理解这些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反复听到的是那些令人作呕的话语：在新经济中，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原材料一定会失去它们的重要性，因此第三世界正在

日益走向世界体系的边缘。与这种天真、空洞的话语相呼应，现在我们也有了布什政府的《我的奋斗》^①；并且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还在拼命追求夺取世界上所有的自然资源的权力，以便满足其消费需求。对各种原材料（首先是石油，但也包括其它资源——尤其是水）的争夺已经使美国顾不了许多。这种争夺正在变本加厉，因为这些资源显然日益紧缺，这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所固有的恶性浪费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外围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所致。

而且，来自于南方的为数不少的国家一定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工业生产国，不仅在它们的国内市场上是如此，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也是如此。作为技术、资本的引进者，同时也作为出口商品的竞争者，它们一定会以其越来越大的份额来打破世界经济的均衡。不仅一些东亚国家（例如朝鲜）会如此，而且幅员辽阔的中国、未来的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大国也会如此。然而，资本主义在南方国家的加速扩张远不是一个稳定因素，它只能成为暴力冲突（国内的和国际的）的祸根。原因是，在现有条件下，这种扩张不足以吸纳集中于外围的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事实上，世界体系的外围仍然是骚乱地带。因此，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需要向外围施加它们的统治，并且使全世界的人都受制于无情的、为满足它们的优先权所需要的惩戒。

由此看来，美国当局十分清楚，在它寻求霸权的时候，它比对手即欧洲和日本拥有三个方面的决定性优势：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控制，军事垄断，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通过这种文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对这三种优势的系统性利用暴露出了美国政策的许多方面：华盛顿对中东石油生产全力施加的军事控制；对中国和韩国的攻击性策略——利用后者的“金融危机”；

^①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我的奋斗》（*Mein Kampf*）本来是希特勒的著作）。

旨在永久分裂欧洲的狡猾游戏——在防止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真正的友好局面的时候，就动员其无条件的盟友英国参与到游戏之中。在对世界资源进行全球控制的水平上，美国相对于欧洲和日本有着决定性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惟一的国际军事力量，从而任何对第三世界的强硬干涉都离不开美国的领导；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前苏联除外）和日本自己在经济上需要的基本资源极度缺乏。譬如，它们对能源部门的依赖，尤其是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仍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使在某种相对条件下有可能会降低。通过伊拉克战争之类的军事占领来控制波斯湾地区，美国的统治者们显然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强制手段的用处，这种手段也被他们运用到了其竞争者（同盟的）身上。不久前，美国就抓住了欧洲和日本的这种弱点，并且苏联对第三世界的一些干预行动也是为了提醒他们这一点，以使促使他们在谈判中站稳自己的立场。很明显，如果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友好局面（戈尔巴乔夫称之为“共同的家园”），那么欧洲和日本的弱点就有可能得到弥补。这就是为什么打造欧亚大陆留给华盛顿的只有恶梦的真正原因。

四、美国与其帝国主义伙伴之间的冲突问题

如果说三强帝国主义伙伴在对暗含于它们与南方国家关系之中的集体帝国主义进行全球管理的时候存在着共同利益，那么，他们内部所处的潜在的冲突关系也是不容否认的。

美国超级霸权的维持应归功于资本的流动，是资本流动养活了寄生性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因此，美国的这一弱点对华盛顿计划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一般而言，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将不得不从以下两种战略选项中选择一种：要么将它们的剩余资本（即储蓄）用于投资，来为美国的赤字（消费、投资和军事开支）抓供源源不断的资金；要么储存起来，将这些剩余资本用于国内投资。

传统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是无知的，其愚蠢的假设是：由于全球化被认为破坏了民族国家，首要的经济要素（储蓄和投资）再

也不能在国家水平上进行管理了。但无论如何愚蠢，全球水平上的储蓄等于投资的说法确实有助于让别国弥补美国的赤字变得更加合理、更加有力度。这样一种废话是重复推理的典型例子，想要的结论早已包含在前提之中。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接受这种无稽之谈呢？毫无疑问，成堆的、聚集在欧洲（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右翼政治群体与温和派左翼周围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自身也成了其经济学异化物（economic alienation）的牺牲品——我称此为自由主义流毒（liberal virus）。此外，受这种流毒影响，大型跨国资本的政治主张也表露无遗了。这种主张就是：美国代表集体帝国主义来管理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由此而产生的优点胜过了其缺点——即为了确保稳定而必须向华盛顿缴纳贡赋。问题是，人们说来说去的，也只是一种贡赋，而不是一种确实可以得到好回报的报资。有些被定性为重债穷国的国家，总是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为它们的债务打拼，但同时有一个强大的负债国，一旦它认为有必要，就有办法让其债务减值。

因此，可供欧洲（以及世界上的其它地区）选择的另一条道跨是，停止这种有利于美国的资本输出。这样一来，剩余资本就可以在（欧洲）当地使用，并实现当地的经济复苏。美国的资本输入需要欧洲服从于传统经济学所瞎说的“通货紧缩政策”，即我所说的“滞胀政策”——把那些可供输出的储蓄剩余拱手送人。它使得欧洲经济的艰难复苏还要依赖美国的人为支持。把这种剩余用于欧洲本地的就业，就会同时刺激消费（通过重建被自由主义流毒毁坏了的经济管理的社会基础）和投资（尤其是新技术投资和科研报资），甚至刺激军事开支（终止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选择这种反应，将意味着有利于劳动阶级的社会关系再次走向平衡。在欧洲，这种反应把选择的机会留给了资本。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在根本上不会与它们各自那部分主导性资本的利益相冲突。它首先是由政治文化差异造成的。

五、上述思考所引发的理论问题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集体帝国主义伙伴之间为控制南方国家——掠夺自然资源并压服那里的人民——而进行的合谋与竞争。在这方面，我将进行三个角度的考察，它们在我看来都很重要。

首先，我所描述为集体帝国主义的当代世界体系与以前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当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一种“后资本主义”性质的“帝国”。

其次，我提出了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新解读，认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其建构以帝国主义（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别为轴心。

最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通过解除管制的市场开放所产生的经济体系的一体化（unification）并不是同样的意思。后者——在连续性的历史形式下（过去的贸易自由，如今的公司自由）——总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计划当中。实际上，这种计划几乎总是被迫根据各种并不符合该计划本身单一的、特定的内在逻辑的需要进行调整。因此，除了在某些短暂的历史瞬间，计划从来就难以执行。由当时的主要工业国即英国所推崇的“自由交换”，实际上只维持过20年的时间（1860—1880），之后就是一个世纪的（1880—1980）的帝国主义冲突、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背离，以及民粹式民族主义国家的轻度背离（即万隆会议时代，从1955年至1975年）。1980年以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新自由主义扩散到了整个世界，由此开创了世界市场重新统一的当前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大概也注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它所帝来的混乱证实了它作为“资本的永久乌托邦”（permanent utopia of capital）的本质，我曾经用这个术语来描述1990年以后的世界体系。

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中东

一、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如今被与高加索山脉和前苏联中亚的边界地区放到一起考虑的

中东，在帝国主义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尤其是美国的霸权计划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此的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石油财富，旧大陆（Old World）心脏地带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世界体系中难守易攻地区的事实。

对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三强经济而言，在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上获得石油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要确保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手段就是对该地区加以牢固的政治控制。

但是，中东之所以那么重要，还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该地区正处于旧大陆的中心，从巴黎、北京、新加坡和约翰内斯堡到中东的距离都相差无几。古时候，对这个处于必经之途的交叉地带的控制，让哈里发帝国（Caliphate）获得了从那一时期的长途贸易中抽取大部分收益的特殊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位于苏联南部边境的地区对于围攻苏联政权的军事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苏联这个敌人解体之后，该地区仍然非常重要。美国对该地区的统治，使得能源供应依赖于中东的欧洲降到了从属地位。一旦俄罗斯被制服，中国和印度也将受制于美国在能源方面的长期勒索。因此，对中东的控制将会使门罗主义扩张到旧大陆，这是美国霸权计划的重要目标。然而，华盛顿为确保控制该地区而从1945年以来所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尽管排斥了英国和法国，但至今也没有取得可供炫耀的成就。在这方面，我们也许还记得美国企图通过《巴格达公约》让中东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遭到的失败，以及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伊朗国王巴勒维二世（the Shah of Iran）的下台。

理由很简单，阿拉伯（和伊朗）的民粹式民族主义计划莽撞地与美国的霸权主义计划发生了冲突。阿拉伯计划的打算是迫使世界强国承认阿拉伯世界的独立。由亚非人民的解放运动所推动召开的1955年万隆会议所发起的不结盟运动，是那个时代的最强大的潮流。苏联很快就明白了过来：通过向阿拉伯计划提供支提，就可以使华盛顿的侵略性计划遭受打击。

这一时代走到了尽头，这首先是因为阿拉伯世界的民粹式民族

主义计划迅速地耗尽了它的转变能力，并且其民族主义政权很快陷入了专制主义，使得转变的希望和梦想都化为了泡影。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真空为政治伊斯兰教（political Islam）和反启蒙的波斯湾独裁政府这个华盛顿的好友大开了方便之门。中东地区成了世界体系的一根软肋，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涉（包括军事干涉），而那些缺乏合法性的现有政权对这些干涉既无力阻止，也不得不忍受。和加勒比地区一样，中东地区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美国全球军事地理布局中的一颗最重要的根子，在该地区，美国的军事干涉获得了“正当性”。从1990年以来，他们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美国在中东的活动是在两个无条件的忠实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密切合作之下进行的。欧洲被排斥在这个地区之外，并被迫接受了这一说法，即美国是在保护帝国主义三强的全球重大利益，也就是石油供应。尽管伊拉克战争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愤怒迹象，但是在这个地区，欧洲基本上还是惟美国是听。

二、以色列的作用和巴勒斯坦的抵抗

以色列的殖民扩张主义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以色列是世界上惟一个拒绝承认其边界确定的国家（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不应该有加入联合国的权利）。与19世纪的美国一样，它也宣称自己有权为了殖民扩张而占领新的地区，并且有权把那些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当作是“红皮肤人”（redskins）^①。以色列是惟一公开宣布自己不受联合国决议约束的国家。

1965年就已得到华盛顿默许的“1967年战争”，是为了追求下面这几个目标：着手推倒这些民粹式民族主义的教权；切断他们与苏联之间的联系；迫使他们自己回到美国规定的位置；为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的殖民开辟道路。在被占领地区，以色列于1967年设立了与南非并无二致的种族隔离制度。

正是在这里，统治资本的利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走到了一

^① 红皮肤人：redskins，对美国土著人的贬称——译者注。

起。一个富裕的、强大的、现代化的阿拉伯世界将会给西方国家掠夺其石油资源的“正当性”提出挑战，而掠夺石油资源又是资本积累所与生俱来的持续浪费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帝国主义三强国家的政府当局——它们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的忠实奴仆——根本就不想要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阿拉伯世界。

西方列强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盟因此就建立在了牢固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种联盟既不是欧洲人对反犹太主义和纳粹罪行深感内疚的产物，也不是“犹太说客”（“Jewish lobby”）利用这种情感所导致的结果。如果西方列强认为犹太复国运动的殖民扩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立刻找到克制他们的内疚情感或阻止说客活动的方法。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但我并不相信民主国家的公共舆论可以向西方列强施加影响。我们都知道，舆论也是人造出来的。正如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古巴一样，西方列强即使是来取比较温和的封锁手段，以色列也支持不了几天。因此，要使以色列恢复理智并创造出真正和平的条件并不难，假如它们真要这样做的话——但它们并不想。

1967年战争失败不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就声明：由于美国握有“百分之九十的卡片”（他的说法），因此有必要与苏联断交并与西方阵营握手言和。他说，这么做可以使华盛顿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好让它恢复理智。除了这类在萨达特嘴里也很少听到的——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并没有坚持下去——战略思想，阿拉伯的公共舆论基本上还是明白不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逻辑，甚至也很少认识到自己的矛盾和弱点。说“西方有一天总会明白，其长远利益就是与两亿阿拉伯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为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做出有损这种关系的事情”，是否还不到时候？这种说法无疑是在假设，作为资本的帝国中心的“西方”，是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发达的阿拉伯世界的，而不希望阿拉伯世界总是软弱无力。但问题是，支持以色列显然更有好处。

1993年，在马德里和奥斯陆有过几次谈判，这些谈判同意了美

国所谓的最终和平方案。但是，根据这一方案，阿拉伯各国政府——叙利亚和黎巴嫩除外——做出的选择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结果，其结果和以前毫无差别：怂恿以色列巩固其扩张计划。如今，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公开否认了奥斯陆合约的条款，但他也只是证明了早已清楚的事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达成最终和平的方案，而是为了开辟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新阶段。

以色列和西方列强对这一方案的支持，给该地区造成了永久战争的局面。反过来，这种永久战争的局面又助长了阿拉伯各国的独裁政权。这种阻碍一切民主进步的做法，削弱了阿拉伯复兴的前景，并因此推动了统治资本与美国霸权战略之间的联合。这个循环是完整的：以色列和美国的联盟，对这两个伙伴都大有好处。

1967年开始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起初给人们的印象是能够得偿所愿的——由可怕的精英和商业资产阶级来管理占领区的日常生活，表面看来已被巴勒斯坦人所接受。由于在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1982年）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被驱逐到了偏远的突尼斯，它对犹太复国主义合并的威胁似乎也已经解除。

首次阿克萨起义（Intifada）^①爆发于1987年12月。这次起义让人惊讶的是，平民阶层突然走向了街头，尤其是那些被禁锢在难民营当中的赤贫阶层。阿克萨起义通过组织系统的温和抵拉行动来破坏以色列政权。以色列的报复是残忍的，但它再也无法重建一支有放的警察队伍，也无法让可怕的巴勒斯坦中产阶级回到原位上去。相反，阿克萨起义却要求那些被驱逐的政治力量全部回到以色列，建立新式的地方组织，并要求中产阶级效忠于这场解放战争。发动

^① 1987年12月9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加伯利亚难民营”，压死4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走上街头，展开与以色列当局持续6年的对抗。这就是震惊世界的“Intifada”，即“阿克萨起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当时设在突尼斯，“哈马斯”组织被猜度为幕后指挥者。“Intifada”这个词在老版英文字典中是找不到的，它出自于阿拉伯文“起义”一词的谐音——译者注。

阿克萨起义的是一群青少年，即“阿克萨青年团”（chehab al Intifada），他们最初并不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正式成员中组织起来的，但也决不是该组织的敌对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四个派别（法塔赫 [Fatah]，效忠于他们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巴勒斯坦共产党）均主动投入了阿克萨起义，并因此获得了“阿克萨青年团”中大部分人的认同。尽管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早年曾通过1980年出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从事过一些活动，但他们的表现并不积极，因此只好把位置让给另一种新的斗争方式——1988年成立的哈马斯（Hamas）。

随着阿克萨起义两年后出现了奄奄一息的迹象，而且以色列的镇压也变得越来越严厉（包括对青少年动武，关闭绿色通道使得巴勒斯坦工人惟一的收入来源陷入被切断的境地），“谈判”的局面开始形成。谈判首先由美国发起，所带来的成果首先是马德里会谈（1991年），然后是所谓的《奥斯陆和平协议》（1993年）。这些协议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返回被占领区，并转变成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奥斯陆协议》曾设想把被占领区变成一个或多个“班图斯坦”（Bantustans）^①，这样就可以最终把它们整合进以色列的版图。在这个框架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班图斯坦”一样，只能成为一个虚假的政府，并且事实上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秩序的传声筒。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即现在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返回了巴勒斯坦，并着手建立它的秩序，但它碰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该权力机构把大部分“阿克萨青年团”成员吸收进了自己的组织，后者曾共同发动了阿克萨起义。通过1996年的选举磋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现了它的合法性；在巴勒斯坦人全体参与的选举中，阿拉法特以

^① 班图斯坦：Bantustans，南非白人政权时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划定的黑人居住地。

压倒性的优势（80%）当选为权力机构主席。然而，该权力机构仍然处在模棱两可的位置：它是应该同意履行以色列、美国和欧洲（也就是一个“班图斯坦”的政府）指派的职责呢？还是应该与那些不屈不挠的巴勒斯坦人走到一起？

尽管以色列已经颁布了《奥斯陆协议》的部分条款，并且用它取代了纯粹的军事暴力手段，但由于巴勒斯坦人民拒绝班图斯坦计划，以色列决定公开放弃该协议。1998年，战争罪犯沙龙（Sharon）在耶路撒冷圣地策划了一系列挑衅事件（但也得到了工党政府提供坦克的帮助），同时，以色列政府首脑中另一个同样的战争罪犯在选举中获胜（以及像西蒙·佩雷斯 [Simon Peres] 这样的鸽派人物也在协助该政府），这些都是导致第二次阿克萨起义的原因。目前，这一起义还在继续。

那么，这种起义能不能成功地将巴勒斯坦人民从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中解放出来呢？现在这样说还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人民如今已经有了一种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它并没有遵循一党制的解放道路（尽管一党制国家的现实情况总是更加复杂的）。它的各个派别均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自己对未来的着法，以及自己的意识形态、骨干力量和追随队伍，但在领导这场斗争方面，他们显然都知道怎么做。

三、美国的中东计划

民粹式民族主义政权的衰落，以及苏联援助的消失，给了美国推行其中东计划的机会。

控制中东当然是华盛顿全球霸权计划的基石。那么，美国是如何想方设法确保对中东的控制的呢？自从华盛顿提议启动一个建立“中东共同市场”的奇怪计划以来，十年已经过去。根据这一计划，波斯湾的一些国家应该提供资本，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则应该提供廉价劳动力，同时要保留以色列在科技方面的控制权，以及作为享有特权的、左右逢源的调解人的职能。该计划尽管得到了海湾国家和埃及的认可，但也遭到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抵制。因此，

为了执行该计划，有必要打击这三个政权。现在，伊拉克已成了第一个打击对象。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维持这个计划，必须建立起何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华盛顿的宣传家们鼓吹的是“民主政治”。事实上，华盛顿忙来忙去，不外乎是想用所谓的伊斯兰反启蒙主义独裁政治（Islamic obscurantist autocracies）来取代陈旧腐朽的民粹式独裁政治。与所谓的温和派政治伊斯兰教（这一派别有足够的 ability 制止恐怖分子的秘密活动，从而控制局面，因为它把“恐怖分子”仅仅限定为针对并且只是针对美国的行动）的重新合作，如今构成了华盛顿政治选择的轴心。正是按照这种观点，才可以谅解中东社会制度中的陈旧的独裁政治。

面对美国计划的推行，欧洲人也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并美其名曰“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明显教弱无力的计划，满篇空谈阔论，当然，它也提出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和解的建议。通过把海湾国家排除在欧洲-地中海对话之外，这一计划承认了管理和控制海湾国家是华盛顿专有的责任。

美国计划的胆大妄为与欧洲计划的软弱无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现实存在的大西洋主义中，美国和欧洲之间并不存在基于平等基础的决策上的共同责任和协同行动。曾亲自提倡要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相信，他本人能够为这样的选择找到合适的理由，因为大西洋主义应该以这种共同责任和协同行动为基础。如果说这种想法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愚蠢的欧洲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坏的信念努力，那么，现在美国人的傲慢自大却时刻都在表明布莱尔的希望不过是一种泡影。斯大林的现实主义说法，即纳粹分子“不知道何处才能止步”，正好可以用来推写那些掌管美国的人。布莱尔所求助的希望，和那些寄希望于墨索里尼有能力稳住希特勒的人所想的并无二致。

欧洲人还有不有别的选择？它是否已成形？希拉克反对“单极大西洋世界”（他似乎完全明白这事实上就是美国单边霸权的同义

词)的言论,是否预示着多极世界的建立和大西洋主义的寿终正寝?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欧洲就必须首先让自己逃离那片曾经滑倒和深陷的沼泽地。

四、欧洲计划:陷入自由主义的沼泽

欧洲各国的所有政府都被自由主义的论调争取了过去。欧洲各国所受的这种牵制只不过意味着欧洲计划的落空,落空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经济的,即欧盟的经济优势消融于经济全球化之中;二是政治的,即欧洲的政治和军事独立消弭于无形。在当前时期,欧洲并没有任何计划。取而代之的,则是美国主导下的北大西洋计划,或某种帝国主义三强的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曾试图挽救其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劣势。1989年后,苏联的威胁如暴风骤雨般逝去,给一个半世纪的欧洲历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欧洲大陆的三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重新握手言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积极的,并且仍然有着充足的、更大的潜能。当然,它们都是从上往下影响到依握自由主义原则所重建的经济基础的。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自由主义还不那么极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性妥协抵消了它的部分影响,而这种妥协使得资本不得不自我调整,以满足工人阶级提倡的社会公平的要求。后来,这种自由主义才朝着由美国式的反社会自由主义(antisocial liberalism)所鼓吹的新的社会结构的方向发展。

这种近期的转变已经把欧洲社会拖入了一个多方面危机的陷阱。它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危机,或多或少是自由主义政策所固有的。欧洲国家堕落到迎合美国领导层的经济需要,则使危机进一步加剧:欧洲到目前为止还在同意为弥补美国赤字提供支持,甚至不惜以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接踵而来的是社会危机。平民阶层因反对自由主义政策给他们造成的不幸遭遇而做的反抗和斗争,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危机。最后,政治危机也苗头初现——拒绝迎合(至少是无条件地迎合)美国针对南方国家发动的无休止战争的需要。

美国制造的战争的确惹怒了公众的舆论（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这种影响），甚至惹怒了某些政府，首先是法国政府，其次是德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还有中国政府。但事实依然故我，这些政府并没有对自己迎合自由主义需要的忠实态度产生怀疑。这种巨大的差距无论如何都必须弥补，他们要么服从华盛顿的需要，要么就真正决裂，把大西洋主义打入地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得出的主要政治结论是：只要权力集团所形成的政治联盟仍然建立在跨国统治资本的基础上，欧洲就不可能迈过大西洋主义的门槛。只有通过社会和政治斗争，设法更政这些权力集团的构成，并强迫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新的历史性妥协，欧洲才有可能使自己远离华盛顿的控制，并最终复兴其欧洲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还可以——甚至应该——在国际水平上处理与东方和南方的关系，不再沿着集体帝国主义的惟一需要的轨道前进。这样一条道路将会让欧洲加入到超越资本主义的漫长征程。换言之，欧洲或者成为左翼，或者什么都不是。

（曹义恒 译）

帝国主义：历史阶段还是当今现象？

琳达·卡蒂

什么是帝国主义？“它是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范畴吗？”有人常常这样问我们。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对帝国主义概念进行探究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式——例如后现代主义——当中，人们也在提出这一问题，并将其放在历史知识框架当中进行探究，并对此加以解构（deconstruct）和重构（reformulate）。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帝国主义概念值得重新讨论，我并不是想排斥这一概念，而是想完善它。本文的观点是：尽管在理论框架和政治结构方面，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存在一些带有帝国主义全部“原初印记”（original stampings）的当代情形。在理解这些关系时，尽管事实上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曾经想完善帝国主义概念，必须注意到现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术论文并没有得益于女权主义，否则，怎么会出出现那种无的放矢的后帝国主义概念呢？生活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们的特殊状况赋予了帝国主义概念以新的涵义。我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探讨问题的。

在当前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中，一些正统的学者提出了后帝国主义理论，以描绘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特征。很明显，在我们理解帝国主义的时候，发生了一种范式的转换。但是，任何对帝国主义“后”阶段的看法都必须理解其自身的历史性：这些看法所具有的说

译自：Linda Carty: Imperialism: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or Present - Day Phenomen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57, Fall 1993。

服力和解释力，都是从世界上从属于帝国主义的人们所受的压迫遭遇中获得的。这种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存在归功于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他们每天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排斥，大多数排斥发生在领土边界之内。这样的边界划分得十分清楚……它使得后帝国主义理论的提出既简单又稳当”。

为了真正理解应该如何把后帝国主义理论放到帝国主义争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我们有必要提出一系列和这种后帝国主义理论概括有关的基本问题：后帝国主义的前缀“后”（post）指的是什么？现在为什么要使用这一概念？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来说，帝国主义的土壤仍然存在，那么，后帝国主义概念的含义又是什么？这种后帝国主义理论概括的潜台词是什么？如果像后帝国主义者宣称的那样，当前的历史条件使得帝国主义不复存在，那么，这种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后帝国主义理论为完善或重构帝国主义理论又添加了什么样的分析？传统学者的主张与当代学者的主张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连续性？最后，是谁在提倡后帝国主义理论？

尽管因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详尽回答，但关键要把它们看作是替下面这些主张所作的铺垫。帝国主义是在20世纪刚开始时出现的，当时它被当作一种分析框架，并在列宁（V. I. Lenin）和考茨基（Karl Kautsky）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辩论中备受瞩目。当时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开端时期，各公司纷纷扩张，以卡特尔的形式联合在一起，同时资本家们也在寻求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目的是打下和夯实其扩张基础。不管是列宁，还是考茨基，在分析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时候，都试图再次启动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分析计划。正如马克思从未讨论过殖民主义一样，他也从未写过任何有关帝国主义的东西，尽管我们从许多资料中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贯穿于他关于中国、爱尔兰和印度这些特例的著作当中。有关帝国主义的争论的焦点是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转到垄断阶段的特征，而马克思并没有见到过这些特征。

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国际投资、出口

市场扩大和廉价原材料方面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催生了殖民帝国，这些殖民帝国由世界上大多数贫穷民族和非白人民族所构成。从此开始了一场以肤色为界线的国际劳动分工。现在，尽管资本主义面临着另一场周期性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屡屡发生的两数俱伤的种族战争所经历过的危机，但帝国建设当中所带有的军国主义特征、最发达国家和以往的帝国王侯对原材料的搜寻，在它们的旧形式中也许再也无法辨认，如今却引人注目。的确，我们可以说，那些发动了近期的海湾战争的国家，那些搜上民主外衣来操纵选举并迫使尼加拉瓜圣利诺政府下台的国家，那些使古巴不断边缘化的国家，那些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国家，那些为保住南非垂死的种族隔离制度而把军队派往该国的国家，其对象和目标与 19 世纪末的旧殖民主义帝国政权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里还只是列举了近期众多国际事件当中的几个而已，引发这些事件的，或者是种族主义者的优越性在作祟，或者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尤其是美国出于加强在这些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或控制力的需要。

如果我们只是把帝国主义概括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它的理论意义，那么当然，我们就会得出资本主义的后帝国主义阶段这种不可思议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也注意一下帝国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所具有的政治含义，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更有用的解释方法，以便更好地分析我们今日所遇到的各种新的政治结构和理论框架。尽管我们不能贬低当前历史时期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也确实不能得出我们还处于与过去同样的历史时期的庸俗荒唐的结论，但我们必须明白，范式转换需要的并不仅仅只是划分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

那些关于后帝国主义、美国霸权衰落的论断，以及那些对多元文化历史辨读方法——尽管它显然是理解帝国主义的侯一方法——的恰当性的批评，都是基于一种对资本主义非常狭隘的理解。他们的目光都聚集在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上，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

典型特征是：军国主义、国际投资，以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原材料与市场的垄断。这是一个以显赫帝国为标志的阶段。在后帝国主义论者看来，一旦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特征不那么突出，或者它的形式发生变化，其意识形态也将发生变化。他们还将注意力集中于资本主义空间的一种特殊布局上。因此，当全球力量出现重新洗牌时，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上升时，这种重新洗牌就被他们当作证据，用以证明这些过去的帝国主义附属国现在是如何地解放了自己，并因此不能再谈论帝国主义。但是，这些理论家却未曾认识到东欧出现的状况及其潜在意义。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例如，英国就处于衰落之中。

虽然在 20 世纪早期，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美国的变化程度相对要小，但如今，那时期的霸权力量都在衰退，而日本和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却在崛起。这些洗牌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美国在 20 世纪尤其是战后的地位急剧上升。尽管美国的崛起不是按照正式的殖民形式发生的，但如果说这不是帝国主义，那我们在看待美国对波多黎各、美尔京群岛的领土声明，以及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地缘政治霸权时，就会不知所措。

这种空间上的重新布局贯穿于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说帝国主义已经寿终正寝，显然是不成立的。资本积累的形式已经放变，重新布局的主体发生了变化，霸权已经转移，甚至帝国政权在吸引同盟国方面的军国主义性质也正处于变化当中。也就是说，它们不再采取直接的政治统治，而代之以其它形式的压迫和服从，例如双边贸易关系。事实上，甚至国家的角色在帝国主义关系中也已经改变。如今，跨国公司成了这种关系中的最强大的一员。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现在仍然是最为合适的。实际上，跨国资本的增长和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已经给继续运用和建构这种分析框架带来了新的可行性。当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于 1950 年出版时，它解释的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落

后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把殖民主义现象放到政治过程之外进行研究。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往的资本主义转型理论只是把帝国主义或边界的跨越（即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看作一种政治事件。

霍布森（J. A. Hobson）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学者认为，国家边界的跨越仅仅是旧有超势的反映。毕竟，帝国主义和权力有关。但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本质上不只是一个权力和权威的问题，而是某个社会企图控制别的地方的欲望。这是社会生产关系内部逻辑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发展。所有发生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和原始积累身上的争论，都源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与殖民主义的关系。

在这场争论中，帝国主义概念的运用方法之所以出现失误，是因为这种方法受到了内在于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的干扰。在任何有关帝国主义的话语中，以牺牲大部分人利益为特征的贫穷国家的普遍贫穷，以及造成和维护这种普遍贫穷的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霸权关系，都必须受到深究。

帝国主义是一个“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现实，它在贫穷国家不仅剥削男人的劳动，也剥削女人的劳动。在现阶段，帝国主义表现出以下特征：全球组装线，劳动力大规模移民，资本集中，为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而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最近的例子）和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以及全世界有色人种（people of color）日益加剧的贫穷化，不管他们是在所谓的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这些特征部分源自于种族主义的社会结构规则，并从19世纪形成的历史环境中吸取了它们所采取的形式。甚至连种族国家（racial state）的观念也是因指代这些历史环境而获得人们关注的。

帝国主义对当代性别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女性的身体上，不管她们是不情愿地成为曼谷、马尼拉、拿骚或蒙特哥贝湾的旅游业组成部分的妓女，还是在墨西哥的出口加工区做每天挣2美元的电子、

服装厂工人，帝国主义关系都给她们带来了压力。在第三世界的历史上，女性身体的性别化（sexualization）和经常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极大地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例如，在印度殖民主义时期，印度妇女就被迫成为妓女，向驻扎在那里的英国军人提供性服务。这是通过英国法律强加给印度社会的制度，这些法律的用意本来是保护英国妇女，却使印度妇女成了性商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男性帝国主义在菲律宾造成的影响。在那里，40多年以来，菲律宾妇女被怂恿去做妓女，为驻扎在遍及她们国家的美军基地的美国军人服务。像美国海军最大的海外基地所在的城市——奥隆阿坡市，整个城市都围绕着基地建造，并且当地居民把做妓女当作是最主要的就业形式。大多数妓女都是20来岁的青年妇女，以前在菲律宾出口加工区的多国公司里做工。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她们不再有用，因为她们在工厂的极度恶劣的环境下患上了眼睛疲劳症或中了毒气，只好找到坡女这个惟一可以从事的职业来做。

菲律宾的特殊例子为我们展示了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新面孔。每年都有超过25万的妇女或者作为国内雇员或者作为性奴隶涌进国际劳动力市场。这些妇女已经成为给菲律宾政府带来外汇收入的主要出口商品。从马科斯（Marcos）政府到阿奎罗（Aquino）执政时期，菲律宾人为政府带来了大约2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政府则用这些钱来偿还国际银行贷款。因此，帝国主义不是某种关系的附带现象，也不只是构成这种关系的结构性因素，而且还是伴随国际劳动分工而来的社会关系的构造过程，这种国际劳动分工是以被认为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的性别的、种族的、阶级的劣势为基础的。劳动分工把最发达国家与世界上那些经历着抑制性发展的国家割裂开来。不管是非洲的咖啡或烟草产品、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加勒比地区的蔗糖、通过电脑从牙买加和毛里求斯传递过来的原始数据，还是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人对信息业务的推动，劳动分工都造就了一种外围与中心的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部分世界——所谓的第

三世界——被边缘化，并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跟班角色。这一角色是由资源控制权决定的，它承认其权力依附于中心国家。在不平等的全球化过程中，第三世界生产的剩余价值流向了别的地方，即流向了中心，并且促进了中心的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外围则因为剩余价值的流失而在所有方面都与中心不同。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迥异，而且受到了压抑，结果就是普遍的贫穷。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间保持的新的帝国主义关系的生动图景，在美国与它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邻居之间的政治、经济剥削关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通过其国会作出的贸易、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决定，来控制这些地区的经济。当美国总统和国会决定为海地的叛乱提供资金或者挫败海地的民主政治以便扶持海地的军事独裁的时候，或者当他们决定修政贸易关税规则来破坏加勒比本地经济发展的时候，以及当他们通过允许美国公司只付增殖税（这意味着对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生产的商品只征收少量的税，或者根本就不征税）的贸易法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作出这样的决定，其起因是法律制定者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要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更进一步说，由于这些决策的受害者不是白人，因此在迫害问题上他们并不面临什么道德困境。例如，美国有一项遣返海地偷渡难民的政策，而古巴人却在同一水域、有时候就在同一条船上接收他们，并报之以热烈的欢迎和居民身份。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其原因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

就在1973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后来的世界银行行长，在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一种看法。他在总结人们对于贫穷的备种理解的时候，提出了“相对贫穷”与“绝对贫穷”的概念。他说，绝对贫穷的受害者“就是那些连最基本的人类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人”。回头看看，以前世界上的穷人据估计有40%生活在绝对贫穷的条件下，现在，这一估计已经超过了60%。这些穷人就是帝国主义的新商孔。对于他们而言，帝国主

义不是指某个历史阶段，而是指吃的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则是他们国家的自然资源已经枯竭，以及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对他们的劳动的过度剥削。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思考什么后帝国主义。而且，即使美国霸权已在衰落，他们也肯定感觉不到有什么两样。

如果我们把后帝国主义概念当作是一种进一步阐明帝国主义要素的愿望（尽管有些用词不当），那么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想证明这是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时代，那么，后帝国主义的论断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真正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可以说，谁要想真正地理解和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就必须走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舒适生活。尽管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形式始终在变化，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还是能看到不平等关系的相同表现：日益加剧的贫穷、人们为了寻找生存的手段而大规模地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国家的依附性、妇女为了抚养孩子而被迫出卖她们的肉体、外国资本控制下的生产，等等。这正如俗语所说：变化的东西越多，不变的东西也越多。

（曹义恒 译）

帝国的幻象*

巴希尔·阿布曼那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200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它震撼了整个知识界。在宣告“宏大叙事”和人类解放工程的死亡以后，讲述最宏大的故事——资本极权化（totalization）的书却问世了，并且预言了所有革命中最宏伟的结果——共产主义。于是，后现代禁忌被粉碎了，或似乎被粉碎了。民众的预言家哈特和奈格里，在自由主义舆论界中被适时地得到承认，并享有盛名。在英国，新派政治家以“左派应该喜爱全球化”为主题，和奈格里进行了访谈。奈格里声称，全球化导致了真实的、民主的“全球公民权”（global citizenship）。在美国，《纽约时报》评论家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把《帝国》推崇为“下一个大理论”（next big idea），他宣称，这一亟需的“大师级理论”（master theory）克服了人类近10年来所表现的“严重的悲观主义”、“平庸”（斯坦利·阿伦奥威茨 [Stanley Aronowitz] 的术语）、“危机”和“空虚”。帝国（无论是书还是概念）的出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它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虽然它难以定义，用哈特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超越国际体

* 译自：Bashir Abu - Manneh, *The Illusions of Empire*, *Monthly review*, June, 2004. 本文的翻译得到原作者的授权。全文可见：<http://www.globalpolicy.org/empire/analysis/2004/june2004illusionsempire.htm>。译文圆括号中的所有数字都指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英文本《帝国》的页码。

制和帝国主义的巨大历史进步。”^①

保守主义舆论界的反应就不是那么客气了。虽然他们强调哈特和奈格里是坚持帝国主义终结的全球化支持者，如伦敦《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却在与哈特访谈结束时，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约翰·格雷则说，对此书“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对我来说，更像是对美国人道主义糟糕状况的反应，而不是对全球化的一个严肃批判。”而在美国《国家评论》杂志工作的大卫·普莱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则把这本书解读为复兴“上一个无法实现的大理论”——共产主义——的滑稽尝试。他继续谴责自由主义舆论被68代的“时髦知识分子”所愚弄，被“修正过的旧式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解构和后结构主义的崭新术语所占据”。针对哈特和奈格里的苏联是“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而终结”的解读，普莱斯-琼斯给予了最恶毒的攻击：“如此的嘲弄是对被端愚蠢的白痴的一种颂词，只有与现实毫无关系的想象才能炮制出来。”^②

对左翼来说，本书既受到赞扬，也遭到批判。实际上，《帝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大争论、帝国主义的当代形式、后冷战时代等重大主题的焦点。在本文中，我对《帝国》的考察也与这些主题相关。我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为了考察这些在《帝国》中提出的概念和理论工具的有效性；第二，是为了促进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正如我在下文中将要主张的那样，围绕着帝国所争论的定义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进入哈特和奈格里所主张的“后帝国主义”阶段，或者说，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它规

^① Mark Leonard, "The left should love globalization," *New Statesman*, May 28, 2001; Emily Eakin, "What is the next big idea? Buzz is growing for 'Empir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01.

^② David Smith, "He foresees a great future for the workers," *The Sunday Times*, July 15, 2001; David Pryce-Jones, "Evil Empire; the communist 'hot, smart book of the moment,'" *National Review*, September 17, 2001.

定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而且是因为它决定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的可能性。

后帝国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

为了理解哈特和奈格里方案的性质，勾画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是重要的。在十月革命爆发很久以前，列宁曾经说过：

然而，人们能在抽象的意义上否认帝国主义之后有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段，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是“可以设想的”吗？不能否认，在抽象的意义上，人们能够设想这样一个阶段。然而，在实践中，以设想未来的温和任务为名而否认今天的尖锐任务将成为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说，这意味着自己不能以现实生活正在进行的发展为基础，不能和梦想区分开来。^①

这是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观点的看法。它既是政治的否定，也是理论的否定。正当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日见突出和强化的时候，考茨基却设想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存和协作。列宁说考茨基的观点是“呆板的抽象”，它没有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现实”联系起来。其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和存在环境，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联合和不平衡的发展。在强权世界里，势力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发展只能最终变得更加尖锐。在一个以“为控制，而不是为自由而斗争”为特点的时代中，“体战”只是作为战争的序幕才是可能的：列宁断言，不存在对世界的永久的联合剥削。的确，说“金融资本的统治减轻了今天世界经济所固有的不平衡和矛盾”，这是一个“万分错误的观点”，“相反，它实际上加剧了不平

^① V. I. Lenin, "Introduc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5] in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13 - 14.

衡和矛盾”。^①

从政治上讲，列宁认为考茨基的幻想导致了某种政治逃避，对责任的机会主义退避：“为什么对当前统治欧洲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提出的‘艰巨’任务置之不理？”布哈林也有类似的观点：“（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把社会进程看成是一个纯粹机械的进程，不考虑敌视帝国主义政策的力量。”^② 革命变革的可能性从来不会被致治的方程式所考虑或拒绝。因此，当前的任务是拒绝转向关于未来的“比较和平的、比较没有冲突的、比较没有灾难的天真梦想”^③。对列宁未说，真正的挑战是在当前的危机中以反帝国主义致策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在1916年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是为了试图做到这点。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仅是一种政策或意识形态，如布哈林在他的创造性著作《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中所主张的那样；也不仅仅是金融资本的统治，如希法亭（Hilferding）在其突破性著作《金融资本》中所竭尽表明的那样；帝国主义也不是一种选择，资本主义可以决定由此撤退，回归到“自由竞争”，如考茨基和其他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④ 由于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出现了极大的垄断倾向。然而，竞争并没有消除，因为帝国主义“把垄断和自由竞争‘连结在一起’”。帝国主义“不可能废除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总的说未，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完全的垄断，但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连

① 本段所有的材料都引自：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8), 169 - 292.

② Bukharin, *Imperialism*, 142.

③ Lenin, "Introduction", 12.

④ Lenin, "Imperialism", 232.

结在一起”。^① 尽管，列宁声明所有的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他还是为帝国主义列举了下列主要的经济特征：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②

从历史观来看，列宁把帝国主义视为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是可能的——如俄罗斯 1917 年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他认为，帝国主义对劳工运动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在于它加强了机会主义，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破党之间的调和——如第二国际的崩溃所证明的那样。

因此，列宁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时代所勾画的“复合图”是国家资本重新分配世界市场的全球竞争图，这导致了海外的殖民压迫和国内统治及机会主义的增强^③。这是一幅帝国主义内部以及社会范围的冲突和斗争的动态图，这种冲突和斗争导致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和再次战争：这种发展和破坏、前进和停滞的普遍逻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

哈特和奈格里发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再相关。他们认为，帝国是跟着帝国主义而来的一种新的全球司法主权形式，它由“一系列根据单一的统治逻辑联合在一起的国家和超国家的组织构成”（xii）。如果帝国主义表现了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这一特征，那么帝国的出现就表明这个时代的死亡：“帝国主义世界地图上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已经在帝国的全球彩虹中融合、混合”（xiii）。因此，帝国

^① V. I. Lenin,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Revision of the Party Programme”,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464.

^② Lenin, “Imperialism”, 232 - 233.

^③ Lenin, “Imperialism”, 171.

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社会上是无所不包的，在政治上是无中心的，并且到处充满和平。尽管这种描述清除了考茨基主义的色彩，哈特和奈格里坚持把他们的主张紧紧扣牢在列宁的思想之中。他们认为，正是列宁自己“能够预见到通往超越帝国主义的资本新阶段的通道，并指出了帝国主权出现的地方（或事实上的无处不在）”（232）。尽管他们确实承认这有点“夸张”（234），他们仍然继续说：“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导引出了帝国的理论。”“这就是暗含在他著作中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国，而且这两种选择极其相似。”（232）这显然是错误的。列宁唯一期望的东西是革命；帝国（或超帝国主义）甚至从来就不是一种可能性。列宁坚持认为：

毫无疑问，世界正往单一的托拉斯方向上发展，它将毫无例外地吞并所有的企业和国家。但是，这个方向的发展却是在如此压力、如此速度、如此矛盾、冲突和社会动乱——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民族的，等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单一的世界托拉斯会形成以前，在各民族的金融资本会形成“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之前，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爆炸，资本主义将走向它的反面。^①

如果哈特和奈格里确实在重复着列宁，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断然拒绝帝国/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如果帝国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那么帝国/超帝国主义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否定为前提。列宁论点的症结就在这里：考茨基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政治上是提会主义的，因为它否认了

^① Lenin, "Introduction," 14.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被历史所取代。越南敲响了美国帝国主义继续欧洲殖民主义工程的丧钟，而导致了新的阶段，他们称之为帝国：一个“平滑的空间”，“权力在那里没有确定的场所——权力处处存在，又到处都无。帝国是一幅开放的风景画（ou-topia），或事实上是一个非场所性存在（non-place）”（190）。所以，不必拒绝超帝国主义：“帝国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出现。”（xi）我的目标是要在下文中通过诉诸具体的致治分析来表明，相比考茨基在1914年提出这种观念之时，帝国的乌托邦特点并没有些许改变；而且，哈特和奈格里误解了全球化进程，天真地接受了全球化是“一个无主体的进程”这样的定义。因此，他们错误地断定帝国主义已经被克服。实际上，帝国主义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得到了改进。正如列宁后来在1916年所承认的那样，“欧洲的教授和善意的资产阶级伪善地拒责，‘美国的道德规范’在金融资本阶段已经变成了任何国家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城市的道德规范”。^①哈特和奈格里所看到的彩虹仅仅是遮掩星条旗的幻景。

托洛茨基1924年在其“世界发展前景”的演讲中宣称，“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谋求世界的统治地位，它想在我们的星球上建立起美国帝国主义的独裁政府”。因此对托洛茨基来说，人类的命运依赖于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国际冲突的结果。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将被允许在美国所设置的限度范围内再次兴起，并且逐渐转变成“美国的新领地”。对英国来说，“只有撤退才有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帝国主义的内部战争。欧洲的国际政治结构也受到影响。美国披着社会民主的斗篷：“欧洲的社会民主，完全当着我们的面，正在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托洛茨基惟一的希望在于美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美国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将粉碎和

^① Lenin, “Imperialism,” 208.

征服帝国主义的美国。”^①相反的事情却发生了。在20世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遭到了遏制，退化为斯大林主义，并最终在1989年引起了内江。在历史上第一次，资本得以普遍化：“它使自己无论在强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得到壮大。它流向全球，并且渗入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心灵深处。”^②老布什尽管以战争来威胁伊拉克，却适时地宣布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承诺全球和平与繁荣^③。和平和战争这种双重语言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特点。

哈特和奈格里把1991年海湾战争解读为帝国出现的征兆，这种新秩序由战争的伦理性和有效性得到说明：

海湾战争的重要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战争把美国展示为惟一可以行使国际正义的力量，并且它的行动不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动机，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之名进行。(180)

这正是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干预的方式。国际规范不得不得到维持，而且美国被迫干涉，以纠正全球犯罪行为。要承认和不加批判地重复霸权主义的美国管辖世界的话语、权利话语和“正义战争”的话语，就要陷入把国内刑法投射到国家行为之上的陷阱中。这就涉及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话语转换，使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国内法律制度适应世界政治领域”，这就导致了像战争这样的全球冲突的去政治化^④。因为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在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海湾战争实际上都不可能证明是正当的，道德话语的正确和错误不得不得引入国际关系之中。国际政治、民族利益，甚至资本的再生产策略都

^① 本段这里和后面的引言均来自：Leon Trotsky, *Europe & America: Two Speeches on Imperial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1).

^② Ellen Meiksins Wood, "Back to Marx," *Monthly Review* 49, no. 2 (1997): 5.

^③ Gilbert Achcar, *The Clash of Barbarism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④ Peter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London: Verso, 1999), 142.

被哈特和奈格里所赞同的人道主义话语所取代。人道主义的先驱是非政府组织，但它为军事干预做准备，并“直接代表了全球和人类的普遍利益”（313），致力于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在政治之外”，道德起着支配作用。

但是，这是谁的道德？并且它在海湾战争中代表了谁的人性？哪种“生命在其全部一般性的意义上”得到了肯定？当然不是伊拉克人的，正如许多人立刻承认的那样。西方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全球正义”事实上是建立在伊拉克人民的堕落和灭绝人性的假设之上的。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主张的那样：

在西方，对冲突的描述，在8月危机的第一星期，就成功了。它们首先把萨达姆妖魔化；其次把危机个人化，把伊拉克排除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段历史之外；第三，完全隐瞒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危机形成中的作用。^①

正如其他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如罗宾·布拉克伯恩（Robin Blackbur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解释的那样，萨义德也认为，海湾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在该地区悠久的、灾难性的历史设计的一部分。使哈特和奈格里格外犹豫不决的是“全球正义”的不平等运用这一事实。当规范仅仅道用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而不适用于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的占领时，什么样的司法规范应该得到遵德呢？如果存在诸如“新的超国家权利”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拉制这种权利却如此具有选择性？哈特和奈格里依然没有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惑。对他们来说，为了维护和保证公共利益，美国只不过是天生地和历史地就具有像全球“和平警察”那样无私行动的特权，在苏联集团解体以后，国际组织要求美国承

^① Edward Said,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 (New York: Vintage, 2002), 357.

担这样的角色。就像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所主张的那样，哈特和奈格里“完全轻信了美国精英分子狭隘的民族私利和代表全球利益的外表相融合”^①。从政治上看，他们和打着全球自由主义旗号而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的每一次报复性破坏行动是串通一气的：

那些认为美国发动战争的动机是为了自由主义价值、为了在海湾国家恢复正义的人，他们是支持地区压迫制度和经济剥削的沙漠风暴所造成的大屠杀和毁灭的共犯的。^②

事实上，新世界秩序与《帝国》所描绘的秩序具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主义确实还在继续着。而且，美国帝国是全球化的真正目标。这已经在彼得·戈万的《全球赌博：华盛顿为谋求世界霸权的浮士德企图》中得到清楚的论证。他指出，新世界秩序本质上是美国竭力主导世界经济，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强国地位而“走向全球”，它“将在21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美国谋求全球统治的策略，在发展方向上允许美国塑造“国家的内外环境，将促使国际社会继续接受美国政治和经济的支配”^③。如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所做的那样，把全球化视为“没有主体的过程”，神秘化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球扩张的真正动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由于把美国的自我表述和客观现实混为一谈，他们助长了一种残缺的幻想，即认为全球权力没有统治中心。简言之，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全球化即美国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因此，全球化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偏离了全球化（deglobali-

^① Neil Smith, "After the American Lebensraum: 'Empire,'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 *Interventions* 5, no. 2 (2003): 261.

^② Gowan, *Global Gamble*, 163.

^③ Gowan, *Global Gamble*, vii.

zes)。虽然其他的经济实体和政府经历了附属国际经济进程的新阶段，但从美国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世界经济的“美国化”过程——协调世界其他国家适应美国经济的节奏和需要^①。如此一来，世界其他国家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它将迫使其他国家本身变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有效机构”^②。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个全球政府或帝国的格局。与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相反，美国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利用其他国家来增强自己的利益。国家是全球化所必需的，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国家是怎样被美国政造了，满足其推行“走向全球”的新需要。理解其他国家怎样通过这个进程而把美国的全球需要内在化是重要的，美国抓住这种方式强迫其他国家屈从于它的意愿也是重要的。这个进程不仅仅是经济的或政治的，也是司法的。正如艾贾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所评述的那样：“国家法律体系正受到不新挤压，以至于它们政变自己的法律，使其和美国法律更为协调——通常只是模仿美国法律。”因此，他推断：

非地域性帝国在华盛顿特区有其源头，它的基础是广泛蔓延的民族国家的三个内在机制：一是私人跨国资本的诱惑和压力，二是超国家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协调制度，三是把各国法律转变成美国法律的复制品。^③

这些特征有许多是 20 世纪 90 年代所特有的，但有些具有连续性，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如果不是更远的话。战后美国帝

^① Peter Gowan, “Explaining the American Boom: the Roles of ‘Globalization’ and United States Global Power,” *New Political Economy* 6, no. 3 (2001): 373.

^② Leo Panitch,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Social – Democratizing Glob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50, no. 5 (1998): 22.

^③ Aijaz Ahmad, “Globalization: A Society of Aliens?,” *Frontline* 17, no. 20 (2000), <http://www.flonnet.com/fl1720/17200490.htm>.

国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有权力把其生产关系复制到帝国的其他城市。而且，这种行为得以继续进行、扩张和加强。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美国创造了它自己的司法帝国，而从来没有试图仿效老式的欧洲帝国主义。相反的事实实际上也是正确的。非殖民化和司法、政治的形式独立也是美国统治和扩张的必要条件。

美国事实上已开始依赖于其他国家对它的军事—政治方案的顺从，而这正是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通过一个精心打造的轮轴—轮辐式的保护国系统结构，美国能够支配其盟国，制约他的朋友、敌人、突发事态、外交政策和资本积累策略。^① 其盟国依靠美国来确保其安全需要，每一个单个盟国的主要战略关系都不得与美国一致。因此，帝国内部的竞争和对抗受到了由美国支配所提供的细带的约束。尽管美国从未谋求消除其盟国作为资本积累的独立中心，但美国总是试图制约它们的发展。所以，欧洲和日本在战略和政治上依赖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美国利用这种关系确保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和政治霸权。诚然，正如大卫·N. 吉布斯（David N. Gibbs）所指出的，美国在冷战中推行一种“双重遏止”战略，“遏制共产主义的同时，也遏制美国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盟国”。前者被用以证明后者的合理性。“随着苏联集团的终结，1989年以后，对盟国的遏制依然是美国的中心目标。”^② 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可以解读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危机：当冷战时代的统治和依附结构不再被世人接受时，如何维持和再生产它们呢？

换言之，美国的中心目标依然保持不变，因为这样做至少不会退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非全球支配地位。正如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阿米塔奇（Richard Armitage）1990年十分简洁地指出

^① Peter Gowan, "The American Campaign for Global Sovereignty" in Leo Panitch & Colin Leys,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2003: Fighting Identiti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2002), 1 - 27.

^② David N. Gibbs, "Washington's New Interventionism: U. S. Hegemony and Inter - Imperialist Rivalries," *Monthly Review* 53, no. 4 (2001): 16.

的那样：“决不能放弃果断的、头脑清醒的美国领导。”^① 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来说真正的挑战已经提供了证明该主张合理的新思路。随着帝国主义内部的张力向外扩散，第三世界和东欧也就不得不承受这个进程的冲击。伊拉克、波斯尼亚、科索沃、“人道主义干预”、“正义战争”、北约扩大以及众多的其他治国艺术形式，比如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基本事实。如戈万所指出的那样，这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大西洋两岸动荡不安的关系格局：

在苏联集团的崩溃打破西欧的政治框架之后，如何重塑西欧的政治框架，北约组织的主要强国为此进行了斗争。20世纪90年代欧洲政治和经济的全部形态都受到了这种斗争的影响。

美国强烈拒绝就它和欧洲之间的“牢固的伙伴关系”的条款和条件进行重新谈判：

在美国，按照官方的说法，“牢固的伙伴关系”这一短语是代码。用外交辞令来说，它意味着强大的美国对欧洲大陆的领导。更坦率地说，它意味着美国对西欧的霸权式领导，而这种“牢固的伙伴关系”过去存在于冷战时期（以及海湾战争时期）。^②

因此，美国继续抵制欧洲平等地瓜分世界，这种做法同样可以被描述为超帝国主义的计划。正如列宁在上个世纪初所强调的，国家的不平等发展和不平等分配在国际关系上破坏了任何意义上的平

^① Cited in Michael T. Klare, “U. S. Military Policy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in Leo Panitch and Ralph Miliband,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2: New World Order?* (London: Merlin, 1992), 139.

^② Both quotes are from Peter Gowan, “The Euro - Atlantic Origins of NATO’s Attack on Yugoslavia,” in Tariq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NATO’s Balkan Crusade* (London: Verso, 2000), 19, 8.

等。这已经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得到了证实。美国并不接受英国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今天所呼吁的后现代或合作式的帝国主义（cooperative imperialism）的主张：“在这样的框架中，每个国家都共同参与管理，没有那个单个国家占优势，治理原则不是种族的，而是法律的。”^① 这个工程，包括国际刑事法庭和其他有利于国家共同干预的机构，听起来和哈特、奈格里的司法帝国非常相似。这和美国要取得不受世界挑战的霸权的战略有着尖锐的矛盾。美国不断地解释说，“合作式的帝国”对其宪法和国家利益是一种直接的威胁，因为它会造成美国国内法受到国际制约。欧盟强烈反对这样的解读。欧盟把它对全球化或帝国主义——一个共享主权的网络——的看法看作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积极发展。正如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克里斯·帕藤近来所说的那样：

相反，回到国家利益的狭隘定义，维护美国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地位，超越于任何外在的权威——这种做法不仅仅对正在发展的国际秩序，而且对美国本身，都构成了威胁。^②

美国断然拒绝参与欧盟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neoliberal cosmopolitanism）：“美国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辨别的倾向，既不放弃强权政治，也不让自己屈从于超国家的全球权威。”^③ 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清楚地表明，维护等级结构的单极全球秩序仍然是美国的主要目标。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反恐战争”需要得到重新解释。对哈特和

^① Robert Cooper, “The Postmodern State,” in Mark Leonard, ed., *Re-Ordering the World*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19.

^② Chris Patten, “Sovereign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ld Concepts, New Meanings,”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news/patten/sp02_77.htm.

^③ Peter Gowan, “Neoliberal Cosmopolitanism,” *New Left Review* II, no. 11 (2001): 85.

奈格里来说，这意味着帝国工程的一次中断。“9·11”之后，他们指出，美国采取了一种单边帝国主义方案，放弃了无中心的多边主义（decentered multilateralism）：帝国，从现实降为可能，不再是全球政治中的最起码的选择^①。当代国际政治的这种观念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帝国，像超帝国主义一样，往往是一种理论可能性，而从来不是一种现实性，而且从来不能够成为一种现实性，如美国长期坚持的那样。

“反恐战争”仅仅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手段，使其一系列帝国主义举指（包括“政权颠覆”和“先发制人”）合法化，以加强其全球渗透。由于国内日渐增长的成权主义和日渐强化的海外干涉结合到了一起，美国利用“9.11”恐怖袭击巩固和扩展了美国现行的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正如2002年9月出版的《美国安全战略》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自由市场和其他国家的民族发展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全部国家安全问题。比如说，“欧洲和日本恢复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全球干涉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也日益变成了美国的事务：“今天，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的区别正在缩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美国国界之外的事件在其国内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从军事上说，仅有威慑手段再也不够了。先发制人的主动政策对于打击难以觉察和流动不定的敌人，如恐怖主义，是必需的，这给了美国权利，实行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措施。极具讽刺意味却十分恰当的是，政府把这样一种全球统治和干预战略称之为“美国国际主义”。托洛茨基在上个世纪所担心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全球已经最终美国化了。或者，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国际化了。

在这种意义上，国际主义不再是美国支配下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的合作，不再是冷战的消极任务，而是一

^① Michael Hardt, “Folly of Our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Guardian*, December 18, 2002.

种积极的理想——直截了当地说，是按照美国人的想象进行的全球重建。^①

后现代的抛弃

“国际社会”的傲慢自大及其对全球干预的权力并不是一系列独裁事件或零乱的插曲。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它们需要与一致性，至少是与其自身的一致性相斗争。^②

抛弃 (Desertion) 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 (甚至不是政治的) 价值，然而它在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的变革概念中却占据着中心地位。如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抛弃 (desert) 就是“离弃、丢弃、遗弃、放弃 (某物)，离开 (某地或某个位置)”。它意味着誓言或效忠的中断和违背。抛弃是责任或义务的有意放弃。有趣的是，还有另一种抛弃的情形，用神学的术语来说，抛弃意味着精神上的失望：“一种被上帝遗弃之感”。

帝国是以抛弃和流浪的权力为前提的。在批判后殖民理论过时的同时，哈特和奈格里继续在下文中赋予最近的理论比喻以特权：作为真理的承载者，移民也是新世界及其解放潜能的象征。透过迁徙，群众预见并创遣了帝国：“群众的反地域化力量是维系帝国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这种力量还呼唤摧毁帝国，并使之或为必需。”(61) 群众被帝国控制的同时，也决定着帝国的发展：“群众一直是有组织的劳动力的源泉，决定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形态。”(208) 群众曾让马克思转变了他的思想。在大都市，无产着的迁移或劳动力的流浪是资本力量的表征：“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被资本所抛弃，服从于资本的需要，时而在这，时而在那。当他们不在行军时，他们就已

^① Perry Anderson, “Force and Consent,” *New Left Review* II, no. 17 (2002): 24.

^② Anderson, “Force and Consent,” 30.

‘宿营’。”^① 由于削弱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工人制约作用的强调，资本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便由抛弃、离去和拒绝来规定。哈特和奈格里用政治不抵抗取代了对资本的挑战和反对。阶级斗争变成了关于“脱离”（disengagement）的斗争。拒绝政治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变成了政治的拒绝。因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指出帝国是“超越政治”的领域之后，哈特和奈格里却以鼓吹改革主义的改治特征——如全球公民权、社会工资和重新拨款权一样——而告终。不过，革命修辞和政革主义实践之间的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某些无政府主义派别的一种显著特征。

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移民已经成为新的开创性行动——尽管他们拒绝把这种开创性行动当作一种改治形式。他们使人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他们宣称“一个幽灵，移民的幽灵在世界徘徊。旧世界的一切势力以冷酷无情的行动，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同盟。但是这个运动是不可抗拒的”（213）。“称民”在这里取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共产主义”。这种特变是象征性的。社会进程取代了政党/主体。而且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奈社会运动的支配性逻辑，正如詹姆士·哈特菲尔德（James Heartfield）已经指出的那样：“总而言之，‘新社会运动’的真实含义是社会变革动因的观念的一种偏离。新的组织形式是与集体作用观念的决裂。”^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和失政，曾经确实是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本地主义、非政府组织等“直接行动”的社会运动和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兴起的主要前提。

因此，在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拒绝中，帝国是十分清晰可辨的。与此相适应，国际主义也是如此。哈特和奈格里特别热衷于驱除国际主义在当代政治中有任何作用的概念。他们宣称，“今

^①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4), 621.

^② James Heartfield,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Explained*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8.

天，我们大家理应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时代业已终结”（50）。全球化不是国际主义失败的一种结果，而是对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应。此外，工人斗争“促进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帝国的形成”（51）。他们认为，全球资本压倒了国际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遇到帝国以后，已经变得过时了，其战术和战略已“无可救药了”（59）。因为“斗争已经变得几乎不可沟通”，它们“不再横向联合，而是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命脉”（58）。在共同对抗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已经逆转的情况下，差异主导着今天的斗争方式：“启蒙是问题，后现代是解决办法。”（140）但这是何种解决办法呢？不平等、剥削、资本主义产生的二元对抗问题，在后现代时期确实已经得到解决吗？

通过实行结构的和行动上的双重撤退，帝国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随着客观权力结构的削弱，迎来的是解放主体的式微。如果帝国是无中心的，那么反帝国也是无中心的。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对国际主义的拒绝就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假设之上，即民族国家已经消失，实际上，民族国家只是被重构。如果国家权力并没有在帝国/全球化中蒸发，而仅仅是被重组，那么它们的差异政治就是逃避政治行动。这就意味着“错失国际社会主义的机遇”并不是没有什么关系^①。夺取国家权力作为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也没有变得多余。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②

但是对生活在后现代时期的人来说，需要反对和克服的是“美国式的国际主义”，以确保“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它同样

^① Stephen Morton,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nd Other Impossible Propositions,” *Interventions* 5, no. 2 (2003): 293.

^②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8), 44.

也是欧盟帝国主义的对立面——这些人也被击败了吗？真实的情况是稍有差距的，正如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所指出的那样：谁在结构上可能转变全球资本主义，并且克服它的统治逻辑呢？米利班德毫不怀疑，这只能是工人阶级，下层的最多数人。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克服资本的统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也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克服资本的统治：

之所以说有组织的工人在斗争中具有“首要地位”，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其他的团体、运动或力量能够如此有效和强大，像有组织的工人那样，能够远距离地对现存的权力和特权结构构成挑战。但这决不是说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平主义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及其他运动无足轻重，不会有什么影响，或它们应该止步于各自的活动宗旨。根本不是如此。这仅仅是说，资本主义主要的（而不是惟一的）“掘墓人”依然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就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历史变革的力量”。而且，就像人们不断重复的事实那样，如果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拒绝履行这项任务，这项任务就不会完成。^①

所不同的是，只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特殊化的普遍主义”（particularized universalism）才能抵制后现代美国国际主义的“普遍化的特殊主义”（universalized particularism）^②。后现代中的左派已经摒弃这种观点，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拒绝承认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空前强大。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根本不像解构主义时代之

^①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no. 150, (1985): 13.

^②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 78.

前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无所不能。它实际上是“一只纸老虎”^①，而且缺乏必要的认同。在这些拒绝和哈特、奈格里的欣喜之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受到责难。今天，必须有某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才能动员上文米利班德叙述的那种力量。只有通过“拒绝与统治制度达成任何妥协，并反对每一种有意淡化资本主义力量的虔诚和委婉的话语”^②，对未来任务的现实评价才能实现。理想主义和神秘化只会破坏未来真实变革再次出现的可能性。

(陈志刚 译)

① Ronaldo Munck, *Marx @ 2000* (London: Zed, 2002), 152.

②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II, no. 1 (2001): 14.

超帝国主义时代*

卡尔·帕里尼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卡尔·考茨基采取了一种方法来论述帝国主义，并且在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他坚持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他和列宁之间的争论。但是，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年代可以更好地解释帝国主义现象。因此，以下用于指导我们的讨论的观点，都是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为基本框架的。

为了讨论下面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列宁和考茨基都是“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马克思的修正者。他们都试图修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特征的观点，从而提出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策略。就这个意义而言，列宁和考茨基的理论都不纯净。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分析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测，都应该以他们的预测的准确性为基础来评判。

在那些接受列宁的分析观点的人当中，许多人都曾经并继续批评过考茨基在1914年夏天（此时一战正在爆发）发表的文章“超帝国主义”中的观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批评都是“草率的”和不合理的。尽管列宁善辩地使用过一些论框——相对于他在争论中的胜利而言，这些论框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但他知道，他和考茨基之间的争议焦点乃是来来历史时期的特征，而不是当前的策略。他们争论的是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法则”。

* 译自：Carl Parrini: The Age of Ultraimperialism, *Radical History Review* Issue 57, Fall 1993。

列宁在辩论方法上把当前的现实和短期内的未来“混杂”在了一起（我并不是说混淆，因为他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他根本上也没有混淆）；他不愿认真地考虑考茨基关于随后历史时期（40到8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张。

列宁和考茨基之间争论的问题有：在社会学意义上，帝国主义是否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阶段；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是有选择余地，还是根本就没有选择；是否已经有某项政策，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们用来处理剩余资本及其引发的经济问题。

如果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是否就成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分歧。考茨基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趋势，例如卡特尔组织的形成，以及鲁道夫·希法亭曾经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国内经济危机的潜在能力。考茨基还认为，与以往出现的自由贸易一样，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已成为政治家们的策略，因此他们现在可以用它来扩大和深化超帝国主义合作，并把它用于镇压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或民族解放斗争。列宁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依据，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阶段，这个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结束标志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还对考茨基施加了人身攻击，给他贴上“叛徒”的标签，这意味着：考茨基所犯的不只是简单的“判断失误”，而是一个卖国贼和懦夫的所作所为。总之，列宁和考茨基之间的关键分歧在于：政治因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经济方面的根本差异。考茨基持肯定态度，列宁却根本就不考虑这种可能性。考茨基是正确的。列宁的错误在于他忽视了政治、经济这两个因素中政治所起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另一些较小的帝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为他们的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为他们的商品寻找销售市场，或者为了获取原材料。到1900年为止，传统的帝国都在寻求着这些东西。他们采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保护国或势力范围等方式来达到其目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帝国的当权者们凭

借他们的才能，通过谈判签署特殊的投资条约，为他们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垄断投资的权利、商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廉价的原材料。在义和团暴动之前的1897-1898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对中国这块肥肉进行了瓜分，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的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政府宣称：中美之间的条约规定了美国资本同样有权利进入中国的投资场所和市场，但中国此时的特权投资和市场安排违反了这些条约规定。由于这一原因，为了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和自身的利益，美国对那些闭关锁国的帝国（closed door empires）采取了敌对政策。它在中国锁行业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就是这些努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与发达工业国之间的关系方面，美国尝试制定了减少关税壁垒的计划，把它当作刺激世界贸易和减轻因经济竞争带来的政治冲突的手段。从威廉·麦金莱政府开始，英国当局运用了多种手段来缓和那些尚未消除的冲突。麦金莱通过他的喉舌向美国国会提议：在美国有能力向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别的工业国做出互惠税率让步的时候，国会应赋予他进行商业谈判的权力。美国国会的回应是：同意在非竞争性的产品领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互惠，但否决了与工业竞争国之间的所谓的《卡森协议》（Kasson Agreements）的全部提议。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国会采用了超帝国主义的政策（Ultraimperial policies）。自从做出这些决定以来，美国多位总统都曾尝试过摆脱国会对通商条约谈判的控制和监督。

弗里茨·资舍尔（Fritz Fischer）在他的经典著作《德国在一战中的目标》中指出：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们均认为，面临1890年以后社会主义情绪的增长，他们必须给德国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从那一年开始（首先是从利典·凡·卡普里维 [Leo von Capri-vi] 将军的任期内开始），德国政治家曾不断地尝试组织一个欧洲经济联盟（Nittteleuropa）未抵消美国保护主义带来的影响。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使得德国通过谈判进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市场，从而使德国有能力获得投资场所、市场以及低价原材料的供

应。费舍尔的结论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实现的就是这些商业目标。

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府试图置身于一战之外，希望战争在“平局”中结束，那么，美国就可以在“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但是，1916年末，德国决定重新恢复潜艇战，这预示着德国很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少是局部的胜利）。因此，美国为了防止同盟国的“胜利者的和平”的出现，也加入了战争。美国以同盟国的战时盟国身份参战，拒绝签署盟军之间的秘密条约（那些条约已经对“胜利者的战利品”作好了分割规划）。“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中的第三点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国际商业范围的目标，它提倡全面应用门户开放主义（Open Door）来管理世界贸易。

威尔逊认为，应该将门户开放主义应用于那些因为战争及《和平条约》而正在被易手的地区，并试图以此来影响国际联盟。美国以战时盟国关于门户开放主义的协议为条件，可以向这些地区提供无偿贷款。如果该协议生效，就可以抑制同盟国对战利品的分割。威尔逊知道，美国没有能力把门户开放主义强加给那些与其结盟的战时盟国中的战前帝国（prewar empires），但它希望，如果将门户开放主义运用于战败的帝国可以获得成功，那么就可以使同盟国相信：它们都应该放弃特权，并采用门户开放主义。有人批评威尔逊说，威尔逊参与组织的国际联盟也许在保护战胜帝国，并因此使美国卷入了打击战败帝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没有采用门户开放主义，相反，他们采用的是一种不自由的国际主义政策。1929年，这种情况使得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经济萧条是国际投资收缩引起的，而投资收缩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协约国的开放以及它们在向所属帝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方面遭到了失败；俄罗斯暂时的稳定，以及苏联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之下成为了一个封闭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遭遇了失败。后两者的发展状况严重地限制了全球投资体系的运作。

民族主义者的独裁：1930 - 1938 年

大萧条开辟了民族主义者的独裁时期，美国也完全地参与其中，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了 1938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拒绝出席 1933 年的伦敦经济大会；其后又发动了货币战，通过贬低黄金的美元价值和使美国脱离国际金本位来窃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利益。上述两起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者独裁时期的开始。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 [Adolph Hitler] 统治之下）和英国（在拉姆齐·麦克唐纳 [Ramsey MacDonald] 联合内阁的统治之下）也陷入到了政府贸易和民族主义者的独裁统治。罗斯福政府一边在经济上采取独裁的方式，一边还在 1934 年支持制定有关互惠贸易协议的关税削减法案。但是直到 1938 年，与其它工业国之间的互惠谈判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事实上，纳粹德国在中欧的垄断政府贸易网络的排他性越来越强，也注定了互惠谈判行不通。到了 1938 年，美国重整军备，迅速地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萧条时期，并且使得制定战后经济计划成为可能。

布雷顿森林体系：1934 - 1972 年

大约在 1943 年，美国财政部（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他们当中最积极的是亨利·迪克特·怀特）开始了与英国财政部（主要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间的谈判；他们试图联合双方的专门机构，去处理那些已经在大萧条时期发展起来的贸易争端，并实现长期以来已成为美国国际商业政策基础的门户开放政策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关贸总协定（GATT）基本上都是两国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在争夺垄断性投资场所的竞争时期（1896 - 1916 年），各工业国的政府和银行家都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当作获得垄断性投资场所的杠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赋予美国政府及欧洲各国政府相互禁止对方采取行动的能力，从而压制了争夺垄断性投资场所的竞争。与

此相似，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接受了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的提议，在门户开放主义的基础上对竞争出价进行协商。实际上，从1896年起的第一个延长期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垄断性投资场所就已经消失。分支机构得到相对较快的发展，大规模的投资场所已经出现。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积累起来的剩余资本都是通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为核心的体系投资下去的。关贸总协定谈判和定期的相互削减关税也为工业国之间的超帝国主义合作打下了基础。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以及后帝国主义——变成了现实。我认为，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后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关键特征——发达工业国之间寻求国际投资、市场和原材料垄断的竞争——已消失无踪。

后帝国体系中的压力：1971 - 1992 年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后帝国主义体系给许多问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些问题包括：国家向农产品提供补贴；通过诸如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 Import Bank of the U. S）这样的政府银行以及其他工业国的类似机构，宣布政府对国际发展计划的合同竞标提供支持；以及日本对美国和西欧在投资与销售市场方面施加限制。但是，总的说来，国际体系中的合作方面仍然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体系为美国和西欧提供了相互否决的权力，这也对这个体系强加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方式。美国的作用减小，不表示美国放弃单边管理，或者甚至放弃霸权；而是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大家都没有寻求特殊权利。这种体系的设计是灵活的。以汽车工业为例，它允许现在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也许是日本）超过以前最有效率的生产者（例如美国）。

美国的帝国文化

当然，从狭义上理解，美国确实曾经推行过帝国文化，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本土的现代化和维护美国的经济与

政治地位。美国建立的制度、政策法规和社会惯例都是为了使美国以及美国人居住的地方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菲律宾、古巴、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地区，以及其他许多欠发达地区，都曾深受美国电影等文化、半文化产品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我认为：这与19世纪英国商人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是根本不同的。并没有多少美国商品危害过国内外的消费者。何况，世界上有哪个重要国家没有对别的国家产生过危害？例如，苏联也曾经出口过核技术。

帝国主义的定义

我相信，很多美国人都清楚：越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在一定程度上由民族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领导者所掌控的越南。我相信，绝大多数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人其实也认为，越南人在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民族主义道路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是，美国的战争对手却认为，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把越南人不想要的制度强加给他们。我认为，这里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越南人的抵抗程度。很多美国人本能地认识到：强迫他人接受他们不想要的制度是错误的和“帝国主义的”行径（他们反对以越南人的抵抗程度为衡量标准）；但是，同样也有很多美国人相信：美国领导人试图强加给越南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优于越南民族主义革命者正在选择的反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越南的选择失败，并且美国不再试图强迫越南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美国人就可以十分自然地不那么认定我们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显示：当美国为了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而采取军事援助和经济制裁措施的时候，美国民众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大部分民众并没有把这件事者作“帝国主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使用武力。实际上，在我看来，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或者是想搜集零碎的证据来“定义帝国主义”，就如同人们过去对“偶像”这个名词所作的分析一样：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这种定义在理解和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方

面意义不大，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后帝国主义

总之，我认为，我们应该拒绝使用帝国主义概念，并抛弃后帝国主义理论的各种观点。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以下一些理由：作为具有当代智慧的公民，我们都希望依据现实的可知程度来“认识”现在；任何与帝国主义有关的概念都应具备某些起码的特征，例如：帝国之间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垄断以控制投资场所、出口市场和低价的原材料供应。很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的规章抑制了垄断，并且加强了对垄断的控制。我们如今正处在后帝国主义时代。

(曹义恒译)

编后记

编者第一次接触后帝国主义，是在阅读罗纳德·奇尔科特的《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的时候。在该书中，作者把斯克拉和贝克尔的后帝国主义理论看作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提出挑战的四大理论之一，这让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溯本求源，我们一路搜查下去，发现这一理论在国外学术界已经有着广泛的影响，相关的评论和分析常常见诸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文献。当时就有编选一本向国内读者介绍后帝国主义理论的书的想法，可惜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付诸行动。

本书的编选和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李惠斌研究员和中央编译出版社。他有意要与该社合作，出版一套“后经典文丛”。我们把久藏心中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当即许允下来，终于让我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编选工作得到了本书诸位原文作者的支持。因此，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我们要特别感谢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戴维·贝克尔（David G. Becker），理查德·斯克拉（Richard L. Sklar），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基思·海恩斯（Keith Haynes），塞尔·沙茨（Sayre P. Schatz），亚历桑德罗·科拉斯（Alejandro Colás），琳达·卡蒂（Linda Carty），巴希尔·阿布曼那（Bashir Abu - Manneh）等作者的热情和劳动。

编选工作的质量还取决于译者的水平。本书的翻译大部分由曹义恒完成，陈志刚博士和包雅钧博士也各自翻译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全书由曹荣湘校对并统稿。当然，由于能力和水平的限制，错漏不

当之处在所难免，其责任均由译者承担，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翻译工作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在这方面，尤其感谢周凡、鲁爱萍、邓小红、李智友、陈刚等朋友的帮助，也感谢杨金海、李惠斌、郑一明、薛晓源等师友的指导。

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其他需感谢的朋友，不再一一列明，惟记怀于胸而已。

编者

2006年6月16日

